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新脑筋

 **eBOOK**
网络资源·学校版

第一编 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

一、历史造就了邓小平

林彪摔死了，邓小平想出来工作，毛泽东说：行！邓小平整顿，树立了他在改革开放的形象，也惹怒了江青；有人进谗言，全国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 周恩来亲自打电话，要江西关照邓小平

1966年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8月，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邓小平总书记的职务实际上被撤销了。

1967年春天，在林彪、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全国掀起了批判和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高潮。所谓“最大的走资派”首先是指刘少奇，邓小平被称为“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或“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红卫兵揪斗了刘、邓。63岁的邓小平被红卫兵押在盛夏的烈日之下，低头，弯腰，坐“喷气式飞机”，受尽凌辱和折磨，连其家属也受到牵连。

然而，毛泽东在对待刘、邓问题上与林彪、江青一伙的意图是有所不同的。他说：邓小平要批，但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

1968年10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开除了党籍，被彻底地打倒了，遭批斗，受凌侮，昔日共和国的主席连做普通百姓的权利都没有了，最后惨死狱中。而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则“保”了一下邓小平，说：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就这样，邓小平被“挂”了起来。

1969年10月20日，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被林彪以战略疏散的名义发配到江西。

周恩来很不放心邓小平等人的安全。他只有用自己的影响，向下面打招呼。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他两次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接电话的是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程惠远，周恩来严肃地指示道：“有件事，你向程世清同志报告一下，中央决定：一些领导同志要到下面去蹲蹲点，搞些调查研究，了解些情况，也适当地参加些劳动。”说到这，周恩来停了停，又说：“到江西的中央领导同志有陈云同志，有一个秘书和警卫员跟随着他；王震同志是夫妇两人。你们对那里挺熟悉。听说你们那里有‘五七干校’，还可以让他们到干校去玩玩。这些中央领导同志，年纪都大了，劳动也不行了，主要不是让他们去劳动。这你明白吗？”“我明白，总理！”周恩来停了一下，又指示道：“现在地方上情况也很复杂。他们在某一个地方，安定下来之后，当地群众肯定会认出他们来。说不定也许有人会找他们的麻烦。遇上这种情况，他们自己不好解释。你们省革委会要出面，做做工作，一句话，就是要保护他们的安全。我已经告诉他们了，他们可以到工厂去学习，看看，调查，接触一下实际。总之，你们省核心领导小组要多关心，多帮助他们！”程惠远把周恩来的指示，一字不差地记在本子上。周恩来百忙之中，对这些人仍如此关怀，而且想得这么周到、细致，程惠远深受感动。

为了把这些被打入“另册”的老干部安排到安全可靠的地方，周恩来花了不少脑筋。

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周密的调查之后，才选择江西这个地方。

周恩来把这些虽然靠边站，但并没有被彻底打倒的中央领导，关照程惠远如何照顾之后，又把一个更大的难题亮出来了。这就是如何安排邓小平。

这是一个不好明说的问題。在疯狂的造反时代，谁不知道邓小平是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如果不安排好，邓小平哪怕是走到天涯海角，当地的造反派，也会围攻他的。周恩来知道自己的处境，绝对地保护邓小平安全的话，江西省革委会领导是否会听，他也没有把握。但他要竭尽全力，来保护邓小平的安全。

“汪东兴同志大概告诉你们了吧！”周恩来用含蓄的口气，把问题提了出来。

“不知道，总理！”程惠远不知道总理暗示什么。

“邓小平夫妇也到你们那里去。”周恩来郑重地说道：“毛主席在九大说过，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别人不同。邓小平同志是去农村锻炼，当然，不能把这些老同志当全劳力。他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太好。收房费也要适当地照顾一下。在选择住处上，要尽可能地好一些。一下从北京到南方，气候上和生活上，他也许不习惯，你们要尽可能地给予方便。”周恩来顿了顿，还是有些不放心，他又叮咛道：“这些同志下去，你们要派人多帮助，要指派专人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对这些老同志的安排问题，你要向程世清政委马上汇报，研究一个具体方案，再告诉我。”然而，不久程惠远接到林彪下达的“一号命令”。其基本精神同周恩来电话指示完全相反：对从北京疏散下来的中央机关的走资派，要监督劳动改造，不日即可到江西。

程世清清楚总理的威望、地位和权力。他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是举足轻重的，说话有份量。而且，他在电话里的指示十分具体，明确指示照顾陈云、王震和邓小平等人，这是不能怠慢的问题。

他也听说过总理的工作作风，布置任务具体、细致、周到，事后他还要检查。对这样的领导人，采取敷衍的态度是不行的。

沉思了一会儿，他说：“我们初步想法，他们什么时候来都行，我们江西对他们的大门是敞开的。他们来后，暂时可以先让他们在滨江招待所住下，打算把江西的情况，向他们介绍一下。”对邓小平的安排，程世清指示程惠远道：“让他去赣州吧！至于陈云和王震他们俩人，安排在什么地方，征求他们本人意见之后再定，不管他们住在哪儿，都给他们装上暖气。”程惠远把这个意见给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总理果断地作出了指示：“原则上同意程世清的安排，但对邓小平同志的安排，还要考虑，让他去赣州不合适，那里离南昌市太远，是山区，交通又不方便，条件很差。他已经是60多岁的老年人了，生个病怎么办？我的意见，应该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便于照顾。”他对邓小平应该住什么样的房子，也作了具体指示：“最好让他们夫妇住一栋两层小楼，楼上他们夫妇，楼下是工作人员祝当然了，最好是独房独院。

这能在院里作些活动，又安全。你把我的意见，告诉程世清政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江西省革委会作了如下安排：邓小平夫妇安排在南昌市郊区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参加劳动，住在离工厂不远的望城岗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原校长许光友的房子，又称“将军楼”。

2. 邓小平请求复出

三年零四个月的“牛棚”生活是漫长的。从15岁旅法求学算起，他整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动了半个世纪。如今远离政治中心，谪居江南一隅，他用劳动和读书来充实生活，从不感到空虚与彷徨，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在自己的园子里养鸡种菜，晚上读书看报，冬天还坚持用冷水擦身。邓小平并没有因为被打倒在地而心灰意冷、自甘消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历史就是这样造就一代伟人的。

1971年9月13日，靠打倒大批共和国元老起家、成为法定接班人的林彪，竟因为抢班夺权的阴谋败露而自我毁灭。但世人并不知道，没有中央的指示是不会向世人宣布的。

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在江西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林彪没有出席10月1日前后的各种国庆活动。11月5日，被隔离的邓小平夫妇突然被通知，去工厂和工人群众一起听取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问题的文件。这是自“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被打倒以来第一次享受听传达文件的“政治待遇”。当邓小平得知林彪自取灭亡的消息之后，内心十分激动，但并未喜形于色。在听取传达和讨论的几个小时中，他正襟危坐，一言不发。这位政治家在思索。回到小楼后，因监视人员在场，邓小平夫妇也没有向焦急等待的家人说什么。

只是卓琳把女儿毛毛拉到厨房，用手指在她手心写了“林彪死了”四个字。当监视人员离开后，全家吃饭时，卓琳才给家人详述了文件的内容，大家都很兴奋。但邓小平没有说话。卓琳知道邓小平是性格内向、沉稳寡言的人，在几十年的政治风云中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性格。她知道丈夫高兴，就预备了一小杯酒，给儿子邓朴方也斟上了一杯。父子俩仰脖一饮而尽，邓小平终于说了一句话：“林彪不亡，天理难容！”1971年秋，“九·一三事件”后，笼罩在中华大地上那“文化大革命”特有的紧张政治空气略有缓和。邓小平先后两次给中央写信揭批林彪集团，并提出到江西老革命根据地参观学习的要求。

江西省委负责人黄知真来到望城岗，传达了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安排邓小平去井冈山等地参观并顺便到泰和县考察农业机械化问题。邓小平欣然同意这一安排。这是他下放三年多以来第一次外出参观。

少言寡语的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历史已经遇到了一个新的转机，这个转折无疑对自己的政治命运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于是，他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并向中央报告了自己的情况，希望能够为党工作。毛泽东当即把邓小平的信批转全党，准备起用这位难得的人才。

1972年1月6日、长期受林彪迫害的原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不幸病逝。

1月10日，陈毅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举行。10日下午，毛泽东突然决定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引起党内外极大的关注。毛泽东在同陈毅夫人张茜谈话时，高度评价了陈毅的一生，同时还看似无意实有意地同张茜说起“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心领神会，暗示陈毅的家属们把毛泽东的话传出去，以利于邓小平的问题早日解决。

五一节前，毛毛送邓朴方回北京治病期间，王震约见了她。王震详细

询问了她全家的情况，并让毛毛回江西转告邓小平，毛泽东对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说自己已向毛泽东及中央上书，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信中，邓小平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也解释了一些问题。邓小平再次表示自己身体还好，愿意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做些工作。此信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给了毛泽东。8月14日，毛泽东作了如下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

（二）他没有历史问题。

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3. 深夜，周恩来要通了南昌的电话

周恩来早就主张解放邓小平，并一直力所能及地保护着他。

就在前不久，周恩来得知自己身患癌症的消息时，他更加迫切希望尽快起用邓小平这位精力充沛、才能非凡的治国能人，助自己一臂之力，并接他的班。周恩来接过毛泽东的批件，犹如接过一柄“尚方宝剑”，立即着手实施解放邓小平的工作。

然而由于毛泽东对周恩来反极左的批评，国内气候又趋阴冷，因此虽然有了“最高指示”，却迟迟不见下文。毛泽东也似乎对这件事淡漠了。处于困境之中的周恩来，并未忘记邓小平复出之事。

12月18日，周恩来提笔致书纪登奎、汪东兴二人：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切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这些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况。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周 恩 来

1972.12.18

由此信可知，在12月17日毛泽东“面示”周恩来时，并没有谈及邓小平一事，可是周恩来在信中却貌似顺便实则有心地把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不仅再次提出，并且进一步落实下来。

周恩来用心良苦，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终于打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

1973年2月，中央通知邓小平回京。2月20日，度过三年零四个月的放逐生活的邓小平乘火车由赣回京。

与此同时，北京的周恩来告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安排邓小平回京后的住所，并要汪东兴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出问题的决定。

自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

会议，专题讨论了邓小平复出的问题。经过激烈斗争，政治局最终还是在 3 月 10 日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在当时“左”的指导思想还很严重的情况下，这一《决定》没有也不可能给邓小平进行平反，而只能以给犯错误干部落实政策的名义作出。但是，这一《决定》使邓小平这位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终于又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

4. 毛泽东十天三荐邓小平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作出邓小平复职决定的当天，就向毛泽东和政治局请假，请求“病休”两周。自从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在亲自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一直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致使身体每况愈下，多次出现便血症状。1972 年 5 月，医务人员首次在周恩来体内查出癌细胞。为此，毛泽东曾以“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劝诫。同时，医务人员也一再提醒他减少工作，配合治疗。但周恩来却仍坚守岗位，直至邓小平复职一事终成事实，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

3 月 28 日，周恩来身体稍有康复，便与李先念等会见阔别几年的老战友邓小平。第二天，周恩来又约请邓小平去毛泽东住处开会。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伟人再次热烈握手。

随后，中央政治局决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4 月初，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卓琳夫妇长谈，并共进晚餐。

4 月 12 日晚，周恩来主持的欢迎刚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的盛大宴会。

宴会上人们发现了一个久违而又熟悉的面孔——邓小平。六年前，他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并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几年来寂无声息，人们不知道他的任何情况。而现在，他却戏剧性地突然出现在盛大国宴上，其公开身份是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的公开露面，使人们惊讶不已，立即为外国记者所关注，称“这次宴会上不是西哈努克而是邓小平成了无冕之王。”邓小平复出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

到 5 月下旬，邓小平出席了由周恩来主持的为筹备党的十大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会议期间，周恩来向与会者说：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在 8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0 月 19 日，邓小平在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夫人到桂林参观访问之后，专程到韶山参观了毛泽东的故居。

邓小平从韶山回到北京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就开始酝酿给他加重担子，让他负责更为重要的工作。

这件事是由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向毛泽东建议的。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里，叶剑英和邓小平相知甚深。在邓小平刚从江西回到北京时，叶剑英就到邓小平的住处看望，帮助解决生活方面的问题。

同时，他还向邓小平介绍了军队的情况，征求邓小平对军委扩大会议筹备工作的意见。为了加强中央军委的领导，叶剑英当面向毛泽东建议说：“小平同志回来了，我提一个要求，让他来参加和主持军委工作。”毛泽东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

12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请邓小平参加。会上，他提出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意见，并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他在会上向大家推荐邓小平，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毛泽东又指着叶剑英说：“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讲话。”随后，毛泽东让叶剑英召集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来京议军。

12月15日，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人员和几个大军区负责人谈话，再次推荐邓小平，他说：我们现在请来一位参谋长邓小平，他呢，有些人怕他，但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的。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毛泽东转身又对身旁的邓小平说）你呢，大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里藏针。

外面和气点嘛，里面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在召集这些司令员开会宣布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时，毛泽东指着邓小平第三次向大家推荐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当日，病势沉重但心情很好的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遵照毛主席的建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1973年12月22日

5、毛泽东说：王洪文不如邓小平

1974年，周恩来的病情日益加重，工作重担也就越来越压向了邓小平。周恩来和邓小平之间的友谊与合作是十分真挚和深远的。1974年6月，周恩来的病情更加严重了，不得不住院治疗。

这样，接替周恩来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选问题，迫在眉睫。

面对这种客观形势，毛泽东不得不考虑选择一个人来接替周恩来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这是邓小平复出走上重要领导岗位的一个历史契机。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推荐，10月4日他提议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近期召开四届人大。

江青预感邓小平有可能在四届人大上接替周恩来正式主持国务院工作，就导演了一连串妄图由她“组阁”的闹剧，特别是“风庆轮”事件。

住院治疗的周恩来很快得知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他向即将赴长沙的

王海容、唐闻生说：“‘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恰恰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周恩来很清楚，争论的焦点是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四人帮”的目的是阻止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和中央的工作。他嘱咐王海容、唐闻生：“我正在做工作，打算进一步了解情况，慢慢解决问题。”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情况。王洪文也到了长沙。毛泽东在同周、王的谈话中，再次明确表态支持邓小平，说：“你们留在这里谈，告诉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politics 比他强。”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英文Politics的中文意思是“政治”，不懂英文的王洪文在一边木然。

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又说：“他没有邓小平强。”一边说还一边在纸上写了个“强”字。这次王洪文似乎听懂了，十分尴尬。

当周恩来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说到“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打断周恩来的话，一字一句的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又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人才难”，周恩来看懂了，说：“人才难得”，毛泽东欣然放下了笔。

毛泽东转过头来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又关照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会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周恩来郑重地点了点头。

由此，在这重大的人事安排上，毛泽东终于最后下定了决心。

毛泽东的决心是邓小平复出的关键。是什么因素促使毛泽东重新启用这个“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呢？当时周恩来病重，急需一个人接替。毛泽东也曾经物色过的几个人都不顶用。林彪自我毁灭；他曾寄以厚望的王洪文积极参加江青一伙的阴谋活动；张春桥虽有文才但在军队影响甚微；至于江青，毛泽东非常了解，坚决不同意她组阁；而当时的华国锋，在中央地位低、影响很小尚没成为毛泽东考虑的主要对象。而毛泽东对邓小平是较全面了解的，虽然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毛泽东始终都记着邓小平，正如他1972年8月作的关于邓小平的来信的批示，“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一贯认识，是毛泽东能够提出邓小平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思想基础。邓小平当面向毛泽东表示：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看来责任太重了一点。但毛泽东还是坚持让他承担。

一个顶替周恩来主持党和政府日常工作的人必须是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中间有较高威望的。从这个角度看，只有邓小平具备这个条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一伙的丑恶面目越来越暴露，在党内和群众中都十分孤立。特别是他们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反对周恩来，十分不得人心。华国锋资历、声望较低，当时在党内和群众中还鲜为人知，同邓小平也根本不能比。

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把领导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重任交付给邓小平，是唯一可能的选择，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邓小平复出是历史的必然。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月8日至10日，周恩来在京主持党的十届二中全会，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增选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其间毛泽东还指定邓小平负责为病重的周恩来起草《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字数不超过五千字。邓小平很快完成了任务。在1月13日至18日召开的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上，周恩来带病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大会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

四届人大会议后，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各部部长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周恩来发表讲话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今天是开始，对于我来说，恐怕也只能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了。以后的事情，主要是由各位副总理来做。……

（周恩来停顿了一下，环顾会场，加重语气又说）毛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现在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一共十二位。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

6. 邓小平不怕别人说他搞复辟

邓小平受命于党和国家危难之际。

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局势十分严峻，“四人帮”的破坏活动还很猖獗，闹派性、搞分裂，社会秩序也很混乱，国民生产指数下降，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非常困苦，军队也存在严重问题。经过第二次“起落”的邓小平，深知自己所肩负的重大责任。

他已 71 岁了，但精力仍然很充沛。他要把他在江西放逐时深入思考的经纬大略付诸实施。

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时候，1974 年 10 月 11 日，毛泽东发表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975 年 1 月 8 日至 10 日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讨论有关四届人大的文件时，周恩来再一次转达了毛泽东“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毛泽东还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接着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贯彻了毛泽东这些指示的精神。2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出《批转 1975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要求全党“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毛泽东作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是适应当时严重的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需要而提出的，也符合广大人民的心愿。但是，几乎是在同时，他又作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批判按劳分配、货币交换等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东西，把精力仍集中在阶级斗争上。

而做了大官，也住过了“牛棚”的邓小平，这时却比毛泽东清醒得多。他反复思考不能搞穷社会主义，胸中酝酿着改革的大思路。

所以，他一重回领导岗位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就立即开始了拨乱反正。1986 年 9 月邓小平和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谈话时会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批驳了这种观点。正因为这样，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我又被打下去了。当时我告诉他们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

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

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在 1987 年 10 月 13 日同外宾谈到改革时，说：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

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

邓小平针对“四人帮”所散布的种种谬论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判和斗争。针对“四人帮”所鼓吹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邓小平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他说“这就是大局”，“全党要多讲”这个大局，不能搞穷社会主义，强调“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批评了林彪和“四人帮”搞起来的“派性”，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也不见了”，“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他还针对林彪、“四人帮”一伙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种种谬论和行径，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要“完整的”理解毛泽东思想，反对“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并提出“优良传统要恢复”，“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等等。这些提法使我们看到，邓小平这一些拨乱反正的做法遇到的阻力是相当大的，形势甚至是险恶的。

邓小平在许多讲话中都讲到了“不要怕”，“不要怕抓生产”，“不要怕派性”，“不要怕这怕那”，“要让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共产党员为什么怕？”“怕字当头，不工作，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这样的领导干部，索性请他好好休息，不然占着茅坑不拉屎怎么行？”“一二把手敢字当头，就可把队伍带起来”，“不要怕挨批判，不要怕犯错误。”在 1975 年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这半年来，我讲了多次话，中心是讲敢字当头。有个‘老大难’单位，过去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后来下了决心，管你是谁，六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四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二、三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都得摸。一摸，就见效了。”为使各级干部敢字当头，素有“钢铁公司”之称的邓小平带头冒着再一次被“打倒”的风险冲在最前面。他在 5 月间的一次会议上说：“我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

这种人是有的，你不要怕。只要我们有了明确的态度，有了正确的方针，事情就好办了。”正是在这种认识水平、胸襟气度和思想准备的基础上，邓小平领导了对各条战线的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整顿。

7. 不唱天，不唱地，只唱 9 号文件

这出戏邓小平 1 月 15 日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明确地提出了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消除派性的问题。优良传统要恢复，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责任更大，三个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以此为开端，整顿工作在邓小平的领导和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配合下，在各条战线逐步展开。

回想起从江西南昌乘火车返回北京时，特快列车竟晚点 3 个多小时的情景，邓小平针对铁路运输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影响，他决定以铁路运输的整

顿为突破口，首先在工交战线进行整顿。1975年2月25日至3月8日，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

3月5日，邓小平以独具特色的方式出席了会议。

那一天，听说邓小平要来参加会议，许多人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特别是那些曾经在邓小平领导下战斗、工作过的干部，更是急切地盼着早点见到这位多年未见的老领导。开会的时间快到了，邓小平快步走进会场。他的身材并不高大，但是体阔肩宽，步伐有力。他冷静地环顾四周，对于人们惊喜的目光只报以含蓄的点头和瞬间的凝视。

几位盛市领导走上前来，笑容满面地想与他握手，邓小平却敏捷地举起右手说：“今天不拉手了，因为工业形势不好！”他看着大家，缓缓地说：一个国家，没有物质基础，形势不好啊！这种出人意料的见面方式，使那些原本想与邓小平握手的干部面面相觑，一下子怔住了，也使绝大多数与会者深深地感到了形势的紧迫和责任的重大。

面对在场的众多工业战线的领导干部，邓小平开宗明义地提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他扫视着在场的人，说：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

他严肃地问道：“目前生产的形势怎么样？”他从农业谈到工业，谈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再谈到铁路运输，声色俱厉地说：“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他谈到，对那些派性严重的人，要进行教育；对那些闹派性的头头，利用派性混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的人，必须严肃处理。他的话，言辞铿锵，句句如锤。尽管会场上人头攒动，却听不到一丝杂音。

最后，他强调说：“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他就以这种反问的方式结束了讲话。

他把形势和责任摆在了大家面前，也把他独特的性格和作风留在了到会者心里，使每个人心里激动又紧张，热乎乎又沉甸甸。

就在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讲话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第9号文件。在这份文件上有邓小平亲笔写上的一段话：对于少数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

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结束时，主管交通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立下了“军令状”：保证一个月内见成效。四届人大组阁时，由邓小平点将的新任铁道部部长万里表示：要把党中央关于铁路整顿的第9号文件作为铁路工作的纲，“不换节目，不改镜头”，一抓到底。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贯通东西南北的铁路系统率先开始了整顿。万里要求全国铁路做到“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当好先行。”他响亮地指出：“不唱天，不唱地，只唱9号文件这出戏。”“千条理，万条理，不

安定团结没有理。”万里亲自率领工作组马不停蹄地跑遍了几个问题严重的路局，撤了一批闹派性的造反派头头，重新调整了领导班子。铁路运输的形势明显好转。到4月份，严重堵塞的几个铁路局全部疏通，全国20个铁路局的19个铁路局超额完成了计划。

铁路整顿见了成效之后，钢铁工业的整顿紧跟上来。军队、军工、科技、教育、文艺等领域的整顿也厉兵秣马，酝酿展开。

1975年春天，中国大地上一场为四化建设和安定而围歼派性的战斗打响了！

到处在讲大局，抓生产，恢复健全规章制度；到处在讲团结，批派性，建立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8. 钢铁公司重创帽子公司

整顿工作初见成效，使广大干部群众看到了希望。但是，绝不肯善罢甘休的“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却对整顿工作进行顽固的阻挠和抗拒。在他们的煽动下，掀起了一股“反经验主义”的阴风。

他们把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整顿工作的各项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领导经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并要把反经验主义当作各项工作的“纲”。

一时间，“反经验主义”的鼓噪甚嚣尘上，什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修正主义的货色”等耸人听闻的言论充斥着舆论宣传领域。

“四人帮”在各地的帮派骨干也四出活动，重新拉起了打着各种旗号的造反组织，煽动停工停产，鼓动“反潮流”，准备进行再一次“夺权”。

在“四人帮”的挑衅面前，是斗争，还是妥协忍让？这关系到整顿工作的进退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在邓小平于1973年重新参加党和国家领导工作后，已经多次遇到“四人帮”的寻衅、发难。这些斗争，常常由一些小事开始，很快便卷起剧烈凶猛的波澜。在“四人帮”的挑衅面前，邓小平针锋相对，毫不退让。半年前，针对“四人帮”利用“风庆轮”事件对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国务院领导的攻击，他当面对开“帽子公司”的江青说：“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整顿工作开始后，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邓小平在领导干部中突出地强调要有敢于斗争、不怕打倒的精神，在派性面前要敢批、敢捅“马蜂窝”。

他曾幽默地说自己是维吾尔族姑娘，“头上辫子多”，不怕人家“抓辫子”，以此鼓励干部打消顾虑，敢于斗争，置个人安危荣辱于脑后。

现在，在“四人帮”挑起的所谓“反经验主义”的斗争面前，邓小平决定要就“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问题，向毛泽东作一次专门的“请教”。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请教”，其锋芒所向也很清楚，无异于是在政治局内部捅“马蜂窝”。许多人都为邓小平此举捏着一把汗。

邓小平的意见，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意图有所觉察。4月23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4月27日开会批评了江青等人利用反对“经验主义”的错误。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批评了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的问题。

毛泽东的批示和谈话，在政治局内成了力量对比的转折点。

大批正在印刷的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停机了；那些在老干部面前言辞凌厉、咄咄逼人地大批“经验主义”的“反潮流派”，立时声细如蝇了。“四人帮”那种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另搞一套的伎俩不得不有所收敛。

但是，“四人帮”并没有认错。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批评声中，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低头闷坐着，一言不发。可是在会下，他们却攻击政治局会议上大家的批评是“突然袭击”，是“围攻”。他们似有满腹委屈地四下放风，把原本明明白白的是非黑白完全颠倒了。

针对“四人帮”的攻击，5月27日和6月3日，在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这些专以“革”别人的“命”为己任的“革命家”受到了更加尖锐的批评。

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说：“有同志说，这次会上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说突然袭击，围攻。”他义正辞严地驳斥道：你们的问题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他紧紧抓住1973年年底，“四人帮”编造的所谓“第11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这三件事反问道：“倒是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钻出这三件事？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对于这些事情，不讲明白，没有好处。没有什么过头的。”他不容置辩地说：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总括了历史经验。搞小圈子历来不好。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

在邓小平单刀直入、切中要害的发言之后，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等先后发言。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又默然不语地坐着。张春桥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沉默，沉默，又沉默。”终于，王洪文按捺不住，多少做了点自我批评。出于无奈，江青也开口了，她检讨自己对上次的会“自我批评不够”，“还要加深认识”。

自“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九年来，像这样政治局连续开会严肃地批评江青一伙，还是第一次。一贯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江青等人，现在闷声垂首地接受批评，也是第一次。不到一个月，江青向毛泽东和政治局上交了难得的书面检查，对于一年多里“四人帮”干的三件事逐项进行了检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我个人讲错了话，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不安定团结；关于个人自作主张到处送材料的问题，是无组织无纪律，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关于目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题，这一提法是主观片面的，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扩大打击面，严重地造成不安定团结。最后，她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9. 不管多大的老虎屁股，邓小平都敢摸

邓小平领导的反对派性的斗争作为整顿工作的前哨战，首战告捷。但是，邓小平并未松懈。在工交战线的整顿深入发展时，邓小平提出国务院要开务虚会。他认为，前些日子一个一个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看来这样不行。要研究长远规划，通盘考虑一下。在邓小平的部署下，从6月份起，整顿工作在全国全面铺开。

9月中旬，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全国各方面都要进行整顿的任务。他说：“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他还提出要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他说：“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没有这一条，扭转不过来。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搞生产也好，搞科研也好，反派性也好，都是作战。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整顿工作迅速在各条战线开展起来。

在以军队整顿为主题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严厉指出：决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他亲自主持了对全军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有力地稳定了军队，对于抵制“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起了重要作用。

在科技战线，张爱萍、胡耀邦分别率领工作组开始对国防科委和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张爱萍拄着手杖，拖着伤腿，上飞机，下基层。他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挺身而出，把混乱局面扭转过来！

他说：在困难面前讲客气，就是对党犯罪！胡耀邦不知疲倦地在中国科学院召开各种调查会，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伟大的新长征”，“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刮八级不行，得刮十二级台风”。

教育界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教育部长周荣鑫说：“到底在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怎么专法，专对了没有？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老说过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不对。”从6月至10月，《教育革命通讯》连续发表文章，集中论述这样一个观点：不引导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就势必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文艺界是“文化大革命”的发难地，这时也出现了新气象。被江青一伙诬为毒草而禁演的电影《创业》和《海霞》，经政治局批准公开放映了。《万水千山》、《长征组歌》等有影响的好节目重新公演，使“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四人帮”严加限制的“老家伙”的形象又一次出现在银幕上，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冲击波。

在农业战线，为了调整党的经济政策，中央下发了关于发展养猪业的文件，强调不能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

为了打破被“四人帮”严密控制的理论宣传阵地，理论宣传领域短兵相接的争夺战展开了。根据邓小平建议，经中央批准，国务院设立了由胡乔木负责领导的由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组成的政策研究室。在全面整顿深入发展的重要时刻，阐明和宣传全面整顿的大政方针，在思想理论领域澄清是非的重要文件开始形成了。

1975年夏季，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如火如荼，气势磅礴。

领导班子——经济领域——上层建筑，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环环相扣，层层深入。

这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全方位作战。

7月17日，在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中，对于正在好转的经济形势有如下一段记载：“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全面整顿虽然时间不长，但成效十分显著。在政治方面，从中央到地

方，党的领导逐步有所恢复和加强，“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混乱状态有一定程度上的克服，狠抓了批判和解决派性的问题，全国的安定团结局面开始出现。在经济方面，使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状态转为迅速回升。从第二季度开始，工业生产逐月上升，交通运输有较大改善，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等，均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全年社会总产值增长 11.5%，国民收入增长 8.3%。在这一时期内还建成了中国当时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完成了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线的全部工程；北起河南焦作，南至湖北枝城的焦枝铁路建成通车；在河北任丘地区发现了古汗山油田。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自 1972 年起陆续谈判进口的 43 亿美元成套设备的建设安装工作，也有了较大的进展。军工生产经过整顿，面貌也有改变。中央还决定压缩和调整中国对外援助的支出。对外经济援助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只占全国财政支出的 1% 多一点，以后逐渐上升。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上升到占财政总支出的 6.3%。1973 年竟达到财政总支出的 7.2%，主要是对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以及某些非洲国家的援助，已超过了国力所能担负的程度。因此决定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援外支出要降至占财政总支出的 5% 以下。全国财政当年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全党和全国人民从邓小平主持的全国整顿中看到了摆脱一片混乱局面的出路，看到了穿透乌云的阳光，而倍感欢欣鼓舞，并增加了信心和希望。全面整顿是老一辈革命家和党内外广大群众纠正“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又一次重大努力，也是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内乱提供的又一次良机。

如果当时能够按照邓小平的这一思路走下去，中国历史将会更早呈现出一种新的局面。

10.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 年，从春天到秋天，毛泽东一方面支持邓小平的整顿，另一方面又支持江青一伙搞所谓的“理论学习”、“评《水浒》”等。但总的讲是“扬邓抑江”，他不允许江青干预过多。

但是，当萧瑟秋风吹向大地的时候，气候发生了变化，形势发生了逆转。

1975 年 9 月底，从辽宁到北京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很快和江青一伙勾结到了一起，毛远新集中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向毛泽东进行了多次“汇报”和交谈。毛远新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怎样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文艺革命主流、支流……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 72 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刘少奇的

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标，即生产上去了。

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泽东被毛远新这些挑唆性的话打中了痛处，一反过去的态度，开始批评邓小平。

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他认为邓小平等人的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泽东让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等，讲了他的意见。邓小平提出异议说：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

从 9 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 9 号文件以后的评论，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昨天（11 月 1 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尽管邓小平作了有力的抗争，但是，中央政治局还是开了几次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并对邓小平进行了错误的批评。

然而，毛泽东还是希望邓小平能回心转意，在“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上和他统一认识。他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

可以说，毛泽东的用心是良苦的，他想只要邓小平能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正确的，就可以继续他们之间的合作，同时也可以堵江青等人的口。可是，邓小平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不肯让步，他婉言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说：“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邓小平后来把话说得更明白：“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要停止邓小平的工作，而毛泽东则让他“专管外事”。

接着，毛泽东借清华大学刘冰等告状事件又批评邓小平。刘冰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他和党委的其他人，于 8 月 13 日和 10 月 13 日，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报告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在政治、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风方面的严重问题。信是请邓小平转呈毛泽东的。迟群和谢静宜都曾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作为解放军某部军宣队的负责人驻清华大学，并“结合”到校“革委会”领导班子里。他们自认为是毛泽东身边的“小兵”，跋扈专横，目空一切。他们和江青一伙相勾结，在清华推行极左路线，教职工们对之极为反感。作为老干部的刘冰，实在看不下去，按照党的章程，向毛泽东反映意见，这应该是合理合法的。但是，毛泽东批示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1 月 3 日，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到清华大学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于是，从清华大学首先开始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1 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按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有 130 多名党政军负责人和其他方面人士参加的“打招呼”会议，正式部署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领导的持续九个月卓有成效的整顿，到此中止了。

1975年的秋天，萧杀的风呼啸于中国大地。

在医院的周恩来，动了14次手术。10月下旬，周恩来再次进手术室前，把邓小平叫到跟前，握着他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表示了他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当12月叶剑英看望周恩来时，周以微弱但清晰的声音嘱咐：“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手里……”这里的“他们”是指“四人帮”。

周恩来又说：“邓小平比我干得好。”1976年，中国进入“本命年”龙年。春寒料峭，严冬虽过，春天却姗姗来迟。

悲痛欲绝的人民群众，在寒冷而灰暗的天空下，站在几十里长安大街默默地送走周恩来的灵车，向他们心目中的好总理作最后的告别。

邓小平预感到斗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会愈加严峻。他在和叶剑英的交谈中，作了如下表示：没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就作了思想准备，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最坏是罗迈（李维汉）的下场！遗憾的是还有好多事没有作完，经济没有根本好转，许多老同志还没有解放。

叶剑英建议他“要不要再去找主席”，邓小平说：已经找过了，没有用了。我这个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决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政治局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我的工作，我估计，主席的决心已经下定，就要“换马”了！

叶剑英说：我估计，“换马”也不是简单的事，要换的话，无非两个前途：一个是下台，另一个是“一批二保”，至少还要继续留用一段，因为有些事情，主席不会全交给他们，他不会放心的！

邓小平同意这种估计，他说：我作了最坏的准备，但我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后继有人。我们的党是有希望的……我不在位了，不要紧，只要你老帅在，还有其他老同志在，就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不过，要讲究斗争方法，这是总理临终前的嘱咐。

正如邓小平和叶剑英所预料的，患病中的毛泽东确实在思索着“换马”的问题。一年前，他把“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的邓小平扶上了马，现在又认为“右倾翻案”而要“换马”了。但是，不能让“四人帮”上台代替已逝世的总理，这一点他还是清醒的，他知道这些人只会破坏，不懂建设。他认为，“华国锋水平不高，但忠厚老实，不搞阴谋诡计，不搞宗派主义，让他当总理我放心。”于是，他嘱咐联络员毛远新：“我提议华国锋同志任总理，请政治局审议。如果通过了，就发个通知。”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这些指示是毛泽东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其中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

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

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

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在《毛主席重要指示》发出以后，中央政治局多次开会批评邓小平，逼迫邓小平作检查。“四人帮”操纵的报刊发了大量大批判文章，把邓小平说成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还在走的走资派”。

但是，批邓不得人心，无论是在中央政治局或者是在群众中都遭到很大抵制。3月26日，清华、北大“两校”的造反派到中南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批邓”扩大会议，对邓小平实行围攻。在一片大批“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吼声中，邓小平自始至终一言没发。

“止谤莫如不言”，面对“四人帮”的疯狂围攻，他以沉默保持着自己的正义和尊严。

江青则称赞“两校”造反派：“你们向邓小平开炮开得好！”就在“两校”造反派大闹中南海围攻邓小平的时候，在上海、南京爆发了人民群众游行示威活动，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南京的示威群众呼出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杀头不要紧，拥护邓小平！”的口号。

南方的风暴很快扩展到了北京，扩展到了全国，形成了伟大的“四五”运动。北京市上百万群众，在清明节前连续几天集会于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对“批邓”表示不满。邓小平后来曾说：“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这一事件性质时，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

会议决定立即清理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和标语。调动民兵和公安人员进行镇压，抓“反革命”。4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卫戍区出动数万人血腥镇压了天安门广场的群众。

4月6日，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决定继续进行追击追查。江青一伙利用《人民日报》大肆制造舆论，制造白色恐怖，恶毒攻击邓小平。张春桥当面攻击邓小平是“纳吉”，把天安门事件说成是1956年的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同日，江青、毛远新到毛泽东处报告情况，江青提出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没有表态。毛远新汇报了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关于“四五”事件的决议，毛泽东在纸上写了：“同意，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后一决议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析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在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他第三次被打倒了。但，邓小平

的九个月的治理整顿，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先河，树立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新形象。

二、历史在 1976 年大转弯

江青准备“登基”；叶剑英：以快打慢；华国锋与“四人帮”绕圈子。

1. 叶剑英要华国锋负责任

那是一段多灾多难的岁月，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举国哀恸。

天降石雨，华北大地深处的岩浆在滚动，一道蓝色的电光穿越太空，伴着轰隆隆的巨响，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被夷为平地，整个中华大地在颤动，这仿佛是预示凶祸的某种征兆，全国笼罩着一种不祥的气氛。9月9日，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照耀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太阳轰然殒落了。亿万人民为失去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而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中国人在哭泣，在哀悼，也在惶恐、忧虑。

他们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主心骨”，不知怎样生活下去。“毛主席啊！没有你老人家，中国怎么办啊？……”许多人反复呼喊这样的话。

毛泽东的逝世，给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一伙造成了可乘之机，他们加紧为篡党夺权作准备。推行“乱政”的“四人帮”凭借他们窃取的手中权力，调动一切舆论工具和帮派力量，刮起12级台风，横扫邓小平、叶剑英等“老家伙”。他们制造了一个“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公式。妄图以邓小平为突破口，打垮从中央到地方到军队的反“四人帮”的健康力量。“四人帮”不仅往死里整活人，也不放过被他们整过的死人。刚刚故去的周恩来，生前是他们篡夺权力的巨大障碍。如今，虽然去世了，但他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目中留下深远影响是不可磨灭的。“四人帮”心里明白：要篡党夺权，必须彻底清除这个影响，要深入“批邓”，还必须死死揪住这个“后台”。因此，他们怀着刻骨仇恨，发动所有的宣传机器，继续疯狂地迫害已故的周恩来，压制和破坏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于是干柴加烈火，一场强大的群众性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抗议运动爆发了，它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毛泽东生前也多次批评江青反革命集团，使他们阴谋夺权的野心未能得逞，特别是提议由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对“四人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会见外宾的时候，他留给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三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后来被称为“毛主席临终嘱咐”的这三句话，对“四人帮”的覆灭，对确立华国锋的领袖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四人帮”看来，邓小平被打倒了，叶剑英靠边站了，李先念休息了，华国锋又刚刚上台，掌权不稳。这真是天赐良机，大权唾手可得！

他们的夺权目标，首先瞄准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央政治局。另外，他们还把大量武器突击发放到上海民兵手里。在其他地方，“四人帮”能控制

的“民兵”中也开始了动员和戒备。一场围绕党和国家权力的争夺战展开了。

毛泽东的遗体渐渐冷却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于凌晨1时40分全部被召集到中南海“游泳池”被称作“202”室的会客厅召开紧急会议，哭红双眼的华国锋首先向委员们宣读了医疗小组起草的死亡报告。主持会议的华国锋仍然沉浸在极度的哀伤之中，直到此刻，他还不明白这次会议的具体议程是什么，自己身为第一副主席应该做些什么，只是一味地哽咽着，用充满感情的语调喋喋不休地讲述着毛泽东对自己的教诲。说到动情处，泣不成声。

当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以农民的方式，一面粗声呜咽着一面深情赞颂毛泽东为中国农民所谋创的幸福时，国防部长、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挥手打断他的发言，神情漠然地对华国锋说：“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是议一议治丧的事吧。”张春桥随声附和道：“对，应该先讨论一下《告人民书》，今天必须发出去”。没等华国锋表态，他冲坐在一侧的姚文元吩咐道：“文元同志，你把《告人民书》给大家念一念。”姚文元点头应诺，摘下眼镜，用手帕擦擦泪眼，声音沙哑地将亲笔起草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念了一遍。当他读完时，大厅里一片沉静。委员们对讨告没有提出异议和补充。

华国锋扫视着会场，等了片刻，见确无人吭声，便宣布通过。

突然，江青怒冲冲地站起来表示反对：“不行”。她盛气凌人，挥动着一只手臂，语气武断而嘶哑地喊着，“这上头为什么不写批林批孔？为什么不写批判邓小平？今天会议忽略了一件头等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嘱咐的大事。”江青见自己的“提议”未被通过，很是恼火，可又不好发作，便借口要亲自给主席净身穿衣，悻悻离去。

继续批邓，把邓搞臭，这是“四人帮”精心策划的篡党夺权的重要步骤。他们非常清楚，邓小平虽已打倒，但其巨大影响尚在，必须彻底清除。没过几天，江青到清华大学发表讲话，继续煽动批邓，她说：“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要为他翻案。”影射攻击叶剑英和拥护邓小平的一大批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干部。

叶剑英这个名字对他们来说是最头痛的，自从林彪自我爆炸以后，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虽然宣布“生病，但实际上仍控制着军权。但是怎样才能搬掉这块绊脚石呢？”“四人帮”一时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9月11日，政治局委员们在人民大会堂一面轮流为毛泽东守灵，一面忙着出席会议。

当华国锋提出由汪东兴负责保管毛泽东的文件材料时，江青马上表示反对。华国锋仍坚持己见，一直闭目养神的叶剑英微微睁开双眼，慢吞吞地说：“我同意国锋同志的意见，主席的文件还是交给中办负责，由东兴同志管起来吧。”文件大战告一段落。

9月11日的会议上，张春桥侧目盯着华国锋，瘦削的脸上陡然浮上几分严肃：“国锋同志，有件事我要向你汇报一下。”华国锋不解地问：“甚事？”张春桥抖抖烟灰，说：“关于主席的遗体的安置问题。”华国锋安然一笑：“这件事不是中央已经有了决定，主席的遗体作永久性保存！以供后人瞻仰。”张春桥点点头：“是呵！是呵！但我听医生同志讲，由于没有及时采取防腐措施，遗体已经变质，不能再作永久性保存了。”华国锋震惊地瞪大双眼：“甚？你说甚？”张春桥加重语气，提高声量：“我说据医疗小组的同

志讲，凡未采取防腐措施而超过三天的遗体，便不能作永久性保存。”整个会场震惊了。

江青抢先跳起来了，声音嘶哑地哭喊道：“华国锋，这事你要说清楚，你为什么要毁掉主席的遗体？你安的什么心？你这样做对得起主席吗？”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两眼含着泪花哽咽道：“要是主席的遗体真出点差错，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呵！”华国锋宽大的额头渗出一层细碎的汗珠，神情慌乱地搓着双手，讷讷道：“这个，我实在不懂，也实在是没想到。”江青抹了抹眼泪，用手指点着华国锋：“现在，我可把主席的遗体交给你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要负责。”华国锋又急又怕，瞪着眼争辩道：“你为甚让我一个人负责？”江青拖长声调：“你是中央第一副主席呀！你现在主持中央工作呀！”华国锋额上青筋暴露，但尽量将话说得平和：“如果你们有意见，我可以辞去职务，但我决不能承担这个责任。”叶剑英用力一拍沙发扶手，大声道：“不，你要承担这个责任。”

江青同志说得很好嘛，你是第一副主席，你现在主持中央工作，主席的遗体你能不管吗？你能不负责吗？”华国锋眼含眼花，哀叹道：“叶帅，主席的遗体已经放了三天，我就是舍出性命也保不住了。”叶剑英笑微微地宽慰道：“当年胡志明同志逝世时，他的遗体就是停放了三天之后才决定作永久性保存的，直到今天仍保存得很好。”华国锋一颗忐忑的心终于安定下来。

2. 王洪文私设办公厅

华国锋根据叶剑英的建议，向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去求援的电报，可越方仍未回电答复。他回到家已是12日凌晨3时了，但仍没一丝睡意。

这时，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从长沙打来电话，反映了一重要情况。

华国锋听罢张平化的电话，心中更增加了几分焦虑，几分不安。王洪文私设中央办公厅的目的很清楚，就是盗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向各省市发通知，架空自己，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以便取而代之，这是“四人帮”向自己夺权的一个危险信号，他感到事态很严重。

华国锋当即问叶剑英，叶剑英也不知道此事。他们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各地，澄清是非，并发出通知：发生重大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

在北京西郊的长安大街南侧有一座设备豪华，专属军方的高级寓所，这时专程从上海来京瞻仰毛泽东遗容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便住在这里。

9月11日夜10点多，张春桥驱车来到京西宾馆，询问了一些上海的情况，特别是对上海民兵队伍的建设，他表现得尤为关切，了解得尤为仔细。一面听，一面不时往小本上记录，当王秀珍讲到民兵的武器装备时，他抬手打断对方的谈话，冷冷地问：“听说上海还有大批武器放在库房里？为什么不发下去？难道真要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吗？”马天水解释道：“6月以来，我们陆续增发了两万多支步枪和近十万发子弹，目前库存还有十万多条枪枝、近千万发子弹，准备在急需的时候装备民兵。”张春桥断然道：“现在就是最急需的时候。不要等修正主义上台，把你们象抓小鸡一样一个个抓起来，当然，那也没什么，无非是杀头，我是早就准备杀头了。”马天水立即表态：

“你说得很对，我们回去马上执行。”马天水回到上海后，马上作了“立即将库存的七万条枪都发下去”的批示。

经过马天水批准，七万多件武器很快就突击发放到上海民兵手里。

十天后，上海市委派徐景贤突然急匆匆来京，他依旧住进了京西宾馆，还未来得及休息，就被接到了钓鱼台16号楼。张春桥已在客厅等候。

徐景贤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就有丁盛到上海找马、徐、王密谈的情况。

徐景贤对张春桥说：“丁盛讲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的领导人全是许世友的人，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正好在南京、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较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徐景贤还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

9月28日，张春桥给上海的指令中说，有人要搞上海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打仗就要有实力，我们的实力就是上海民兵，在这里，张春桥向他们发出要打仗的动员令。

面对“四人帮”的篡党夺权活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更加觉醒了。人们把希望的目光一齐投向北京，投向党中央，希望能有人站出来，振臂一呼，带动千军万马，涤荡妖雾，重整乾坤。

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是否能担此重任呢？“四人帮”处处给华国锋施加压力，向他发难，攻击他，在“四人帮”抢班夺权、咄咄逼人的新形势下，这位新领袖的意向如何？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叶剑英作了这样的估计，在他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是慑于“四人帮”的压力，委屈求全，维持下去；二是与“四人帮”又斗争、又联合，最终来个“权力再分配”，让出一部分权力；三是坚持同“四人帮”斗争，彻底打垮他们，在这几条道路面前，叶剑英希望华国锋同自己一样，能够选择最后一条路，并且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能够坚定地走下去。

扶助华国锋，支持华国锋，打垮“四人帮”，这是叶剑英经过深思熟虑得出来的唯一结论。

就在叶剑英思考怎样收拾这伙败类的时候，其他的人如陈云、聂荣臻、李先念、邓颖超等也正考虑如何清除“四人帮”这个关系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并找到叶剑英商量对策。

陈云的来访，是由王震“串连”后，叶剑英派车把他接来的。

邓颖超来了，叶剑英赶紧迎到客厅里。

叶剑英知道邓颖超的来意。没等她开口，就把自己最近一个时期的想法来个“竹筒倒豆子”，直接交底。

有一件事，她还是不放心，故提醒说：“叶帅，你说力争合法，这是上策。要合法，有一个人首先需要站出来的。”叶剑英悄悄地告诉她说：“请你放心，这个人的工作我正在做，估计到时候，会站出来。”两位老战友谈到这里，互相望着，会心地笑了。

叶剑英知道邓颖超说的“这个人”是谁，这也是他一直正在考虑的问题。这场斗争首先要取得华国锋的大力支持，由这位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最后拍板。同时，也是力争合法解决“四人帮”的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叶剑英主动关心他，接近他。

当毛泽东逝世后，江青一伙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叫“批邓”不力，干扰毛泽东治丧工作，给华国锋施加压力进行刁难时，叶剑英就处处支持华国锋

的领导，大煞了“四人帮”的威风，在参与治丧后事中，一次又一次地与他接触和交谈，两人从治丧转入谈形势。

从北京说到上海，从上海又说到民兵指挥部，“第二武装”……从交谈中，叶剑英察觉到华国锋对“四人帮”的做法表示反感，也正考虑如何处置他们，似乎内心里还有顾忌。

人们也许还不会想到，这座美丽的西山，竟成了铲除“四人帮”的秘密“联络站”，叶剑英利用西山这个隐蔽所，同能够接触的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人个别交谈。同中央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如谭震林、康克清、耿飚，三总部的杨成武、梁必业等，还有在京的各军兵种负责人如空军张廷发、吴富善，海军肖劲光、苏振华，以及向守志、吕正操、余立金、傅崇碧、吴烈等人交换对形势的看法，酝酿锄奸。

另外，还利用一切机会，同全国各地来京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及其他党政军各界的负责人进行了个别的酝酿活动。

3. “四人帮”篡改遗嘱

9月19日下午3点多，因身体不舒服，已经两天没给毛泽东守灵的江青突然赶到人民大会堂，找到华国锋，要求立即召开紧急常委会。在这之前，她已打电话通知华国锋。

“四人帮”又开始发难了。

当时，华国锋刚给毛泽东守完灵，江青便打来电话要华国锋亲自接。华国锋无奈，只得抓起高频保密电话。还没容他询问，江青便开门见山，提出要马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

在江青的威逼下，只好问在人民大会堂的几个政治局委员怎么办？王洪文、张春桥早就与江青密谋过，齐声回答：“按江青同志交代的办！”等到3点多，江青才披着黑纱姗姗而来。她一看姚文元和毛远新没到，瞪着眼睛冲华国锋责问道：“文元呢？远新呢？你为什么不让来？”江青气冲冲地坐到沙发上，冲华国锋挥手：“开会吧！开会吧！”没等华国锋宣布，她便情绪激昂地开始发言，俨然摆出“党中央主席”的架势，谈天说地，东拉西扯，一会讲她如何深入基层搞了许多调查，一会讲全国人民如何把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倾注到了她的身上，这几天她收到慰问信足有几十万件等。

江青突然话锋一转：“可中央有人却借着主席逝世打击我，我想看看主席的文件和手稿，都不行。你们翻一翻国际共运史嘛，马克思死了，他的书稿就是夫人燕妮帮助整理的，列宁死了，他的书稿就是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整理的，我是主席的妻子和秘书，我为什么没有权力保存和整理主席的文件与手稿？”华国锋打断她的话说：“关于主席的文件和手稿中央政治局不是已经作出决定，暂仍由东兴同志和张玉凤同志清理吗？”会议足足争吵了四五个小时，最后华国锋坚持毛泽东的一切文件、材料和书籍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

这次非法的会议，叶剑英虽然没有出席，但事后汪东兴向他作了报告。他一方面感到华国锋顶得好，在与“四人帮”纠缠的道路上毕竟前进了一大步；另一方面，感到忧心和气愤。“四人帮”如此嚣张，欺人太甚！竟敢威逼党中央第一副主席非法召开“紧急常委会”，竟敢把他这个党中央副主席和其他常委排除在外！更不能容忍的，江青还口口声声要她和毛远新出席“常

委会”，围攻华国锋！

她这是明目张胆地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这哪里还有党规党纪可言呢？一定要想个法子收拾这伙败类。

由江青提议的政治局常委会，一直开到晚上 7 时才结束。会后，华国锋同汪东兴又谈了一会。汪东兴望着华国锋的脸色，忿忿不平地说：“这样下去不行，得赶快想个办法。”华国锋用信赖的目光凝视警卫团长：“你说怎么办？”汪东兴挺挺腰板、坚定地说：“我听你的”。

华国锋摇摇头：“等把主席的丧事办完，再慢慢解决吧。”汪东兴直言不讳地提醒道：“慢了恐怕不行！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样的教训太多了。”汪东兴告辞走了，华国锋找来卫生部长刘湘萍，听取了中越专家小组对毛泽东遗体的处理情况。等他回到家，已是深夜 11 点多了。

他径直走进二楼办公室，见宽大的写字台右上端放着一个土黄色的信封，上书“华国锋同志亲启”，下端印着“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他忙撕开信封，却从里面抽出一张折叠的《人民日报》，既无公文又无批示。他又用力抖了抖，仍没发现一条带字的纸片。

华国锋凝思片刻，又展开折成长条的《人民日报》细细查阅：“头版通栏大标题《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里》，忽然，华国锋的目光被一处标着红红的字迹吸引住了：“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在“办”字后面还用红笔来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他思索着，猜测着。电话铃响了。华国锋拿起话筒。

话筒中传来张春桥的声音：“国锋同志，今天《人民日报》刊登了社论，你看到了吗？”华国锋不露声色：“我正在看”。

张春桥抬高几度声量：“社论中首次发表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应在悼词里加上主席这句话。如果在悼词里没有，势必引起人们的猜测，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华国锋也随和地笑笑：“你的意见我可以提交政治局讨论。如果大家同意，我当然举双手赞成，好，再见！”没容对方答话，他已重重压下话筒。

华国锋当然不会让张春桥牵着自己的鼻子走。

第二天，政治局没有开会。悼词没作任何改动。张春桥整整打了一天电话，始终未找到华国锋的踪影。气得江青直骂：“这个华老西，和我们绕起圈子来了。”叶剑英吃罢晚饭，和往常一样离开居住的 15 号楼，到山间漫步，他正悠然自得地吟诗赏景，忽见值班秘书领着总参谋长杨成武沿小路匆匆而来。

杨成武受聂荣臻之托，传话给叶剑英。

聂荣臻对杨成武说：“要有所警惕，这几个东西是一伙反革命。”

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邓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把华国锋也除掉了，那就麻烦了。他们几个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无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接着聂荣臻交待杨成武赶紧返回西山，把这个意思传给叶剑英，并且再三叮嘱切实保密，事不宜迟。

杨成武告别了聂荣臻，连夜上山。

杨成武将聂荣臻的意思如实转告。听完汇报，叶剑英高兴地说：“听明白了，明白了。”他走近杨成武，眼睛里放出异彩，兴奋地说：“你告诉聂总，

请他放心。他跟我想到一起来了，有事随时通报商量。”阴谋家的嗅觉往往是很灵敏的。“四人帮”为了监视叶剑英的行动，在钓鱼台 17 号楼经过一番秘密策划，决定派刚从上海回京的王洪文住进西山。这个党中央的副主席选择建筑水平很高的 25 号楼，一方面显出他的高贵；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靠近叶剑英，便于加强监视。25 号楼座落在西山半腰，在叶剑英住的 15 号东南几十米的地方，王洪文在这里可以窥视上山过往人的行踪，观察 15 号楼的动静。

面对“四人帮”步步进逼，特别是在封存文件和处理遗体等问题上无理纠缠，连连发难，弄得华国锋寝食不安，特别是听说上海第二武装进入战斗准备状态之后，他深切感到“四人帮”的反党气焰越来越凶，不能再忍让，是该反击的时候了。

叶剑英在以往的交谈中就向华国锋提出了意见。

“国锋同志，现在有几个人尽出难题，干扰太大，政治局的会议有时开不下去，这样下去不行啊，得想个办法。”叶剑英点出了题目。

华国锋回忆着，是啊，不能再拖延了。

他想自己出面去找叶剑英不大方便，便驱车来到李先念住处。

“先念同志，还是请你上西山一趟，转告叶帅，就说我的意见，务必请他想个办法解决，我已下定决心了。”李先念爽快地接受了这个重大使命。

这一天下午，天高气爽，日暖风清，正是出游的好日子。李先念以逛西山植物园为名去见叶剑英。

现在隔绝好久的李先念来了，又是在王洪文监视之下上山来了！

叶剑英猜老战友此时冒险而来，可能有要事相商，便郑重地问道：“你是因为个人关系好来看我，还是奉命而来？”“两者都有。”李先念环顾四周，爽快地说。

“啊！明白了。”叶剑英习惯地扭开了收音机，放大音量。

李先念压低声音，“华国锋下决心了，他的意思请你考虑采取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才好。”“好极了！”叶剑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盼望此刻已经很久了，需要他最后下决心，拿主意的时候终于到来了。他愤愤他说：“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他们密谈了一会，感到事关重大，需要妥善处理，周密部署，当机立断。但时间和环境不允许他们多谈，两人只得依依惜别。

当华国锋从李先念那里返回驻地，这位身负重任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处于临战前的准备状态，心情既紧张又焦虑。

“四人帮”夺权的“伟大计划”的重点还是“武战”，自始至终把更大的希望，更多的力量放在“第二武装”上。现在，就要派上用场了。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将一个团——约 4 千余人、120 门重型大炮，拉上了天马山，并在江南造船厂把两艘货轮突击改装成炮艇。

王洪文亲自去上海，张春桥要上海马上突发武器。上海的亲信在他们的旨意下，紧急行动起来，王洪文从上海返回北京后住进西山，但对上海还是放心不下，给王秀珍电话，叮嘱她：“要提高警惕。”当王洪文发现叶剑英在西山上消失的时候，深感事态严重，他们又聚集到钓鱼台 17 号楼商量对策，决定加强“文战武备”发起新的凌厉攻势。他们一面玩弄“文革”初期制造贺龙“二月政变”流言的手法，又造谣说叶剑英在西山也有个“军人俱乐部”，图谋不轨。

另方面，亲自出马抓“枪杆子”。江青到昌平某师，王洪文到保定某军，张春桥到通县某部队，分头去“串连”，但谁也拉不动部队。

与此同时，用更大的努力巩固上海的“根据地”。

形势越来越紧张，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最后决战时刻来到了。

当叶剑英从李先念那里得知华国锋的意见后，第二天，叶剑英只身进城，来到华国锋的住处。事到今天，两人省去了许多暗示，开门见山，就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进行了秘密商谈。

华国锋先后摆出两套方案——召开中央全会，彻底揭露他们的反党罪行。或者召开政治局会议，由政治局解决他们的问题。

叶剑英先后否定了这两套方案。

叶剑英慢悠悠地说：“对付这几个人只能智取，不能硬拼。就是当年处理林彪的‘四大金刚’的办法，‘四大金刚’即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彪摔死后，‘四大金刚’还活着，还都在政治局，又控制着军队的要害部门，最后周总理想了个办法：把‘四大金刚’调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在会议上突然宣布他们的罪行，把他们当场逮捕，关押起来，然后再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这就叫先动手、后开口。”华国锋脱口称赞道：“这个办法好，就按你说的办法做，出其不意，打他个措手不及！”叶剑英盯着对方：“我们要赢得这场斗争，还需要汪东兴同志合作，特别是他与中央警卫部队的关系，在这场决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华国锋自得地一笑：“叶帅放心，此事我已同他谈过多次。”叶剑英急问：“他是什么意见？”华国锋：“和你不谋而合。”叶剑英点点头：“好！他若如此坚决，我们就更有把握了。”最后经过慎重研究，确定以召开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名义，吸收姚文元参加，对江青另行处置。华国锋亲自主持会议，叶剑英亲自坐镇指挥，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

具体事宜由汪东兴负责办理。至于时间，拟过了国庆准备十天，视情况而定。

在作了一系列的反革命夺权准备之后，“四人帮”杀气腾腾，磨刀霍霍，剑首出鞘了。这就是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在京的和外地的一些委员。午夜11点，会议正式开始。

“四人帮”经过充分准备，决心大闹一场，企图把党的领导权夺到手。江青对此很有信心，她气哼哼地首先发难，劈头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她放肆攻击华国锋处理所谓“保定问题”，优柔寡断，没有能力。王洪文、张春桥一唱一和，要求加强集体领导，安排江青的工作，他们所谓“安排工作”无非是让江青当党中央主席。这是毛泽东逝世后，他们酝酿良久，迫不及待地要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

“四人帮”心里明白，只有打出江青这面旗帜，才能压倒华国锋。

“四人帮”大闹政治局，围攻华国锋，就是要逼他交出中央领导权。华国锋终于看穿了他们的一连串诡计，再也不能退让，决定最后摊牌了。

这位中央第一副主席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坚定地说：“会议开到这里，不要再吵闹了。我认为毛远新应该回辽宁去，这是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定。”他强调：“由于叶副主席和其他一些委员不在场，关于三中全会问题根本不能讨论。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站起身来，宣布散会。

这是中央政治局和“四人帮”围绕夺权与反夺权斗争的又一次公开较

量。

江青一伙的阴谋又一次失败了。

9月30日晚7时，天安门广场突然华灯齐放。400多名群众在暮蔼浓重、肃穆庄严的气氛中，列着队登上天安门城楼。

华国锋走过来了，王洪文紧跟其后，第三个走过的是叶剑英，跟在他后面的是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三个人暗自庆幸华国锋、叶剑英终于被逼着开这个“座谈会”，因此踌躇满志，盛气凌人。

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宣布开会，随后代表们按“四人帮”定调准备的稿子，一个一个“批判”发言。最后华国锋第一副主席讲话。

华国锋这个历时仅一分钟的国庆讲话，显然经过仔细推敲的，既有力又简短，“四人帮”没有料到，他竟不讲“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讲党的基本路线，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更不讲“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因而越听越气。相反的，叶剑英越听越满意，觉得这个讲话，一反“四人帮”规定的“革命高调”，实在难得，他高兴地笑了。

然而，第二天，在姚文元的把持下，《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新华社对这次座谈会的报道。文章写道：“今天晚上，首都工农学商群众代表四百多人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座谈会，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七周年。大家热情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畅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在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照耀下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回顾在毛主席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胜利，愤怒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大家表示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遵照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这篇报道不知要比华国锋讲话长了多少倍，说出了“四人帮”要说的话，与华国锋大唱对台戏。

“四人帮”夺权的“逼宫战”，步步紧逼，日甚一日。

4、以快打慢

进入10月份，“四人帮”磨刀霍霍，举行武装暴乱的部署已经就绪，这是一个风雷激荡的十月，一个剑拔弩张的十月！

张春桥炮制的“怎样巩固政权”的“杀人”纲领，就要实施，按照他的黑话：“历史与现实”，“革命与专政”，“批邓”与“镇反”“杀人”，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

姚文元说过：“为什么不能枪毙一些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王洪文叫嚷：“在上海找一百条狗困难，提一万个、十万个反革命容易。”“四人帮”与上海的余党一直保持着“一级战备水平的联系”。

几个月来，上海死党与王洪文、张春桥“热线联系”达146次之多。

“四人帮”已准备了告人民书，政变后即通知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布。他们依仗上海和北京的“民兵”武装这个强大“后盾”，开始了政治舞台上最后一场争夺战。

10月1日。国庆节，江青跑到清华大学发表讲话，诬蔑邓小平“迫害毛主席”，叫嚣要开除邓小平党籍，并发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下去，要提高警惕。

10月2日，王洪文私拍“标准像”，为上台做准备。原来，“四人帮”已经排定夺权后“座次”名单，所以抓紧时间，纷纷抢拍个人标准像和“历史性”合影。

10月3日，王洪文跑到平谷县大放厥词：“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并且肯定地说：“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10月4日，“四人帮”以“梁效”名义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公然发出篡夺最高领导权的信号。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反革命事件。从9月16日，抛出用黑体字套印的所谓“按既定方针办”。

他们凭空捏造一个“既定方针”，否认了毛泽东抄给华国锋的“三点指示”，既然“临终嘱咐”是给“四人帮”的，那末，他们就是毛泽东的合法继承人，是毛泽东思想的“正统”，而华国锋是非法的。

更甚者，他们会说华国锋篡改了毛泽东的“临终嘱咐”，而篡改就是“背叛”，就是“修正主义头子”，华国锋就该被打翻在地。可见动机是多么恶毒！

华国锋决定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反击。

华国锋在10月2日，乔冠华送审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上特意批示：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这一“删”激怒了“四人帮”，张春桥出马阻止传达华国锋的批示。果然，10月4日，“梁效”文痞们按张春桥、江青的旨意，炮制出了上述《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的长文。

这是“四人帮”给大小喽罗们发出的一篇战斗“檄文”，一个紧急进军号令。

这篇“檄文”使华国锋震惊了。他看了一遍又一遍，越发感到斗争就在眼前。

“四人帮”已打响了第一枪，叶剑英这时正干什么呢？叶剑英离开西山后，搬到玉泉山9号楼。连日来，元帅表面上沉静如常，但内心一点也不平静，他以百倍的警惕，留意山下的动静，提醒秘书加强值班，有闻必报；让身边的人员加强戒备，以防不测。全天，警卫参谋双枪在身，寸步不离。

在许多消息和情报中，叶剑英非常关心“四人帮”调动部队的传闻。他让办公室转告作战部，一定要查清楚。一旦发现任何人有非法调动部队的动向，立即坚决制止。

《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的社论象一股瘴天雾地的龙卷风，刮遍了华夏大地。

中国大地在颤抖！

姚文元关起门来，赶制各种“诏文”张春桥、王洪文摇着电话机，忙着调兵遣将。

“民兵指挥部”昼夜值班，“第二武装”开始行动了。

种种迹象表明，“四人帮”就要动手了，一场反革命政变迫在眉睫。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断定“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先兆”。“见而不发，人将先反，发而不敏，人将先收”。他感到不能再等待了，若推迟下去，

则不是我们解决他们，而是他们解决我们了。

华国锋正在客厅里踱步。正为国庆后“四人帮”发动攻势大伤脑筋，尤其是10月4日社论，使他心烦意乱。

叶剑英的突然到来，主人神情为之一振。

“看到他们发出的信号了吗？”“国锋同志，看来事态的发展，不许我们再等待了。必须当机立断！”“根据我们准备的情况，我想至迟后天动手，你看怎样？”为此，叶剑英又来到了汪东兴家里，听他汇报最后一项准备工作落实的情况，对遇到的难题摆开来一一解决，使计划更完善，更为可行。

叶剑英和汪东兴从警卫人员的挑选到“隔离审查”的措施，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慎重敲定，由汪东兴负责主办，检查落实。

这时的中央办公厅，气氛有点异常。

汪东兴根据华国锋、叶剑英的指示，有秩序地进行着“战前准备”和“战斗动员”。

分别召集负有特殊使命的行动组，小组成员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精选出来的，一致表示愿意为保卫党中央，为民除害，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并严守纪律，绝对保密。汪东兴带领小组成员宣誓，之后，进行了具体分工，按人头四个人抓一个，还在大厅里进行了演习。

10月6日下午4点多，小组成员秘密开进怀仁堂，悄悄埋伏下来……晚7时，叶剑英和今宵的主人华国锋几乎在同一时间到达，而汪东兴带着警卫人员却已守候在大厅左右。

在夜幕笼罩下，厅堂屋檐上雕刻的各式精美图案已经模糊不清。宽敞的大厅内却被莲花吊灯照得如同白昼。

整个怀仁堂静极了，静得可怕。

叶剑英、华国锋坐在沙发椅上，焦急地等待着来“开会”的另外三个人。

命运之神好象作错了安排。最先露面的竟是张春桥，接踵而至的是王洪文。姚文元终于出现在怀仁堂，经请示华国锋、叶剑英同意，没有让他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东厅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一位副团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听完后，这条“金棍子”立刻软了下来，象断了脊梁的赖皮狗一样，瘫倒在地。

就在怀仁堂“会议”紧张进行的时候，另一个执行同样任务的行动小组，来到中南海万字廊201号。

居住在这座豪华殿堂的江青，此刻正一边看着进口的录相片，一边翻着今天送来的一叠厚厚的情况“清样”，得意洋洋，沉浸在美妙的女皇梦中。

突然，几个不速之客，未经请示，出现在尊贵的殿堂大厅里。

“女皇”斜视一下门口，厉声喝道：“你们是干什么的？”行动组负责人向她宣读了“隔离审查”决定。

“女皇”一下子明白了怎么回事，蓦地站起来高声斥道：“你们快出去！”接着连连呼叫：“来人啊！来人啊！你们在哪里？”这个作威作福的寡人已众叛亲离，所有“201”工作人员再也不理睬她了。

晚9时，叶剑英和华国锋按照事先商定的计划，在怀仁堂召见了耿飏，命他带上一个营兵力，立即接管被“四人帮”控制的中央广播电台、新华社等新闻机关。

5、玉泉山会议

与此同时，请在京政治局委员立即上玉泉山 9 号楼，召开政治局会议，与会人员听到解决了“四人帮”，欢欣鼓舞，有些人流下热泪。

叶剑英通报：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千千万万正在梦乡里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送走了黑夜，迎来了黎明，蓦然间睁开双眼的时候，将会看到什么样的奇观啊！

对王、张、江、姚实行“隔离审查”，只是采取行政手段，暂时从组织上制止了他们的反革命活动，而上海、北京和全国各地的“余党”还在苟延残喘。上海是“四人帮”的重要据点，“第二武装”大本营所在地，是一个顽固的反革命堡垒。

10 月 7 日，马天水到京之后，听到传达，第一个反应：“这是突然袭击，宫廷政变，右派政变”！他用“暗语”与上海通信。制定作战方案，制作了第一、第二、第三道防线兵力部署图，下令民兵进入“一级战斗状态”，与中央决一死战，发誓要“血战到底”！然而“四人帮”及其余党长期以来在上海策划的反革命“暴乱”阴谋，并未得逞。

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召开一系列会议，分析上海的形势，认为死心踏地为“四人帮”殉葬的死党只是极少数，上海民兵的绝大多数是受蒙蔽，一旦明白事实真相，是会拥护党中央，坚决与“四人帮”及其余党作斗争的，因此，决定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和平解决问题。

为此中央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上海工作，经过一番艰苦紧张的斗争，上海终于摆脱“四人帮”的控制，重见天日，喜庆新生。

10 月 18 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通知，列举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罪行，宣布了对其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粉碎“四人帮”的消息飞向全国各地。在除四害的强大气浪震荡下，隐藏在各个角落的“四人帮”余党，末日来临，土崩瓦解。

10 月 24 日，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集会，庆祝伟大胜利，愤怒声讨“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首都北京阳光灿烂，晴空万里，红旗飘扬，普天同庆。

在北京盛传着“买螃蟹”的故事，叶剑英后来在给小女儿写信道：“十月六日，又看戏，又吃螃蟹，吃三只公的，一只母的，作为纪念胜利。”横行霸道、猖狂一时的“四人帮”落得个可耻下常 1981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检查起诉和公开审判。“四人帮”这伙篡党窃国的大盗，终于被押上了人民的审判台。

千秋功罪，人民自有公断，巨奸国贼已成为历史风云中的小丑，被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粉碎“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是中国走向新的未来的开始。

三、“两个凡是”和新的个人崇拜

华国锋紧抓“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三条主席临终遗嘱；华国锋搞“两个凡是”；邓小平要求复出；华国锋不忘批邓。

1. 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的华国锋

对毛泽东绝对的忠诚和忠诚的绝对，是华国锋崛起的关键所在。

华国锋诚实纯朴，工作踏实，深得毛泽东好感，毛泽东多次赞许：华国锋是个老实人。1952年华国锋任湘潭县委书记，短短十几年时间，华国锋跃居公安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1976年毛泽东的一句“你办事，我放心”，明确了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毛泽东逝世后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同时兼任国务院总理。

粉碎“四人帮”，华国锋留下千秋功业。

华国锋生于1921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上中学时，开始接触进步书刊，思想倾向革命。1938年，当他的家乡山西交城县遭到日军侵略时，17岁的华国锋走上抗日道路。1940年，华国锋任交城县工农青妇武各界联合会主任，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华国锋担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不久又担任了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华政委”之称，便始于此时。

那首“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有个华政委”的歌便源于此。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命令山西抽调一部分地方干部随军南下。

华国锋第一个报名，先到湘阴县任县委书记兼武装大队政委，1952年调往湘潭县任县委书记，几个月后，被提升为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行署专员。1954年，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从此，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与毛泽东结下了不解之缘。华国锋的名字，同毛泽东家乡的名字并驾齐驱，随着伟大领袖的威望的提高而日益显露。

1955年7月，毛泽东作了《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34岁的华国锋写了《克服“左”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等三篇文章。华国锋的名字第一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路过湖南时，接见了华国锋。于是，湘潭成了湖南省的标兵。外电则称华国锋为中国的“农业专家”。

1955年10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主席特邀华国锋作为列席代表。在会上，华国锋介绍了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这次进京，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很好的印象。毛泽东满怀喜悦地戏称，“你是我的父母官哪！”“你是个老实人！”1959年夏，毛泽东离开北京，途经长沙，华国锋安排并陪伴了毛泽东的家乡之行。

此行，毛泽东心情激动，思绪万千，写下著名的怀乡诗：“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不久，毛泽东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此后，毛泽东一到湖南，华国锋总是热情接待，虚心请教，毛泽东总赞叹华国锋是老实人。1963年10月，华国锋带领湖南干部到广东参观学习，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读后很有感触，写了很长一段批示，号召全党克

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从此确立了华国锋在湖南的稳固地位。

“文化大革命”中，华国锋负责从长沙到韶山毛泽东家乡之间修一条铁路，把大批红卫兵送致韶山。他得到红卫兵的信任，几乎没有受到冲击，很快当上了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后出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九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0年12月，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提及华国锋：“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

第一个是湖南省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实人。”这一次谈话，使得华国锋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美国报刊上，华国锋因此名扬海外。

华国锋语言不多，思想深沉，憨厚老实，善于领会毛泽东的意图，经常到北京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他纯朴热情、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和憨厚自谦的形象，给毛泽东留下值得信赖的印象。因此，1971年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从上海调来王洪文的同时，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党的十大后，王洪文成为党中央副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还接替谢富治担任公安部长，从此在北京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后，由谁来继任，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毛泽东权衡再三，一年前，他把人才难得的邓小平从江西接回来并亲自扶上马，但现在由于对文革的分歧，又不满邓小平，也不满意被他多次批评有野心的“四人帮”，最后出人意料地选中了华国锋。在1976年1月21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时说，华国锋、纪登奎等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他们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就清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此后，华国锋开始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华国锋是毛泽东一手提拔起来的，他忠厚老实，以毛泽东的话为准则，深得毛泽东的信赖。1976年1月21日、1月28日经毛泽东两次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于2月13日发出中共中央1976年1号文件。

据后来毛远新讲，毛泽东曾问他：张春桥怎样？毛远新答：阴阳怪气。又问：华国锋怎么样？答：忠厚老实，毛泽东说：“重厚少文。”毛泽东是以华国锋比汉高祖刘邦时周勃。“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天下者，必勃也”。

2. “两个凡是”的误区

“两个凡是”不是华国锋的创造，早在1972年中共中央解决一个省的领导人问题时，汪东兴就说过：“凡是经过毛主席批示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动。”1976年10月26日这天，中共中央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华国锋在这个会议上的讲话要点是：第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第二，批判“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第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要坚持，决不能批；第四，不能为“天安门事件”翻案。

当时，汪东兴负责全国宣传工作。一天，华国锋听完汪东兴的汇报后叮嘱他说：“我们一定要把住一个防线，那就是‘两个凡是’。”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不能违反。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我们通常知道的“两个凡是”。

11月18日，汪东兴主持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

在会上，他态度坚决地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并且很不客气地批评邓小平：“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讲话中，他还主张继续办“四人帮”搞的样板学校——朝阳农学院，要求继续放映炮制的样板戏。他的理由是：这都是毛主席讲过的，“是毛主席的指示。”11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在全国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讲道：“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毫不隐讳地认为：“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样做是分裂中央。他和华国锋是一个调：“要把‘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两个凡是”的基本构架已经形成。1977年1月8日前后，在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活动中，人民群众很自然地提出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要求。这些要求通过大字报、大标语的形式在首都和其他一些地区反映出来。人民群众还将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的诗词搜集起来，编成诗选，广为散发。

华国锋、汪东兴对此是不满意的。汪东兴指责《人民日报》准备纪念周恩来的文章太多，说只要登三五篇就行了。还规定，不准用个人名义写回忆文章；不准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准周恩来的纪念、展览对外开放；不准《人民日报》发社论；对周恩来的评价不能超过悼词，因为那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汪东兴还责怪印天安门诗选是为“天安门事件”翻案，并警告出版印刷者说：定“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是谁说的呀？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嘛！你们要翻案，翻谁呀！翻毛主席嘛！要追查诗选是谁出版谁印刷的。

闻此指示，《人民日报》有人气愤了：“‘四人帮’不让悼念周恩来，‘四人帮’打倒了，怎么还不让悼念周恩来；不管他！发，发个够！8日这天，人民群众也来到天安门广场给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缅怀周恩来。

汪东兴对此很恼火，他打电话质问《人民日报》社编辑部：“怎么？你们想推翻中央的悼词，给周总理另外写一个悼词吗？”《人民日报》社的人一听心里窝火，顶了他一句：“这是人民的意愿，你总不能不让人民说话吧！”1977年1月中旬，华国锋要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的思想写进一个讲话提纲里。几天后，讲话草稿中已经出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华国锋还通过中央宣传口的一位负责人，分别于8日和25日，指示《人民日报》写篇社论。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号召学好刚刚发表的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重要文件，牢牢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社论有针对性地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就在同一天，《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以同样的规格即以通栏大标题，全文排4号宋体字，加框刊出的规格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

这一社论的起草者是中央理论学习组。2月4日，汪东兴曾对文件清样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修改，我看可以用。”由于文章来头太大，“两报一刊”的负责人不仅毫不知情，而且也不敢“拒载”。

连当时中央宣传口的另一位负责人耿飚也被蒙在鼓里，他在讨论这篇

文章时坦然陈言：“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上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但该文毕竟是以“两报一刊”社论的形式面世了，它等于是向全国人民宣告，这是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意志。其实也就是华国锋的政治宣言书。

在“两个凡是”方针下，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于1977年3月10日召开。华国锋在3月14日发表的长篇讲话中，再次要求全党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值得一提的是，推行“两个凡是”是同宣扬新的个人崇拜捆绑在一起的。

3、邓小平给党中央写信请求工作

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的4月7日，邓小平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后，在位于东交民巷宽街的一所古老宅院里，被监管了两个多月。

8月份因病住进北京301医院6楼，接受手术治疗。

手术很成功，我们党和国家的手术也很成功——“四人帮”这个毒瘤被根除了。

10月7日，叶剑英打电话告诉邓小平“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邓小平惊喜万状，感叹道：“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应该说，这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创造了历史性机遇和可能。

对此，邓小平心如明镜。

其实，叶剑英等人同样非常关注邓小平的复出，而且随着时局的发展，这种愿望更加迫切，因为这事关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也就是在10月7日，刚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叶剑英就向华国锋提议，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却遭到华国锋的拒绝。10月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

他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李先念听了，马上表示同意，但华国锋没有表态。

10月7日，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胡耀邦。胡耀邦也说：“请帮我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一句叫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由此可见，全党、全国人民渴望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尽早解决两大问题：一是请邓小平复出，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0月中旬，邓小平出院后，他的一家就被叶剑英安排搬到北京郊区的西山。

对当时情景，毛毛曾写道：记得，为了让我父亲第三次复出，叶伯伯让他的小儿子亲自驾车，把还在软禁中的我的父亲偷偷接到他的住处。当时我在场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两人见面之时，万分激动，父亲长叫了一声“老兄”，两人的手便紧紧握在了一起。

随后，叶剑英亲自向邓小平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敞开心扉畅谈起来。不久，叶剑英安排邓小平由城内搬到西山25号楼住下，一如既往，十分关心邓小平的身体健康，改善处境，解决其阅读中央文件等问题。他将自己能看到的中央文件，派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和李俊山送给邓小平，以后设法给邓小平又搞了一份。叶剑英办公室主任回忆说：有一次中午的时候，叶

帅到玉泉山 5 号楼，开了会以后，他叫到我秘书办公的地方来，后来他传达中央的指示，说是小平同志要住到西山，为了他今后的工作的方便，想给他一套文件，中央确定了由你直接给他送，其他人不要进去了，住在哪个地方，其他人也不要告诉。中央办公厅直接写你的名字，你把这套文件直接转给他。这个楼是 25 号，当时我给他的这套文件，写我的名字，中央秘书局认为还是给我的这套文件，实际是给小平同志的。

邓小平安顿下来以后，给新任党中央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由衷地表达了喜悦之情：敬爱的华主席，党中央：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万岁！

我用这封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的。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但是，这封热情洋溢的信却长时间被打入了“冷宫”。叶剑英为邓小平再次复出，与其他人作出了艰巨的努力。他称赞邓小平说：“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作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他都敏锐、果敢地提出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叶剑英在接见英籍著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时，信心十足地说：“邓小平肯定会出来工作。”邓小平的这封信使朝野要求其复出的势力有了根据。但是华国锋对这封热情洋溢的信反应很冷淡。

4、华国锋抓“批邓”不放

华国锋阻挠邓小平的复出，不愿意看到邓小平的复出。我们不必细他到底基于何种考虑，但可以从他一系列言行中反映出来。10 月 26 日华国锋在听取宣传口上的汇报后提出四点意见，初步表达了他处理邓小平、“四人帮”和毛泽东三者关系的思路：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凡是毛泽东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避开不说。逻辑很简单，按照“两个凡是”的方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对“天安门事件”及邓小平的处理，都是毛泽东定下的，指示的，当然不能动，案当然不能翻。那么，邓小平复出也就是违背毛泽东指示的了。在 12 月份的会议上，华国锋进一步强调了批邓的必要性。

华国锋抓住批邓不放，是因为邓小平在党政等几方面和朝野人士中拥有比他高得多的威望，能力上的差异也是众所周知的。

华国锋还有另一层考虑：他是以继承毛泽东的遗志来安身立命的，而批邓小平这件事是毛泽东生前确定的，如果现在改变了，岂不是违背了毛泽东的教导？这两层考虑中当然后者更有说服力。所以华国锋在公开场合坚持批邓的主要原因是“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有了这两条，不仅可

以名正言顺地阻止邓小平复出，而且可以向世人表明他是一丝不苟地忠实地继承毛泽东的遗志的。实际上很清楚，华国锋对毛泽东并不是什么都“凡是”，也不可能什么都“凡是”。例如有人反驳：毛泽东曾于 50 年代在所有领导人死后都火化不留遗体不建坟墓的决定上带头签字，可是华国锋在保留毛泽东的遗体 and 造纪念堂问题上毫不犹豫。还有毛泽东生前并没有说要把“四人帮”抓起来，华国锋却同意把他们抓起来了。“凡是”论经不起推敲。

1977 年 3 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华国锋有个讲话稿，派人送给叶剑英提意见。叶剑英提了两条：“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估价，应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之后，讲话稿的起草人告诉叶剑英，华国锋已按他的意见修改。可是，等到 3 月 14 日，华国锋却耍了一个小小的政治把戏，大讲“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肯定 1976 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

中央工作会议刚刚开始时，华国锋就对各小组召集人打招呼，说有两个敏感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希望大家发言不要触及。

但邓小平复出已不可避免地成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

华国锋在会上讲：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

“四人帮”的罪行只是在于他们批邓另搞一套。

粉碎“四人帮”后继续批邓是为了从根本上打掉“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华国锋在这里显然是想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拴在一条线上。他所谓“反革命煽动”是指这年年初北京市李冬民等十几位青年在长安街刷写大标语，要求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一事。当时北京市委负责人吴德称此案是“抬邓、反华、保王洪文上台”。华国锋据此在会上说：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

华国锋再次亮出他的杀手锏：两个凡是。

为了强调它的份量，他把第二个凡是改成否定结构：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

参加会议的人员都看出这是华国锋在为邓小平复出制造障碍。但是华国锋低估了邓小平的支持者的胆量。就在这次会议的小组发言中，陈云、王震等人针锋相对，公开提出要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陈云说：我认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悼念周恩来，也是关心周恩来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少数，需要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王震的发言更为直接了当，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泽东讲的，周恩来传达的。1975 年，他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

“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

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会后，请邓小平出山的呼声更高。于是华国锋不得不作出让步。

华国锋说：“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举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是必要的。邓小平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是有明确的全面评价，1973年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邓小平的问题正在解决，但要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还说：“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但“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叶剑英等人的抗争给了邓小平有力的声援。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坐等别人请他出山。

三天后，即4月10日邓小平又主动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邓小平在信中表示他毫无保留地支持华国锋最近的讲话和其他行动。感谢中央证明他本人同天安门事件没有联系，对华国锋承认清明节群众的行动是正当的，特别高兴。这对华国锋是个很大的安慰，多少可以打消一些他对邓小平复出后的顾虑。但邓小平紧接着提出必须世代代用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来作指导。这显然是针对华国锋护身法宝“两个凡是”而来的。

邓小平还作了必要的自我批评，承认他在1975年的工作中难免有不足和错误，他真诚地接受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批评和教导。最后邓小平建议把这封信和上封信在党内印发。

邓小平相信他在党内拥有广泛的支持者。一旦他的问题公诸于众，少数人再想左右民心就不可能了。

5月24日，他在与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再次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根据邓小平本人的建议，1977年5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邓小平1976年10月10日和1977年4月10日给中央的两封信转发全党。这为邓小平的正式复出作了准备。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1510名，代表着全党3500多万党员。

代表中包括从建党时期到文化大革命的老中青党员，多数代表是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战斗英雄、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标兵。代表中工农兵和其他劳动人民占72.4%，革命知识分子占6.7%，革命干部占20.9%。

大会主席团共有223名代表组成，主席团主席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汪东兴兼任主席团秘书长。

大会由华国锋主持。

会议的各项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选举中央委员会。

华国锋所做的政治报告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即“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我党历史上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他宣告，“历时11年的中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胜利结束了。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认为两个阶级的斗争和两个道路的斗争将始终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第二部分是“形势和任务”，其核心内容是“抓纲治国”。报告说：“党

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有一个中心点，就是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巩固和发展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工作的各个领域，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求“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为此提出了“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等八项战斗任务。

究其一点，华国锋在“两个凡是”思想基础上，形成了其指导思想上的三个坚持：一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二是坚持“文化大革命”非常及时，完全必要，还要继续开展；三是坚持反右，反对反“左”。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著作中首次提出的。

1977年4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正式出版，在全国发行。它收集了毛泽东在1949年9月到1957年期间的重要著作，开篇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最后一篇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全卷共70篇，32.5万字，其中有46篇过去没有公开发表过。随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少数民族文版和英、法、俄、日、西班牙等外文版也陆续出版发行，为照顾盲人的特殊需要，还印刷了盲文版本。

1977年4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决定认为，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就是为了进一步用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为实现华国锋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而奋斗。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华国锋《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一文。

华国锋的十一大报告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系统化和发扬光大。因而表明，中共十一大没有能够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为新时期制定正确方针、路线的艰巨任务。

18日下午，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中央委员201人，候补中央委员132人。

邓小平以大会执行主席的身份致闭幕词。他说：“这次大会，将作为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大会，而载入我们党的光荣史册”。很显然，他的说法和华国锋的政治报告调子不大一样。1977年8月19日，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选举产生了新领导机构负责人。名单如下：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以下按姓名笔划为序）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飏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按姓名笔划为序）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如果同第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比较，则可发现：乌兰夫、方毅、苏振华、余秋里、张廷发、耿飏、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是新进政治局的。其中苏振华于1979年2月病逝；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在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辞职。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进入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而赵紫阳、彭真则是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

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

197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根据十一大党章规定，决定中央一级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改称党组。

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也要按照上述原则办理。

党中央各部委和相当于部委一级的单位，要建立党委。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砸烂的中央宣传部，由张平化担任部长。

10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经过认真的准备，中央党校招生开学，10月9日举行开学典礼。华国锋（兼中央党校校长），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兼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等参加了开学典礼。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在会上讲了话。

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组部部长，开始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第二年，即1978年2月18日—23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二中全会召开后，按其所作具体安排，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月24日至3月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这是恢复政协后的第一次会议，出席的委员有1862人。会议选举产生了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243名，邓小平当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乌兰夫、韦国清、彭冲、赵紫阳、郭沫若、宋任穷、沈雁冰（茅盾）、许德珩、欧阳钦、史良、朱蕴山、康克清、季方、王首道、杨静仁、张冲、帕巴拉·格列朗杰、周建人、庄希泉、胡子昂、荣毅仁、童第周当选为副主席，齐燕铭当选为秘书长。

紧接着，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346人。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各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委员也列席了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总理华国锋的《政府工作报告》，听取了叶剑英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同意了国务院提出的《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报告、宪法和草案都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有了新的规定。重申要在本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把它作为全国新的时期的总任务。但也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急于求成的经济建设目标。

如“1985年农业实现机械化”；许多省的工血水平要赶上或超过欧洲某些工业发达国家；在1978年—1985年间，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包括10大钢铁基地、8个煤炭基地、10个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5个重点港口等，国家每年投资700亿元，等等。人们称之为“洋冒进”。但当时确实又一次极大地鼓舞了人心。

1978年3月5日，大会选举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75名，叶剑英当选为委员长，宋庆龄、聂荣臻、刘伯承、乌兰夫、吴德、

韦国清、陈云、郭沫若、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邓颖超、赛福鼎、廖承志、姬鹏飞、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当选为副委员长，姬鹏飞兼任秘书长。大会选举江华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黄火青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两院也是“文革”中砸烂公检法时被撤，至此恢复。大会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根据华国锋的提名，决定：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纪登奎、余秋里、陈锡联、耿飚、陈永贵、方毅、王震、谷牧、康世恩、陈慕华为国务院副总理，还决定了各部委的负责人。

五届人大还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新歌词：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

前进！进！

由此也可看出华国锋除旧布新的决心。

中共十一大没有能完成应该完成的历史任务，按史家的评价是：反应平平。

开拓新时代的重任，华国锋没有能够担当起来。迎接他的就只能是批评了。

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邓小平在寻找精神原子弹；南京大学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讲师的投稿，引起了胡耀邦的重视：“凡是派”措手不及，与实践派对峙二十天后，败下阵去。

1. “两个凡是”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

揭批“四人帮”必然使人们想起 1975 年邓小平与“四人帮”作斗争的那些历史。如今对 1975 年的全面整顿应怎么看，汪东兴说，他（指邓小平）不听毛主席的话，同“四人帮”再怎么斗争也算不得英雄，整顿工作再有成绩也是错误的。

当时邓小平还没有恢复名誉。人们迫切希望他早点站出来，盼望党中央对天安门事件有个公道的说法。可是按照“两个凡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要继续搞，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案不能翻，其他的就更不用说，因为这些都是毛泽东定的案。

人们感到拨乱反正雷区密布。无论是知识分子从“两个估计”的重压下吐吐气，还是各级干部想重新考虑一下各项政策，都感到心有余悸，怕反对毛泽东思想，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怕为 17 年翻案等大帽子压到头上。

还有更具体的问题。1978 年春，四川、安徽两省传来农民包产到户的消息，饥饿的农民想用他们的实践冲破“两个凡是”。但主管农业的陈永贵赶快加以阻拦，他说这是右倾，是同学大寨对着干。

还有急待安置的百万回城待业大军，急待纠正大批冤假错案，急待恢复的上万家企业，急待换上去或拉下来的几十万干部……总之是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如果按照“两个凡是”，都只能这样永远“待”下去。

正如主持宣传工作的耿飚所说：“两个凡是”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一位老新闻工作者的感觉则是：好像欢呼“十月胜利”的那口气还没有痛痛快快地吐完，就被“两个凡是”给堵了回去。他担心有生之年就这么“凡是”下去。

2. 用什么来检验真理

邓小平代表亿万颗焦虑的心，首先站出来讲话了。

请熟政治风云变幻，果敢雄才的邓小平看出“两个凡是”打毛泽东牌，从而达到推行“左”的一套。他从理解毛泽东思想切入，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

1977年5月，尚未正式复职的邓小平就指出“两个凡是”不行。因为，第一，华国锋已讲过要在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并说清明节群众的行动是合乎情理的，按照“两个凡是”，这是说不通的。第二，每一个人都会犯错误，马恩列斯都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在此之前（4月10日），邓小平还提出要用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来作指导，暗示“凡是派”搞的是只言片语。后来在十届三中全会（7月21日）上，邓小平又进一步把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上升为毛泽东思想体系，想用“整个体系”去对付“凡是派”的“个别词句”。邓小平的意思是说：毛泽东的整个思想体系是正确的，但并非毛泽东说的每句话都是正确的。“凡是派”的错误在于他们不问具体条件抓住毛泽东的某些词句不放，其前提是承认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邓小平还特别指出，引用毛泽东的某些只言片语骗人、吓唬人是“四人帮”的惯用手法。这种批判对揭露“凡是派”对待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错误态度无疑是很有力度的。但是如果遇上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的理论，困难就来了。

该理论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无论你怎么完整准确，都理解不了它的正确性。

何况“体系”也要通过个别词句表达出来，到底哪些词句代表毛泽东思想体系呢，看来区分体系和词句也不能扳倒“两个凡是”。

在区分整个体系和个别词句的同时，邓小平还进一步指出实事求是“是最根本的东西”，“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应该说这已经触及到“两个凡是”的要害了，因为对毛泽东思想采劝凡是”的态度恰恰违反了实事求是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问题是“实事求是”不管多么根本，也还是毛泽东的一个“只言片语”。如果“凡是派”找出另外的只言片语，比如说“阶级斗争”，把它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那又怎么办？可能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提出前，并没有在“实事求是”上多做文章。

在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还以举例形式触及到当时还很敏感的知识分子问题。他首先肯定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意见，加强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用以支持自己的观点，并对毛泽东的有些观点的理解作了纠正，如说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是从爱护出发，同时还发挥出一些他自己的观点，如说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等等。另一方面邓小平指出，

毛泽东说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的话现在不能继续讲。邓小平在这里的方法是把毛泽东的话区分为正确和错误两部分，认为正确的应肯定，错误的要否定。邓小平还注意到一个分寸，即正确是毛泽东的主导方面，错误只是部分性的。这对“两个凡是”（句句是真理）当然是个很大的突破。可是如果在某一问题上毛泽东的话都是错误的，或大部分是错误的，邓小平的这种“两分法”就不能解决问题。

1977年8月和9月，邓小平开始把批判锋芒指向另一个更具爆炸性的问题——“两个估计”，即认为“文革”前17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两个估计是毛泽东画了圈的，按“两个凡是”，是不能动的。但是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问题在哪里？第一，《纪要》中引了一些毛泽东的话，但“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第二，“《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第一句是说毛泽东的话在这里之所以是错的，是因为被别人作了断章取义的理解。第二句指出有的错误不是属于毛泽东本人的。这还是“整个体系”和“个别词句”的关系，那么17年到底是红线还是黑线？邓小平果断地回答：“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说，像这样重新评估17年在当时是很大胆的，但邓小平“也照顾了一点现实”。他只是说红线为主，并没有说黑线是否存在。他以为只要红线为主，案就翻过来了。哪知他这一“照顾”马上为“凡是派”提供了口舌。1977年底，1978年初，《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都发文重提黑线论，只是提法更巧妙。他们不否认17年占主导地位的是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但在肯定了这一点后，他们斩钉截铁地声称：“黑线是有的，这就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17年不再是黑线专政了，而变成毛泽东的红线同刘少奇的黑线作斗争的17年。“凡是派”在这里也搞了个两分法，结果使邓小平的两分法失效：黑线还是黑线，而红线本身永远是不会错的。

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在整个1977年都环绕只言片语做文章，或用一些正确的“只言片语”去否定错误的只言片语，或证明某些只言片语本来就不是毛泽东的。这方面的成果还是不妙。例如这年5月《人民日报》披露：1976年11月6日“两报一刊”发表的那篇关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文章，经核对原稿，其中有关“全面专政”的提法，不是毛泽东的原语，而是陈伯达、姚文元写上去，排成黑体字，遂成了“毛主席语录”。人们以为这下“文革”的理论基础动摇了。可是这一点也没有伤害“两个凡是”，相反证明毛泽东的话是不会错的，要是错了，一定不是毛泽东的话。更要紧的是，毛泽东说了那么多的话，要都这样一句句地鉴别真伪对错，那该要到何年何月！

1977年11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又出好消息：从迟群的笔记本中查出，1971年毛泽东关于17年估计的谈话有如下语句：17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执行错误路线的是一小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家是教师，还是要尊重嘛……。

这些讲话竟被“四人帮”封锁了6年之久，现在找出来了，广大知识分子才得以从两个估计的重压下缓过气来。可是人们会问：如果“四人帮”把这些指示封锁得更严密一些，或者如果迟群干脆把笔记本烧掉了，使得后人永远见不到这真理的阳光，那该怎么办？无论是用正确的“只言片语”，还是强调“整个体系”或者区分“主导方面”，都不能叫“凡是派”缴械投

降，即使是点出“实事求是”这个根本之点，也还是要差那么一点。这主要是因为批判的一方没有超出理论自身的范围。要从根本上制服“两个凡是”，必须跳出理论，从理论之外去谈理论问题，即把问题提到真理的标准上来谈。

3、胡福明“发现”真理

1978年的报刊杂志，稍作统计，不难发现，出现最多的人物自然是“明领袖华主席”，出现频率最多的名词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抓纲治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等。

党的十一大虽然宣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随后拨乱反正也已开始，但思想的禁锢依然严重。

这一切，都是源于华国锋所坚持的“两个凡是”。

为打破这一禁锢，提供原子弹的不是邓小平，也非胡耀邦，而是与他们有着同样想法的一位小百姓——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

胡福明老早就意识到，批“两个凡是”，目的是为了否定文革，扎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说穿了是要批评两个主席，因此正面冲击难以奏效。他苦苦思索，写正面文章，论实事求是，很难直接触及“两个凡是”。批林彪“句句是真理”，有所触及，但不能切中“两个凡是”的要害。“两个凡是”的要害是：毛泽东的话天经地义地是真理，毋须实践检验；毛泽东的指示、讲话、批示、圈阅、同意的，都是绝对正确的，不仅毋须实践证明，而且是证明的工具，真理的标准。

经过一连数天的蚊叮虫咬，胡福明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真理的标准问题。这个题目既切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又不用公开提“两个凡是”。他为抓到这个题目而兴奋不已。

1978年4月的一天，胡福明论真理标准的文章发到《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手里。杨西光是中国理论界的一支笔，对理论问题颇有研究。“文化大革命”前，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主管教育、宣传等工作，排位仅次于张春桥。但在“文革”中，他的命运无法与张春桥同日而语，差一点没被红卫兵整死。

1976年以后，杨西光复出，担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当时杨西光是刚从中央党校结业，由当时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推荐，调到《光明日报》来主事的。胡耀邦早在1977年12月就提出研究党史的两个原则：一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中央党校还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就拨乱反正的一系列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杨西光也参加了这些讨论，所以当他看到胡福明论真理标准的文章，觉得正是自己要找的东西。他决定把文章从《哲学》专刊上撤下来，组织力量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触及当时影响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内容，然后放到第一版发表。

在组织力量进行修改时，了解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吴江等人也在写此类文章，于是也被组织进来共同修改。修改后的文章突出批判那种认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教条主义，批判那些“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条文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的错误倾向”，定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胡耀邦与邓小平的关系非同一般，从当年的“红小鬼”、毛泽东的通信员及团中央的领导人，革命几十年，早已与邓小平结下革命友谊。“文化大

革命”中被划为邓小平路线的追随者。邓小平和卓琳就曾 是胡耀邦的婚姻介绍人。所以，“文革”中江青的手下曾贴出大字报，称：“邓小平、胡耀邦除了工作打得火热外，在私生活方面也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就在 1977 年 4 月，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指出“两个凡是”的方针与毛泽东思想的本义相背离，“我们必须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 月 3 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来信，肯定了他的正确意见，胡耀邦此时也在考虑如何把“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大颠倒再颠倒过来。

也就是把颠倒了的是非、思想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首先是要把理论、思想上的是非搞清楚。如果说，邓小平是从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上提出问题的话，那么，胡耀邦的做法则有所不同，他是具体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入手，搞清是非的。

早在 1975 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就曾搞了一个著名的《汇报提纲》，在提纲中提出并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这个论断不仅与“左”的生产力观点相悖，而且触怒了正在批“唯生产力论”的“四人帮”。但是，这个论断，既可以视为是历史转折前的一次理论较量，也可以看作是中国思想、理论战线拨乱反正的一个序幕。

一到中央党校，胡耀邦就筹备了复校开学工作，并开始揭批林彪、“四人帮”，力求在思想理论战线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为了有一个好的拨乱反正的思想战线的阵地，他主持创办了《理论动态》。

《理论动态》的第一期的题目是《“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文称：我们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直被视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十年之久运动的直接的指导理论。

当时可谓是最高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容任何怀疑的，人们只能天天学习，活学活用，进行“实践”。严重的是，粉碎“四人帮”后还是这个调子，直到 1977 年 8 月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纠正这个调子。而《理论动态》在 1977 年 7 月，即在党的十一大前夕，则提出“继续革命”问题的质疑，这使当时的思想理论界，乃至政界的不少人都感到震惊。而发表这篇文章本身需要多大的勇气，负多大的责任，对于谙熟中国政治的人们来说，是不会不懂的。

然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需要首先从思想理论上突破。

只有停止“革命的”理论，才能停止“革命的”运动。

《理论动态》一开始的印数很少。第一期只印了 400 份。全部是送给了地方和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也送给部队的一部分领导，以及校内有关人员，但发送范围和领导干部的名单，都是由胡耀邦亲自决定的。

《理论动态》第一期就送到了邓小平手里，并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

《“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是向“左”倾理论发起进攻而打响的第一枪。也可以说，从此，开始了思想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

1977 年底，中共中央党校党员，一千多名高、中级干部在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党史问题时，提出了不少难题。对此，在中央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表明态度：要研究，不研究怎么行！要解放思想！并根据胡耀邦的意见，明确规定研究党史的两条原则：一条是完整地、准确地理

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另一条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分辨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研究。大家在讨论中国共产党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时，绝大多数学员同意这两条原则，认为分清路线是非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整个党校，在胡耀邦提出的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问题的思想指导下，思想活跃，大胆发表不同意见。

所以，这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改好后，送胡耀邦审定。为了扩大影响，编辑们商定，先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公开。因为凡是在《理论动态》发表的文章，都要经过胡耀邦的审阅。胡耀邦对这个方案欣然同意。

1978年5月11日，这篇历时7个月，先后十易其稿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一版显著位置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特约评论员”很容易使人们想到这篇文章有可能出自某个权威之手。其实编辑们想出这个名称还有一层考虑：当时凡中央报纸上的重头文章若以社论或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都必须送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审阅，而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就可避免送审。

经事先商定，《光明日报》发文的当天，新华社全文转发。第二天即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并在文末注明“新华社5月11日电”。而实际上，地方上也有《辽宁日报》等十多家省市级报纸同时全文刊载。这样由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引爆的这颗原子弹，很快即由北京向四面八方幅射。等“凡是派”警觉过来，已为时过晚。此文直指“两个凡是”，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划时代的大讨论。

据杰斯·布莱报道：实践派发动这场大辩论之前，为了先声夺人，一战即胜，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凡是派”全被蒙在鼓里，一点没有察觉。据悉《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时，恰逢华国锋访问朝鲜之际，“凡是派”根本来不及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该文披露于世后，汪东兴、纪登奎联名致电华国锋，汇报这件事，并认为这件事牵涉甚广，后果堪忧，向华国锋请示应付的方针，华国锋接报后，主张持慎重态度。

4、对立的二十天

“两个凡是”的要害一下子被击中了。谁也不能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个问题妙就妙在它从根本上排除了以任何理论充当真理标准的可能性。凡是派的神话被打破了。毛泽东的话不能充当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本身是不是真理还要由今天的实践来判断。这样所谓凡是毛泽东的话都不能改变就不能成立。

由此延伸，毛泽东亦不免有错误。

既然毛泽东亦有错误，那么冤假错案就应该平反，拨乱反正就理所当然。这个延伸结论吻合了在文革期间蒙冤受屈的广大干部群众的心理，自然也引起“凡是派”的恐慌。

文章见报的当天，就有个“凡是派”发觉这篇文章提出的理论问题并不新鲜，可对现实却非同小可。当晚他就给《人民日报》总编辑打了个严厉的电话，说这篇文章提倡人们去修改毛泽东思想，在政治上是反动的。

汪东兴缓过神来。5月17日他在一个小会上说，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并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斥责刊登这种文章的人“没有党性”。次日，汪东兴又把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一位负责人找

来吹风，由他奉命向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团团长打招呼，要他们不要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定论了，要提高鉴别能力，不要随着风转，还要他们回去向省委常委汇报。华国锋指示，中宣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卷人”，“不表态”。

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积极地支持了这场论争。5月19日邓小平开始表态。据说《光明日报》发文时，他没怎么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得很厉害，他才找来看了看。看过后邓小平对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坦言了他的看法：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5月30日，邓小平同几位负责人说话时，又针对“凡是派”指出：只要你讲的话和毛泽东的不一样，和华国锋的不一样，就不行。这不是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

真理标准的讨论正是冲着这一思潮而来的。邓小平一年来所寻找的正是这个武器。

一年前他曾针对“两个凡是”先后两次提到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和精髓是“实事求是”，但他没有充分展开，也没有对“凡是派”构成威胁，那是因为实事求是还没有提到实践标准上来，没有和实践标准联系起来。现在邓小平从民众的智慧中发现了这种联系。因此在6月2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共讲三个问题，用了一个篇幅讲实事求是。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邓小平的文风是反对引经据典。但为了论证“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一次他破例地像一个严谨的考据学者详细引证了毛泽东从30年代反对本本主义到60年代强调社会实践的原话，在文章中仅直接引语就多达17段，这在邓小平的全部著述和讲话中是唯一可见的。邓小平的引证工作做得很艺术，他几乎把毛泽东所有反对教条主义的尖锐措辞都醒目地搬了出来，如教条主义是懒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是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是把马列主义看成能医百病的灵丹圣药，用以指导革命，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邓小平的引证还特别注意把实事求是引伸到实践标准上来，如“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知识的真理标准”；只有经过实践的考验，才能证明思想“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思想必须“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最后邓小平落到实处，告诫各级领导干部对中央或上级的指示，“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据统计，在1978年那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全国共计发表了650篇专文，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无疑是最出色、最有份量的一篇。

邓小平6月2日的讲话有力地支持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但“凡是派”仍不服输。6月15日，汪东兴召集宣传单位负责人开会，仍不点名地批判关于实践标准讨论的文章。这时社会上盛传《人民日报》犯了错误，改组了。还有人攻击《理论动态》，说“四人帮”时有“梁效”，现在是党校，这下完

了。“凡是派”攻击强调实践标准是否认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他们质问说共产主义要到将来才能实现，现在还不能被实践证明，难道就不能算作真理吗？为了回答这类挑战，胡耀邦又组织吴江等人写出第二篇重点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该文已不可能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于是采取曲折方式，先在《解放军报》上以特约评论员形式发表。这一方案得到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罗瑞卿为此文先后6次与胡耀邦通话联系，他还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他愿先挨50大板。该文除论证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同时也是检验真理、发展理论的过程，还指出一些人之所以要坚持“两个凡是”，是因为他们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

这篇文章被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姊妹篇，而它更尖锐、更辛辣。

第二篇文章的发表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高潮再起。7月份，科学界和理论界先后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召开两次气氛热烈的讨论会，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向全国。

这时汪东兴急了，他在山东开会向省委负责人约法三章：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180度转弯。邓小平把张平化找去，针锋相对地说：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政治局面面向后拉。9月中旬，邓小平视察东北，针对“砍旗”一说，提出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他指出：“两个凡是”不是真高举，而是假高举，形式主义的高举，真正的高举就是实现毛泽东、周恩来的遗愿——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实践派几乎控制了所有舆论阵地，“凡是派”手中只剩下一个《红旗》。汪东兴给《红旗》的方针是一花独放，不卷入当前的讨论。

在汪东兴的控制下，《红旗》沉默了5个月，没发一篇关于实践标准的文章。后来实在沉默不下去，就组织了一篇重温《实践论》的文章。就是这篇文章，汪东兴也要求把问题限于学术讨论的范围内。

他希望保锥红旗》这块最后的阵地，可是后来谭震林杀了进来，终于没有守祝原来，《红旗》打算在毛泽东诞辰85周年时发几篇纪念文章，约谭震林写毛泽东当年怎样领导井冈山的斗争。谁知谭震林把它写作实践标准的文章。编辑部要他修改，他不但不改，还提出两个新的“凡是”：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他说这两句话，是他思考两个月的结果。后来官司打到政治局，邓小平作了如下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一改，如《红旗》不愿登，要转《人民日报》登。

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这一卷入，使“凡是派”失去了最后一块阵地。华国锋对各省市负责人的指令也是不卷入，不表态。

他还批评表了态的省市。

但他无法扑灭这场大火。“实践派”与“凡是派”还在论战。

7月15日，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召开理论讨论会，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批判林彪、“四人帮”在理论和实践上制造的混乱。7月11日到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邀请中央国家机关、29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校、学校、研

究机构的部分哲学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 160 多人，讨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讨论会上许多人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个标准。周扬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在会上讲了话。周扬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意义重大。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因为离开了实事求是，离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离开了千百万人民群众革命实践的检验，就是离开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9 月上旬，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我们要解放思想，振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明确地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5. 邓小平畅谈开动脑筋

就在论战犹酣之际，邓小平又在东北点了一把火。1978 年 9 月 16 日春。上午 9 时，邓小平迈着矫健的步伐进入会场。他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不断向与会者招手致意。这是他第三次踏上长春这块土地。

在座的许多人都清楚地记得，早在 1958、1964 年邓小平曾先后两次到长春视察工作。

每次他都深入到工厂、农村、学校，与干部群众交谈，听取意见，指导工作。这次他刚刚访问朝鲜归来，就又风尘仆仆来到长春。这时，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宣布开会，请邓小平讲话。

邓小平再一次向大家招手致意，然后习惯地点燃一支香烟，以亲切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全场，便开始讲话。他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联系，一切从实际出发。他接着分析说：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科学研究，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所有在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大队工作的同志，都要根据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大队的条件，搞好工作。在这方面，思想要解放。现在是人的思想僵化，什么东西都是上边说了就算数，华主席、哪个副主席说了就算数，自己不去思考，不去真正消化。

工业也是这样，要使所有搞工业的，哪怕是一个小厂，也要开动脑筋。多少年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脑筋开动得也不够，这些年来，思想僵化了。毛主席总是提倡开动脑筋，开动“机器”。林彪、“四人帮”把我们的思想搞僵化了。思想僵化，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总之，实事求是，开动脑筋，要来一个革命。

在详尽阐明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后，邓小平把话锋一转，转到了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上。他说：再一个问题是怎么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个大问题。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最伟大的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毛泽东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历史现状，第一个提出了走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从而使“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指引中

国革命走向胜利。毛主席之所以伟大，就是靠的实事求是。马列主义从来说过农村包围城市啊，当时世界上没有啊！

毛主席的伟大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革命的具体道路。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指出这样的道路吗？能够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说到这里，邓小平略微停顿了一下，吸了几口烟，又以宏亮的声音说道：林彪、“四人帮”搞阴谋、干坏事，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林彪搞的那个小本本，可是害死人哪！他搞的那个《语录》，不能系统地反映毛主席的思想。

他举例说，在那个小小本本里，关于党的建设的语录里，就没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语录。这是毛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很重要的内容，但在那个《语录》里是没有的。

林彪、“四人帮”一伙任意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造成思想混乱，给我们党的实际工作、理论工作、社会风气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以致我们要扫除这些垃圾还得付出长期艰巨的努力，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认识到这场斗争的意义。

怎样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指出：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也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新的时期、新的历史条件，必然会产生很多新的情况，我们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才能深入研究和正确解决各种新问题。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比如毛主席在 60 年代初期，就提出“给一个矿，让日本开采”。

这次金日成同志也对我说，他回忆毛主席曾跟他谈过，用外国的资金，开发我们的资源。但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把什么都说成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建立了良好的国际条件，使我们有条件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

如果说毛主席没说过的，我们都不干，现在就不能下这个决心。在这样的问题上什么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就是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是毛主席提出的，周总理宣布的，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会场里十分肃静，人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听邓小平讲话。

邓小平端起面前的杯子，喝了口茶水，接着充满自信地说：现在我们有毛主席没有遇到的条件，我们抓住了这个条件，利用这个条件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就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如果只是毛主席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列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会僵化嘛！从现在有些思想动态也可以看出，为什么这样的问题要引起争论呢？主要是思想僵化。现在世界不断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了。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提出我们的任务，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讲话中，邓小平还针对当时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存在的形式主义提出批评。他说，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学他的基本经验，如大寨的苦干精神，科学态度。但有些东西是不能学的，比如他一年搞一次评工记分不能学，取消集市贸易不能学，取消自留地也不能学。现在全国调整农村经济政策，好多地方要恢复小自由，这也是实事求是。在谈到吉林省的情况时，邓小平微笑着说，你们这里也有好的典型呀，象榆树的小乡，永吉县的阿拉底大队，

你们自己的典型更可贵。就每一个专区、县来说，都有自己比较好的典型，把这些比较好的典型加以推广，大家都向他看齐，就了不起，这也是从实际出发，是不是全国所有地方都要把地搞得平平的，不完全搞平是不是就算完不成农田基本建设？要从实际出发，要因地制宜，不要搞形式主义，不需要平整的地方就不要平整，不需要搞梯田的地方就不要搞梯田。

在谈到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能再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害死人，要鼓励上进，不吃大锅饭，不能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总是那么几个一样是不行的。要建立各方面的考核制度，各级领导干部、管理干部都要考核，这可不是铁饭碗了，不合格的人是要被淘汰的。

他还以美国、南斯拉夫为例，指出我们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我们的产品不能几十年一贯制。那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总结已往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要老老实实地学，要搞实事求是，不行就是不行，要承认差距。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尽快提高我国的经济技术和管理水平，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讲话中，邓小平反复号召大家摆脱那种僵化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从现实情况出发，让实践去检验，冲破不切实际的条条、框框、本本，用新的思想代替旧的思想，独立地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

邓小平深入浅出的论述，使与会者感到心里像开了扇窗户，亮堂了。

在谈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时，邓小平加重语气说，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有一批闯将，没有闯将要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不行的。他形象地比喻说，我们过去打仗，要打胜仗，没有一批不怕死敢于冲锋陷阵的人是打不胜仗的，革命要有一批闯将，我们不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吗？要超过国际水平，至少是接近国际水平，没有一批超过国际水平的闯将能行吗？人才最重要，特别要有一批超过国际水平的闯将，没有一批这样的闯将，跟着人家的屁股后面爬也爬不上去。

邓小平的讲话，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十年浩劫，我们的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这个大家庭中落伍了。中国要赶上去，就要加快步伐，大胆地往前闯。

在分析中国的经济现状时，邓小平说，现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我们的国民平均收入名列倒数二十几名，算贫困的国家之一。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是贫困的一部分。毛主席讲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高速发展社会生产力。

什么叫政治挂帅，政治挂帅要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我们要想一想，解放这么多年，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所以要根据现在这一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国民经济得到最快的发展，使国家财富得到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有光明的前途。

邓小平从战略高度上论述了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号召全国人民开动脑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

6、各级首长对一个理论问题表态

1978年下半年，全国的理论界、学术界、文艺界、新闻界等都积极投身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登载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专文就达 650 篇之多。此后，随着讨论的继续，文章也还在陆续发表。形成以理论界为主力，波及全国、影响各界、人人关注的全民讨论热潮。而且，在邓小平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从 6 月起，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支持这场大讨论。这一现象非常引人注目，在党和共和国的历史上，省市及各大军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其主要负责人对一个理论问题的讨论高度关注、主动作出鲜明的表态，并见诸报端，是不多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的。

有人曾对新华社发稿时间作过一个统计，最早表态的是 8 月 27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

《人民日报》也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天才论和实践论之争》。

文章指出，林彪、“四人帮”宣扬的天才论早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障碍。扫除这个障碍是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迫切要求，是捍卫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需要，是历史前进的需要；如果有人认为，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妨碍“高举”，那只能说明，这种高举，并不是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马列主义是真理，它是不怕实践，不怕批评的。

至此，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达到了高潮。中央党政机关各部门、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人民解放军总部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及大批理论工作者，都结合本部门、本单位、本地区以及本人的思想实际，阐明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原理，回顾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指出 40 多年前，毛泽东就曾写文章反对本本主义。

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其实质到底是什么？应该说，这场讨论的意向十分明确，那就是要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去说明毛泽东晚年的“左”倾理论和政策经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从而，必须否定这套理论和政策，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方针。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两个凡是”的争论，不是一般问题的争论，而是大是大非的争论。它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的争论，更是一个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问题的争论。

粉碎“四人帮”两年多的历史实践证明，华国锋等人坚持“两个凡是”的实质，是全面肯定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来。“两个凡是”在理论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有害的。它提倡现代迷信，束缚人们的思想，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路线，阻碍历史的发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同“两个凡是”的争论，也是两种世界观

的斗争，它涉及到哲学的基本问题。它启迪全党必须牢固树立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根本观点，确立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思想，重申只有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在当时和今后是非常重要的思想理论建设。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它是继延安整风运动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了一次较为普遍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理论教育，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统一了人们对“四人帮”路线极“左”实质的认识，促进了从理论上、思想上对林彪、“四人帮”极“左”理论的清算。

为大规模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和解决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创造了条件。

邓小平后来在评价这场异乎寻常的讨论时说，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越看越重要，因为它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是一项“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决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事实亦的确如此，是这场讨论为邓小平赢得了党心民心，为三中全会的转折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为邓小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推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铺平了道路。

五、群英会扭转乾坤

中央工作会议本有其他议题：讨论经济问题；陈云提出六条意见，击中要害；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中国以后 100 年的方向。

1. 中央工作会议方向改查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它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了一次较为普遍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理论教育，促进了从理论上、思想上对林彪、“四人帮”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清算；同时，也深深地触动了人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推动了对“左”的错误的纠正和各条战线的整顿，为大规模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和解决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创造了条件，为中共十一届三中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的准备。

从此，解放思想成为中国人民思想乐章的主旋律；从此，改革大潮在中国大地上涌动，其势不可阻挡。

1978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15 日，历时 36 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党、政、军和人民团体各机关，各盛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共 212 人（应到会 218 人），分成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组讨论，并召开了 3 次全体会议。会期预定 30 天。按最初的设想，会议原订议题是如何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商定 1979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李先念在 1978 年 9 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会议前夕，中央政治局又决定，在讨论上述议题之前，首先讨论从 1979 年 1 月起实现全党工作重点向现代化建设转移的问题，并把它作为会议的中

心思想。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建议最初是邓小平 1978 年 9 月提出的，华国锋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数坚持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建议。华国锋宣布，会议议题为：一、讨论如何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商定 1979 年、1980 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初看起来，华国锋宣布的三项议题与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中心思想是一致的，但细一思考，便不难发现两者矛盾之处。因为，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及教训，按照工作重点转移这一任务的要求，首先需要解决的，应当是指导思想的问题，而不是具体的工作任务。

历史的经验表明，问题的关键已经不是是否实行工作重点转移，而是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下，怎样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在是否转移的问题上，党内意见是比较一致的，而在如何转移的问题上，党内实际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

一种是以华国锋为代表，主张原封不动地继承毛泽东晚年所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所以，他在开幕式上仍然强调：“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这一毛泽东的观点。在他看来，工作重点转移，只需在工作部署上变动一下就行了，不存在转变指导思想的问题。所以，他简单地设想只用两、三天讨论一下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就行了，整个会议准备开 20 天。

另一种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大多数人，主张把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将指导思想转变一下。这一点，邓小平在 1978 年 9 月率先提议工作重点转移时就表述得十分清楚。当时，他首先批评了继承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两个凡是”的观点，指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1982 年 9 月，他在回忆这次谈话时又指出：“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可见，邓小平在提出这一建议时，已经考虑到了要对过去的指导思想和理论进行否定，重新确立正确的理论指导。

如果说，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两种主张尚未正面交锋的话，那么当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就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展开讨论时，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种交锋都是不可避免的了。华国锋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在会议进程中显得十分被动。而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不仅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还既策略又主动地把讨论的议题引向了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2. 陈云提出六个问题

在当时的情况下，进行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首先需要的就是敢于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勇气，敢于打破多年以来在党的会议上多数人不肯讲话、不讲真话、不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沉闷局面，并引导大家充分认识“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邓小平在会议之前对于“两个凡是”的批评已经体现了这一点，而在会议开始后则率先做到了这一点。

11 月 12 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他不是简单地对工作重点转移表示拥护，而是抓住了实现这一转移的前提条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提出既

事关安定团结，又最能引起全党大多数人共鸣的平反冤假错案问题。

他明确指出：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为此，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然后他提出了经过深思熟虑的六大问题：（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二）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的一大批同志的问题。对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三）陶铸、王鹤寿同志也不是叛徒，应予平反。中央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四）关于彭德怀同志的平反问题；（五）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这是几百万人民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应该肯定；（六）关于康生的罪行问题。

陈云所提的六个问题恰恰是涉及到“文革”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重大问题，是当时党内外反映最强烈的几项要求，因而立即受到热烈拥护和响应。大家纷纷发言表示：完全赞成陈云提出的这六个问题，这是有关安定团结的问题，也是落实政策的问题。

这些问题不解决，人们的心情不会舒畅。受这六个问题的启发，人们于是进一步提出其他一些重大案件的平反问题，如：所谓“二月逆流”问题、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武汉“百万雄师”问题、内蒙“新内人党”的问题，等等。还有的人提出：彭德怀同志的问题不能算作一次路线斗争，因此案而受牵连的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邓华、洪学智、万毅等同志也应给落实政策。彭真、陆定一等问题，也是该解决的时候了。

这些过去遗留的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安定团结、不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而真正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家认为，一些影响大的或全国性的重大案件，因为都是过去中央定的，所以中央不出来明确讲几句话不行。

中央如不正式表态，干部群众会有抵触情绪。因此，最好能在工作重点转移之前，中央就把这些问题讲清楚。

从大家发言的热烈程度可以看出，陈云所提的六个问题不光是推动了冤假错案的平反，更重要的是唤起了人们的一种精神，一种在中央的会议上久未出现的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敢于冲破禁区的精神。因为这六个问题全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解决这些问题，实际就是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这就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大家从陈云发言中感受最深的，正是这种敢于冲破禁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行工作重点转移、进行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最需要的正是这种精神，邓小平自1977年8月重新恢复工作后一直倡导的，也是这种精神。经过陈云的带动，这种精神很快就在会议中形成一种越来越浓厚的气氛。

这种气氛不仅感染着每一位与会者，而且还推动了中央领导核心终于采取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

3. 华国锋作了自我批评

胡耀邦、万里、聂荣臻、康克清等在发言中，一致表示，赞成把尚

解决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完全同意陈云提出的6点意见。并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以推倒。

毕竟经过了一年多的拨乱反正，与一年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相比，这次会议的气氛显然要民主得多。陈云和其他老干部离了轨的发言，全都在简报上登了出来。根据会议的这种发展状况和历史发展的需要，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放手让大家讲话，以总结工作，肯定成绩，批评错误，分清是非。这样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

11月25日，经过政治局认真研究后，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九条决定：

(1) 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今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2) 撤销中央过去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中央认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责任由中央负责；

(3) 为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平反；

(4) 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这一重大错案平反；

(5) 为彭德怀同志平反，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6) 为陶铸同志平反；

(7) 为杨尚昆同志平反。对杨尚昆同志要分配工作，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8) 关于康生、谢富治的问题。他们有很大民愤，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是合理的。有关揭发他们的材料，送交中央组织部处理；

(9) 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的问题。对于地方性重大事件，中央定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

此外，对于“三支两军”工作，中央认为要历史地看。成绩要肯定，出现的错误由中央承担。

华国锋以为，老干部们提出的问题他都作了交代，现在会议进程该回到他的预定轨道了。所以他要求从11月26日起转入经济工作的讨论。

但是盖子一经揭开，就很难再关上了。谭震林发言说：九条决定集中了大家的意见，但并不是把所有问题都讲了，大家在讨论中还可以提。接下来的讨论，必然就涉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及其指导思想。

那时一讲“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就是挖出了所谓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所以“文化大革命”至少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讨论中很多人提出，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根本就不存在，林彪集团、“四人帮”则正是“文革”期间形成的，打倒他们怎么也不能说是“文革”的功劳，所以对“文革”要重新研究，重新评价。

会上还有人对前一段的真理标准讨论表示担忧，认为其中的分歧只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更不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现在报刊上提“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口号，有的文章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泽东的错误，这种做法不妥，等等。有这种看法主要是由于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缺乏认识，但在客观上却维护了“两个凡是”设置的思想禁区，即不能触动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这表明在指导思想问题上党内的认识仍不一致，“两个凡

是”错误的影响依然存在。所以这一意见一提出立即受到了多数人的强烈批评，并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为此，大家纷纷提出，可以暂不讨论经济工作，先议一下有关思想路线的问题。于是，真理标准问题便迅速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

有的人指出：目前出现的思想分歧恰恰说明，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很有必要。这一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但从前一段讨论的情况看，它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总结历史经验的问题。如不解决这个问题，用什么标准来判定思想理论是非？怎样得出真正的经验教训？所以这既是理论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有的人指出：在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上的分歧，实质是两种指导思想的分歧。这种分歧现在已经公开化、表面化了，已经不能回避。这不只是一个理论之争，而是党内的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斗争的焦点，就在于是否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而这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是非就搞不清，工作重点转移也无法顺利进行。

多数人则认为：这场争论的确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不解决这个问题，不解放思想，就没法拨乱反正。就会明明知道是错案，却因为是毛泽东批过的而不改正；明明有利于四化的事，却因为毛泽东没有说过而不去办。思想路线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就会影响我们的实际工作。我们当然要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但决不能把毛泽东的每句话都永远不变地继承或照搬。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只有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用实践的标准来检验我们做过的一切，只有按照邓小平所说的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才是真正的高举旗帜，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

大家在讨论中纷纷要求党中央就这场讨论明确表个态，许多人还建议中央在会后专门召开一个理论问题务虚会，让各种观点都充分摆出来，开展讨论、以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经过大家的批评、帮助，一些曾经受“两个凡是”观点的影响，对这场讨论的意义认识不足的人都先后承认了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的华国锋也作了自我批评。华国锋谈道：“两个凡是”的提法过于绝对，是“不妥”的。“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责任主要应该由我承担。”这一检讨虽还不能证明华国锋已经改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但这种态度无疑是宣布，党中央已坚决抛弃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主张，因而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欢迎。

经过两种指导思想的交锋和争论，大家的认识终于在实事求是的观点上得到了统一，从而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

4. 吹起改革开放之风

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经济问题的讨论也就深入开展起来。

1976年10月，以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为标志，中国人终于从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恶梦中醒来。当我们睁开朦胧的眼睛看看外面的世界时，我们不能不震惊于世界变化之大，不能不痛心于我们被耽误的时间之长。在世界新一轮科技和经济发展浪潮中，我们远远地落在了后面。痛

心和震惊之余，头脑又开始发热，搞起了一轮新的“跃进”。这次跃进，同五六十年代的“大跃进”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求快之外，加上了求洋，企图从国际市场上买进一个现代化。其结果，使被“文革”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

在讨论农业问题时，一些干部尖锐地指出，农业上不去，主要是“左”倾错误作怪。

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在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农民要放手一点。还有的提出，对农村中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要认真研究，对包产到户等作法不能一棍子打死。

1978年12月10日，陈云在东北组会议上，针对当时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陈云提出了几成意见：第一，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2000万吨粮食，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7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第二，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第三，要给各省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第四，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缺口；第五，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

早在会议之前，党中央就已经开始了对改革开放方针的酝酿。

1978年9月，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勇敢地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为了大大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我们将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改革计划体制、财政体制、物资体制、企业管理体制和内外贸体制，建立起现代化的经济组织、科研组织、教育组织和管理制度。

这篇讲话后来被作为提交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文件之一。

9月16日，邓小平在东北视察工作时谈道：由于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九大会议上又强调：进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

在提交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中，还对经济战线提出了必须实行三个转变的要求：一是从上到下都要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那种闭关自守或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状态上来。

由于“两个凡是”的禁区此时尚未被彻底突破，全党还需要集中主要精力克服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因此，这时对改革开放的酝酿只能是初步的，仅仅是提出了必要性。而当此次会议冲破了“两个凡是”禁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后，与会人士对于改革开放的酝酿就不仅仅是停留在必要性的探讨上，而是提出了一系列更为明确、更为具体的改革开放的主张。

关于改革的主要目标，多数人都认为，首先是计划体制。因为计划是龙头，它不改革，别的体制就不好改。现在的计划体制统得过死，用行政办法管理企业，不讲经济核算，经济效果，吃大锅饭。

管理体制也不合理，制度繁琐，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也提不高办事效率。严重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必须下决心改革。

改革从何处着手？许多人都提出，首先应扩大企业的自主权。

现在企业普遍反映苦得很，“婆婆”多，负担太重，精力分散，权力太小，办事困难。尤其是经济权力太小，搞个1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都得经过上级管理部门的批准，这怎么能有积极性呢？应当按照改革的精神，尽快下放经济管理权，减少层次，简化手续，扩大企业自主权，充分调动和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是体制改革的关键。

还有的人谈道：现在一方面是计划管得过细、统得过死，另一方面又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分散主义、无政府主义，因此，在下放权力的时候，必须注意克服分散主义倾向，该放的放，该管的要管，计划管理不能没有，关键是要符合经济规律。

有的人建议：管理体制的改革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一方面扩大企业权力，使企业的领导和职工在关心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关心自己工厂的产品，即不仅关心自己的福利，而且关心企业的积累，关心企业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利润。另一方面，使各省市、自治区都能有适当的机动财力，使之把农业搞活、人民生活搞好有必要的物质条件。第二步，按照方便生产，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原则，经过充分调查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参考一些其他国家的经验，进行我们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陈云在关于经济工作的发言中也提出，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

关于对外开放，在当时最需要的首先是摆脱封闭，了解世界，开阔眼界。为此，经邓颖超等人提议，李先念等批准，专门向与会者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经济为什么能高速发展》等材料。这些材料揭示了一个共同的规律，即当今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要获得迅速发展，都不可能封闭自己，都离不开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受此启发，大家纷纷感到，现在的国内外情况同毛泽东在世时比较已发生很大变化，如果再囿于“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做法就显得太僵化了。在发展经济方面，我们应当解放思想，认真研究其他国家的做法，很好地汲取别国成功的经验。

一些在1978年出国访问过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央领导以及一些做外交工作的人士都谈到，他们的一个突出感受就是：当前的国际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剩，资金过剩，开工不足，市场萧条。欧洲现在有5000亿美元的游资没有出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希望中国强大起来，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他们普遍地看好中国这个大市场，纷纷向我们表示了愿向中国投资或同中国合作的愿望。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时机，根据两利的原则，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尽可能多的吸收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快四化建设速度。

王震在西北组发言时提出：我们应利用西欧、日本等国的新技术、成

套设备和资金急于找出路的条件，在平等互惠、互通有无的原则下多搞些补偿贸易、合资企业，也可以设想利用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对我国的大江、大河流域进行疏浚，建设梯级水电站，并开采有色金属、贵重稀有金属等矿业，打开了这个大门，经济、科技等都会上得快一些。他还向中央建议：人大常委会应尽快制定有关接受外国贷款、借款、投资等方面的法律，对外商投资提供优惠，鼓励外商与我们合办企业，保证外国投资不受侵犯；要扩大各省市、自治区的自主权，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允许他们向外借款或与外资合办企业，以加速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福建省的与会者还提出：从福建的实际出发，应充分利用侨乡这一特殊条件，大量吸收外资、侨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开矿办厂建电站，放手大搞出口贸易，通过外贸和轻工业积累资金，然后搞基础工业，搞农业机械化，以轻养重，以重促农，从而为发展福建经济闯出一条路子来。只要中央同意，我们就可以大胆干。为实现这一目标，建议中央在具体政策上给予支持，外贸分成，应适当放宽，多给地方一点。开放港口和加强码头建设，如福州的马尾港和厦门港。

有人提出，在利用外资方面，我们应采取多种方式、齐头并进的办，能合资就合资，能和外国合作生产的就合作生产，能买专利就买专利，能请专家就请专家。

还有人提醒大家：搞引进是必要的，但也不能什么都引进，不能有依赖思想，不能忽视国内先进的东西。引进工作要突出重点，分轻重缓急。我们在这方面还缺乏经验，很多东西还不懂，如果不慎重，就可能吃亏上当，造成浪费。不能忘了自力更生依然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不能靠花钱买进一个现代化。

陈云在谈到经济工作时也指出：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能窝工；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

以上意见和建议为改革开放勾画了一个初步的蓝图，其思路 and 方向无疑是正确的，至今仍不失参考价值。这一方面反映了会议期间多数人的关注点，同时也代表了当时全党大多数人的主要呼声，从而为党中央进一步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和依据。

5.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与上一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不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在邓小平的支引导下，这次会议开成了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一个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大会。邓小平对会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次会议开得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为这次大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他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思想解放了，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问题和现在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再次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他提出要发扬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他提出要贯彻有错必纠的原则处理遗留问题，这是为了向前看，是解放思想和安定团

结的需要，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他提出，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体制、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终其一点。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邓小平的讲话是中央工作会议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概括，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党的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

6. 决定了今后一百年走向的中央全会

经过一个多月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一届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正式开幕！

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共计281人。各地方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9人，共290人。韦国清、刘伯承等27人因事请假。另有25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有严重问题，中央政治局决定不通知他们参加会议。

三中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同时，审议通过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1980年两年经济计划安排，讨论人事安排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全会决定：“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决定，揭开中国历史的新一页。在这最简洁不过的语言里，包含着对新中国曲折经历的深刻反思，寄托着对充满希望的未来的美好憧憬。

全会明确提出了改革的思想：“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全会还明确提出了开放的思想：“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这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实现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的同时，又提出了后来被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邓小平后来回顾说：“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

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这些政策的“中心点是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全会还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些基本思路。

在经济体制上，针对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提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全会还提出：要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要认真

解决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业的现象，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全会还集中地讨论了农业问题，提出必须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必须克服平均主义，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并建议国务院作出决定，适当提高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统购、收购价格，降低农用工业品的价格。

这些重要的决定，在当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一方面是要彻底排除“左”倾指导思想对经济工作的严重干扰，另一方面是要从根本上冲破苏联模式的重重束缚，其意义极为深远。这些果敢的措施，成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开拓前进的伟大开端。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全会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任务，强调要吸取过去民主法制不健全的教训，努力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

以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等9人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十二大追认。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决定人事问题。

一是讨论新增选的4位政治局委员的分工，决定陈云主管中央纪委、公安、检察、法院、民政等政治部门；邓颖超主管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王震仍主管第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胡耀邦主管中央日常工作和宣传工作。

二是接受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许多人的意见，通过以下一系列人事变动：设立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协助中央领导处理日常工作。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胡乔木为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姚依林为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任命宋任穷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不再兼任中组部部长）；免去张平化的中宣部部长的职务，调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不久又调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调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提请全国人大讨论通过后公布）；调中央党校副校长马文瑞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任命冯文彬为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任命杨德中为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兼中央警卫师师长、党委书记；姚依林原任的商业部部长一职，由金明接替；任命刘澜涛为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建议1979年全国政协会议时选他为副主席；免去汪东兴的所有各项兼职（中共党校第一副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兼党委书记，8341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兼党委书记等）。以上一系列的人事更动，为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组织保证。

在新的领导集体中，无论从党的指导思想还是在工作上，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正如邓小平所讲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

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代表人民的意愿，选择了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选择了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从此，中国人民迈开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步伐，迎来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春天。

这次会议只召开了 5 天就胜利闭幕了，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它的功绩是巨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越来越得到实践的检验和肯定，它将功彪史册，光照千秋！

六、完成拨乱反正

邓小平首先否定“文革”，但否定“文革”的同时，毛泽东怎么办？社会上掀起一股反毛泽东的逆流，邓小平一锤定音：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自己的历史。

1. 邓小平否定“文革”

邓小平和毛泽东的根本分歧在于对文革的看法。毛泽东坚持他的“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所谓三分错误，毛泽东指的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邓小平说，“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在他看来，批倒一切、全面内战已经是很大错误了。

而实际上，他要否定的还不止这八个字。他的目标不只是把毛泽东的“三七开”颠倒过来，而是根本否定“文革”，否定“文革”的一系列错误理论和实践。

邓小平 1977 年复职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系统清除“文革”流毒。

邓小平决心纠正“文革”错误，构成他与“凡是派”冲突的主题。

“凡是派”在粉碎“四人帮”后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宣布“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了。下一步抓纲治国的方针，一是集中批“四人帮”，二是继续批邓，三是要求广大干部群众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凡是派”不知道他们想在维护文革的前提下既批“四人帮”又批邓小平，包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

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打算从揭批“四人帮”入手。不管怎么说，这是他们和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凡是派”的共同点。可是“凡是派”领导的揭批“四人帮”，很令人失望。他们首先规定“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而不是极左。按照这个定性标准接连抛出的三个批判材料都不触及“四人帮”的极左实质。“凡是派”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想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拴在一起，二是维护毛泽东的“文革”路线。

为了打破“凡是派”的战术，邓小平主张：把“四人帮”和林彪联系在一起。他于 1978 年 6 月指出：“要把‘四人帮’揭深批透，非联系揭批林

彪不可。”“四人帮”和林彪在历史问题上的联系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特别是1966年那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生前总认为“四人帮”批刘、林有功。批刘少奇“有功”不假，批林彪有功很成问题。第一，林彪挨批时已经身败名裂，不批自臭。

“四人帮”的批林另有用意，即所谓“批林批孔批周公（恩来）”。至于批林本身，他们只限于批两头而不批中间，即只批林彪过去的历史和后来搞反革命政变的《571工程纪要》，而对林彪的“极左”路线则全包了下来，生怕批了林彪的极左露出他们的实质。

林彪和“四人帮”正是利用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横行于“文革”十年，因此邓小平说：“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存在什么纠缠不清历史旧帐的问题。”退一步，即使这是旧帐，也非解一解不可。因为这样一“解”，势必触及到“四人帮”的极“左”实质，触及到整个文革的十年的历史，进而触及到毛泽东晚年发动文革的错误。这一“解”就完全改变了“凡是派”的部署，使揭批“四人帮”转入邓小平所希望的主题：“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的横行，把一切都搞乱了。我们现在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邓小平知道否定“文革”仅仅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还不够，还必须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后一方面在“凡是派”面前最难以通过。但是1978年下半年全国上下广泛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邓小平开辟了道路。正是这场讨论给邓小平提供了重新评价十年“文革”的是是非非的有力武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毛泽东在文革中所作的一切决策，到底对不对，也要由实践的结果——“文革”后果来检验一番。这个武器在1978年底连续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结出了硕果。

邓小平知道这种抽象的理论上的否定不仅不能真正达到彻底清除文革的后果的目的，还会招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从而增加前进的阻力。所以邓小平把他的清算工作的重点放在具体否定上，致力于纠正文革的具体错误，一样一样地来，而不忙于作政治结论，辨理论是非。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就是一个很具体也最有力的否定。至于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总体评价，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上仍采取相当谨慎的态度，主张“不必匆忙去做”，“要认真的研究工作”，“要经过更长一点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后来，这个评价经过了3年零6个月，到十一届六中全会才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式作出。在涉及到九大的合法性时，邓小平也作了个抽象的肯定，以说明“文化大革命中间还是有党存在”。在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甚至还肯定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反修防修，似乎毛泽东是好心办了坏事。

“好心”可以安慰一大批人，“坏事”（通过改正）可以拯救一大批人。

“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实际上是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和邓小平时代的开始。邓小平常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看作是两个时代的转折点，因为三中全会不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二十年的问题。

2. 为假冤错案平反

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推行“打倒一切”、“全面专政”的口号，冤遍地，骇人听闻。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的冤假错案共有 200 多万件，受到错误处理的有几百万人，加上不同程度受到株连的人，涉及近 1 亿人口。广东省有 28000 多起所谓反革命案件。河北某县因一个所谓的“新国民党案”，全县 12 万人口中有 4400 多人被诬陷，长期关押的有 2200 多人，迫害致死的 400 多人，致残的 530 多人，扫地出门的 1500 多人。此外，在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打击的还有 100 万人以上。

要给这么一大批人洗清沉冤，恢复名誉，其中困难和阻力也是可想而知的。首先是来自“凡是派”、极左思潮的阻力。在“凡是派”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邓小平只能因势利导，在反对“四人帮”的口号下开始平反昭雪工作。在邓小平的推动下，1976 年底，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

这些人之所以能够首先得到解脱，是因为他们“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如果因为涉嫌反对其他人，特别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而获罪的人，要获得解脱就很困难了。

因为“两个凡是”挡了路。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邓小平有意识地推动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使人们的思想逐步得到解放。1978 年 9 月 20 日，平反工作的具体组织者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两个不管”，即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历史遗案进行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改正过来。

在胡耀邦和邓小平的推动下，1978 年下半年，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步步深入，平反冤假错案取得三次重大成果；第一，对文革期间被定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毛泽东思想的所谓“恶攻”案件，进行认真清理，据实平反；第二，对在“四清”运动中一些地区和单位对一些干部的错误定性和错误处理，据实纠正；第三，对 1957 年反右斗争中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全部摘掉右派帽子，属错划的予以平反改正。

1978 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即是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胜利，也是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重大突破。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例如为天安门事件中受到迫害的人平反，事件中被拘捕的 388 人经复查没有一个反革命，全部释放，恢复名誉。还为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平反，为薄一波等 61 人“叛徒集团”一案平了反，为“二月逆流”平了反，为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人平了反。

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中号召：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但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在邓小平的有力推动下，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势如破竹，一年之内，290 万人平反昭雪，没有立案审查而得到平反的比这个数字还要大得多。这一年内得到平反的重点人物有彭真、习仲勋、王任重、黄克诚、陆定一、周扬等。大案的平反活动有：为 1959 年后历次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犯了右倾错误的人，一律予以平反；对在 1963 年到 1965 年期间一些高等学校定案处理的 5、6 百名所谓反动学生进行复查平反；对文革十年中以

反革命罪冤杀错杀的上万例案件进行复查平反。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定名为文革中最大的冤案——刘少奇一案平反昭雪，撤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走资派”等罪名。

恢复他仍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至此，文革的冤假错案全翻过来。但邓小平有错必纠的原则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一直伸展到文革前甚至解放前的历史遗案。他先后为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了反，为40年代延安肃反问题上的错案平了反，为30年代根据地肃反问题上的错案平了反，还重新评价了瞿秋白、张闻天、李立三等早期领导人的功过，为他们恢复了名誉。总之，邓小平几乎把中共的历史重新写了一遍。

到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前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应该得到平反昭雪的人和事都得到了平反昭雪。

在这些日子里，人们怀着惋惜和哀痛，一次又一次地为那些在林彪、“四人帮”迫害下丧生的民族精英们补开着追悼会，催人泪下的哀乐一遍一遗地低回在中国大地上。

那些在“文革”中含冤去世，曾为新中国诞生挥汗洒血，立下赫赫战功的中共高级干部，以及部分党外人士的骨灰盒，被一批批地放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死者的亡灵得到告慰，活着的人纷纷庆贺正义战胜了邪恶。

邓小平复职后仅3年多时间，就使几千万人洗清了沉冤，恢复了名誉，幸存者恢复了工作，有的还得到了经济补偿。

中国人历来相信历史是公正的。由后来者平反前期的冤假错案的事古已有之。按照这个规律，毛泽东留下的大量冤假错案，终有一天会得到平反昭雪，只是时间和方式的问题。这样虽然无情地暴露出党过去犯的 error，但同时也有力地证明这个党有承认错误的勇气和改正错误的能力。既然党有能力改正像文革那样的错误，那么它曾经犯过像文革那样的错误又有什么要紧呢？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平反冤假错案的举动，不仅拯救了成千上万的人，而且拯救了一个有60年历史的党，使它避免了像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党那样的命运。

3. 一阵否定毛泽东的噪音

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开端。农村分田分地正忙平反冤假错案，地富反坏右摘帽，南方建了一个特区……但旧痕迹还残留着，各种思潮也撞击着这个古老的国度。

中国还不能全心全意搞建设杂音始自国外。

毛泽东逝世以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西方的少数舆论家们仅凭借他们的主观臆测和所谓的“政治敏感”，就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已经而且必然要“否定毛”，“非毛”。一时间，“中国正在非毛化”的舆论四起。

“非毛化”是“非斯大林化”的换称。“非斯大林化”是西方某些舆论对原苏联从赫鲁晓夫起开始的全盘否定斯大林、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模式的现象的理论“概括”。

1976年11月20日，《华盛顿邮报》外事记者马休斯报道：“人们看到

华（国锋）开始逐步对政府机构实行‘非毛化’。”而同年 11 月，中国芭蕾舞团在联邦德国访问演出时，有些极端分子打出了大幅标语，拥护“四人帮”。

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非毛化”的言论不断出现，即使 1977 年 2 月 7 日《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后也未曾减少。

1977 年 8 月 26 日，《匈牙利民族报》发表文章，说中国“将开始非毛泽东化的时代”。

1978 年 3 月 22 日，美国《前卫》周刊发表文章宣称，（美国）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阿瓦基安在一次报告中说：“中国发生了修正主义政变，无产阶级及其革命领导人遭到了严重打击。走资派不仅还在走，而且他们现在已经篡夺了最高权力，并且正在使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推行这条路线的是邓（小平）、华（国锋）等人。”这表明：西方舆论提出所谓中国“非毛化”问题并不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之后，而早在刚刚粉碎“四人帮”时就出现了。

而 1978 年 5 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以后，国外评论猜测的，主要是说中共中央领导层有分歧。他们的一个主要根据是：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对此长期没有表态。

对国外的误解和谬传，中国当时就给予了反驳。后来中共中央采取的正确路线和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正确措施，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宣传工作的影响也逐渐扩大。

从 1978 年 5 月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后，特别是 1978 年 7 月 1 日发表了毛泽东在 1962 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接着又发表了周恩来的重要文章《学习毛泽东》以后，国外舆论起了明显的变化，这一个时期，所谓“非毛化”的议论逐渐减少，而“非神化”、“正毛化”的议论是普遍的、大量的。基本是三种观点：第一，中国不是搞“非毛化”，而是拨乱反正，摒弃“极左偏向”，把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改了的毛泽东思想和路线恢复本来的面目。如，1978 年 7 月 10 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对已故主席的贡献重新进行讨论，不是为了降低这位前领袖，而是为了批判‘四人帮’。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情况与斯大林逝世后的情况不一样，在中国，毛主席仍然是一个受尊敬的人物。”第二，中国不是否定毛泽东思想，而是根据客观实践对毛泽东思想进行评价，肯定毛泽东的功绩，保留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抛弃某些错误的或过火的东西。例如：1978 年 7 月 9 日，法新社记者比昂尼克的文章说：“中国没有在使自己‘非毛化’，它只是在纠正一些错误。它是在消除把毛奉为一个没有错误和使人麻痹的神的形象。但是毛将仍然是中国的列宁。……说‘非毛化’的各种谈论都是没有根据的。”第三，中国没有放弃毛泽东的路线和政策，而是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的宏伟目标，“走上了一条发展经济的道路”，采取了新的重要措施，实现四个现代化。

1978 年 12 月 25 日，日本《每日新闻》刊登伦敦大学教授施勒姆的讲演稿中说：“我认为，如果把毛主席从 1956 年开始，努力开创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中国的道路’以来，二十年期间的发言和政策作个全面研究，从中作出恰当的评价，那么可以说，在许多方面，中国的现政权正实行着比毛主席晚年那时的政权还要更接近毛思想遗产的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南斯拉夫和日本记者都认为，三中全会“比十一大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路线”。

就在国外舆论评论中国是“非毛化”还是“正毛化”的时候，国内也出现并流传着一些甚为有害的观点、倾向。

在社会上，一时间出现了一股否定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制度的思潮。

1979年，北京西单民主墙前，几个极右的分子，打出一幅标语，要求“坚决批判中国共产党”，“彻底批判毛泽东”。

哈尔滨建工学院一学生刻佣下里巴人》小报，把党和人民划分为“官方”和“民方”，否认党的领导，要求“结束党的特殊地位”。

某诗人在1979《诗刊》第3期上写下了“宁歌颂民主墙上一块砖，不歌颂救世主”的词句，引发了一些人对毛泽东的错误评价。

1979年11月，在由北京及外地等12所高校社团发起并轮流主编的名为《这一代》的创刊号上，刊登了组诗《愤怒出诗人》。其中一首《桥》，把“愤怒”直指向党和党中央，诗中的“桥”是指中南海和北海之间的桥，作者写道：桥，是一条国境线！领袖和人民，被它隔开在两个邻国。诗中用大量语句把“愤怒”从领袖一直发泄到3500万党员身上。

1979年，某大学历史系一学生撰写《历史的罪人》一文，影射毛泽东是历史的暴君，其制造的历史悲剧比封建王朝大千万倍。

与此同时，一些深受林彪、“四人帮”思想毒害的人甚至一些残存的余孽，趁机散布流言蜚语，以种种形式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说是“复辟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大倒退”。

在这些观点、思潮面前，党内不少人漠然置之，甚而直接或间接地予以某种程度地支持。

邓小平警觉了，党中央警觉了。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已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

毛泽东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在他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较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

然而个人崇拜也由此滋生，并在“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毛泽东被“神化”了。

4. 毛泽东曾想搞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

毛泽东非常在意他百年之后，继承者对他个人，对他一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也很在意在某种评价下中国的前途。

所以，毛泽东决心搞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1975年11月4日，他为中央政治局会议定的调子是：“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能统一认识，来个“三七开”，并提出由邓小平作这个决议。

邓小平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意思是由他来写这个决议是不合适的。

这是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的一个诱因，但决议是做不成了。

毛泽东是带着遗憾离开人世的。临终前，他选择“老实人”华国锋为

其接班人，并嘱托“照过去方针办”。

华国锋果然不负重托，他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邓小平在他第三次复出前后，就始终坚持“我们必须世代代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人民，指导工作，指导事业。

也就是华国锋和邓小平两人对“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不同理解，而引致了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但在 1978 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陈云等人质疑“文化大革命”，质疑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从而使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继续延伸。

一场新的、更深刻的讨论启动了。

本来，对于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 1978 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有过既原则又谨慎的说法。他说，“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当然，毛泽东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我们要“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不必匆忙去做，要做些研究工作。他的话实际上已告诉了世人一个明确的讯息：科学地历史地评价毛泽东，也要科学地历史地评价“文化大革命”。

但当时国际上十分关切的舆论，尤其是国内的种种错误的言论、思潮，给邓小平和党中央以极大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去完成这一历史性的任务。

1979 年 3 月 30 日，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要求今后对来自“左”和右的错误思潮进行深入的批判，对于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他说：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

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邓小平强调，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我们的旗帜。

至此，党中央已很明确，要实事求是地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5. 叶剑英拉开序幕

1979 年 9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些人开始有步骤地总结建国 30 年的历史，并在广泛征求党内外人士意见，经过多次酝酿和讨论中写出了关于 30 年历史总结的意见稿。1979 年 9 月 2 日至 28 日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对这个意见稿再作讨论和修订，决定在建国 30 周年庆典上发表。

1979 年 9 月 29 日晚，人民大会堂，在隆重的建国 30 周年庆祝大会上，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发表了这一长篇讲话。

叶剑英说，30 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看不到这个伟大成就是完全错误的。

当然，大家知道，我们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既有过比较顺利的发展，也有过严重的挫折。同全国人民作出的艰苦努力相比，同社会主义制度应当

发挥的优越性相比，我们的成就很不够。我们必须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

关于“文化大革命”，叶剑英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林彪、“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对我国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

叶剑英郑重指出，“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了四条主要教训：第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因此，无产阶级取得了全国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上。

第二，对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的国内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必须作出合乎实际的科学分析，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

第三，必须正确理解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尤其重要。

第四，必须进一步健全党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全体党员和全体公民的民主权利，使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叶剑英的长篇讲话，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党史和国史的第一次全面的、客观的回顾和总结。他在讲话中说：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 30 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

叶剑英的国庆讲演，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关注。国外新闻界敏感地观察到：中共开始大规模地“反思”历史。

叶剑英的讲话实际上拉开了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序幕。

1979 年 11 月，中共中央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成立文件起草小组。这项工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1980 年 2 月后）的领导下，由邓小平和胡耀邦亲自主持，指定由胡乔木任文件起草小组组长，邓力群等数名理论工作者参与起草。

6. 邓小平讲：中心意思是三条

从 1979 年 11 日到 1981 年 6 日，整个决议的起草与修订历时两年，国和全世界都在关注着。邓小平更关注起草工作，这是他最重视的文件之一，关注的核心是如何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1980 年 3 月，胡乔木等人苦战了几个月拟出了《决议》提纲，送给邓小平审阅。

3 月 19 日，邓小平约请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话。他说：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

邓小平对胡乔木等人讲《决议》总的要求、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应该有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

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好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

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

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犯了错误。在讲到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对建国 30 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他说，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邓小平最后说道：“对历史问题，还要粗一点，对有些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祝”1980 年 4 月 1 日，邓小平对决议稿的框架结构做了设计：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段，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束语。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谈了对建国后头十七年历史的看法，指出：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人都正确，只有一人犯错误。

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他再次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

1980 年 6 月，决议草稿出来了。邓小平仔细看完决议草稿后，感到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象一个决议，没有很好地体现原来设想的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因此，邓小平提出这个决议草稿不行，要重新来。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是什么方面。邓小平指出，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恰当。

单单讲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

对毛泽东的评价，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分辨毛泽东个人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而且关系到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如何分清建国 30 多年的历史上的大是大非。所以，不仅仅是邓小平，全党都是十分慎重、严肃的。

1980 年 7 月，起草小组将按邓小平指示精神修改过的决议稿交中央书记处讨论。

中央书记处是在 1980 年 2 月 23 日至 25 日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恢复成立的，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会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在 1956 年至 1966 年间就担任着这一职务。

并选举（以姓氏笔划为序）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也是在这次全会上，胡耀邦等人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认为这不仅是适应繁重工作的需要，而且是为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长期连续性，保证党的集体领导的长期稳定性的需要。

会议同时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担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中央书记处一成立，就直接领导着决议起草工作。这次讨论中，中央书记处书记们都主张决议一定要客观、历史，功与过一定要分清。

为了更广泛地征求意见，1980年10月，《决议》的征求意见稿扩大到党内军、部级高级干部，进行讨论。

讨论的意见出现了一些偏激的现象，特别有些挨过整的人，带着私人感情，对毛泽东提了不正确的批评。

有人说：“毛泽东同志犯了很多错误，《决议》中就干脆不写毛泽东思想部分。”有人提出：“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连古今中外哪一个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发生的问题也比不上这个严重。”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归根到底，他不是为革命事业，而是维护自己的地位，这表明他的品质不高尚。”有人说：“评价毛泽东可以分前后两段，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后者是极左主义者。”还有人激动地说：“整个建国三十年来，中国发生很多次重大错误和失误，所有这些错误都应该由毛泽东一个人负责。”《决议》起草小组把这些意见收集起来，于10月25日送到邓小平处。邓小平发觉人们思想认识上有偏颇现象，必须统一思想。

邓小平对胡乔木等人谈话时指出：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期翻身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它还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

说到此处，邓小平非常严肃：“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写。”“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邓小平指出，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不是孤立的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的错误，不能写过头。

写过头，给毛泽东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决议起草小组又作了修改。到1981年3月，决议稿的轮廓基本定了下来。

这时候，决议起草小组组长胡乔木由于劳累而再次病倒。年近七旬的胡乔木是毛泽东的六大秘书之一，从1941年到1966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整整25年。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在党中央、毛泽东领导下，由他负责起草的。当时的中央委员会里，就都知道党内有乔木这样一个人才。

对胡乔木来说，毛泽东既是全党、全国人民的领袖，是直接的领导他的上级，又是他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引路人。有人就曾说过：“没有同毛泽东的这段缘份，就没有今天的胡乔木。”毛泽东对胡乔木确实关爱有加。而胡乔木对毛泽东则有知遇之恩，历其一生，对毛泽东敬重和景仰不减，即使在“文革”中他受到迫害，遭到毛泽东的冷落。

龚育之等人曾说：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这段时间，帮助毛泽东做了许多工作，出色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许多任务。随着经验的增长，他在协助毛主席的工作上愈来愈默契，毛主席对他的使用也可以说达到得心应手的地步，这是十分难得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乔木同志与毛主席这样的秘书与首长的合作关系，也是不多见的。

历史的重任又一次落在胡乔木身上。又有谁能比胡乔木更加熟悉，了解毛泽东呢？决议通过后，邓小平曾动情地说：“写这个决议确实不容易。

起草这个决议的同志，乔木同志，确实是颇费苦心。”对胡乔木来说，最费苦心的就是“文革”十年这一段怎么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1980年3月15日，胡乔木提出上述两大难题要解决一下。

胡乔木认为，发生“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错误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其一，“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和估计犯了错误。”长期的阶级斗争在党内形成一种思想倾向，认为抓阶级斗争是党的最重要的工作。长期阶级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在转到建设的轨道上来的时候，没有成功。

第二，“与此相联系的，是把政治作用估计到不适当的程度，说政治统帅一切。既然政治挂帅一切，而阶级斗争又继续存在，继续发展，结果就变成阶级斗争统帅一切。

实际上，建设是不能光靠政治就能搞成功的。”第三，“在国际方面也有这种因素。反霸权主义斗争是正确的，但是，范围也扩大化了，表现在‘九评’中。这转而又影响了国内的斗争，并且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第四，“国内因素还有一个，即国家民主化进程的中断。从制定第一个宪法以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的作用，开始还明显一些。以后，人大、司法机关等等，慢慢就不起作用了，司法部经过多次批判甚至被取消了。”第五，“在党内生活方面，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威信过份突出，这有好些标志。粗一点讲，庐山会议是一个重要标志。林彪上台后掌握军队，首先在军队范围内搞个人崇拜……这对‘文化大革命’起了准备作用。林彪这样搞，加上提出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口号，又把影响扩大到军队以外了。”第六，“国家本身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落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第七，在“文化、教育、知识分子（主要的是文化）等方面长期以来的偏向，对‘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海瑞罢官》的批判不会搞得起来。在全国范围内，由党中央亲自动手批一个剧本，搞得规模那样大，这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也受到斯大林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由日丹诺夫出面，批了好些作品，但是都没有像中国那样搞成大运动。

解放以来，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文艺上批《李慧娘》、《谢瑶环》，哲学上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异议，批“合二而一”，等等，应该说的不寻常的。问题是这种批判带有特殊的政治色彩，简直使人民不知道党的工作中心究竟在哪里。“文化大革命”，是同这样一些特殊的趋势分不开的。非这样办不可，而且全党都非这样办不可。《清宫秘史》的批

判没有能开展，所以到“文化大革命”来补课。

在这个背景下，为什么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会成为这么大的斗争的导火线，就容易了解了。

胡乔木还就毛泽东思想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胡乔木认为毛泽东思想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察：

第一，毛泽东思想需要先从理论上讲。比如，对毛泽东的名篇《实践论》，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方面，来说明它的地位，它的价值怎样。

第二，群众路线，也可以当作一个理论问题来考察。

第三，三大改造，当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第四，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这里首先就有革命与建设的关系问题。现在国外还有些同情“文化大革命”、对它表示惋惜的人，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认为“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继续保持了革命的势头，革命的劲头。这个问题需要比较深入的分析。

第五，自力更生为主。

第六，两条腿走路。

第七，还有两类社会矛盾。

第八，还有反对大民族主义。

第九，还有一个反对大国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问题。

第十，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

胡乔木提出的上述问题，无疑是起草决议中不容回避、不应回避、必须做出回答的重大问题，胡乔木的真知灼见对解决和回答这两个问题无疑产生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至此，决议的最主要问题：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都有了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也可以说，决议的定稿已指日可待了。

1982年6月1日，胡乔木的七十寿辰，决议也已通过，他写了一首自寿诗：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判爱憎！

往事如烟更如火，一川星影听潮生。

这也是他的真情流露吧！

7.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与中国共产党正在紧张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时，全世界都以极大的兴趣或者说疑问关注着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

港台的报纸说：“大陆批毛，势在必行。”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一切都很清楚，人们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拿不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在此时，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娜·法拉奇提出要采访邓小平。邓小平很爽快地答应了她。法拉奇是一位以善于抓住关键时机采访风云人物的著名女记者，她以独特的方式采访过全世界几十位著名政治家，而且，每次都获得成功。同行们都称她为“时髦的记者”。

美国、越南战争正酣时，她只身闯入河内，实地采访越战，而且又单飞华盛顿，弄得美国官员头疼。

中东战火绵延，危机四伏，她又来到神秘的中东，紧追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袖阿拉法特和约旦国王侯赛因，让他们谈论中东的和平进程。

1980年8月21日和23日，邓小平在中南海连续两次接受了法拉奇的采访。这是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之后，第一次单独会见外国记者，回答记者提出的国家重大问题。邓小平也深知法拉奇提问向来尖锐、泼辣，也难倒过许多著名政治家。他清楚会见法拉奇时每句话的份量，他的一字一句都代表着国家。

邓小平想借一位外国记者的笔向世界宣示中国的态度，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当然，法拉奇的名头大更好。

法拉奇提问果然尖锐，一开始就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此问有因，也大富深意。

1980年7月30日，人民大会堂前的巨幅毛泽东画像被摘下，两幅永久性的巨幅标语也被摘去，引来许多责问和疑问。

同样的行动在全国各地、各部门、各单位间相继开展。

毛泽东的画像被从门眉上摘下来，从教室里取下来，毛泽东的塑像被拆除，铺天盖地的毛主席语录要么被覆盖，要么被清洗，总之一句不留。

十几年前，各地比着把毛泽东像雕得坚固宏大，现在拆除可带来了大麻烦。据说河南、湖南等地和有些部队，因塑像太坚固不好拆除，使用了炸药。

邓小平的回答也很干脆：“永远要保留下去。”他说，过去毛泽东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泽东的尊重。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此前的8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具体规定下发到全国各地，要求坚持“少宣传个人”。

其中，一段文字专门讲到宣传毛泽东的问题，通知说，毛泽东的画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开场所挂得太多，这种做法很不庄重，也有损于毛泽东的形象，今后要减少到必要程度。

法拉奇紧接着更尖锐的说：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小平很清楚“五个手指”的所指，便他并不回避，指出：毛泽东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邓小平说，毛泽东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校“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邓小平用锐利的目光盯住法拉奇，坚定地说：“我们要对毛泽东的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法拉奇是有备而来，她抓住邓小平曾说过的话来反问邓小平：“你说在后一段时期毛主席身体不好，但刘少奇被捕入狱以及死在狱中时，毛主席身体并不坏。过去还有许多其他错误，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

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到底要追溯至何时？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问得很深刻，邓小平也没有回避：“错误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是发热了。”他接着说，“由于教训总结得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首先是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校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当回答法拉奇“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时，邓小平表示，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是苏联的一场悲剧。

1953年，斯大林去世。仅过了三年，苏共二十大上，他的接班人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中，几年疯狂地列举了斯大林的诸多罪状。

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是一个暴君，是一个热衷于搞个人崇拜的狂人，甚至是一名屠杀党内干部的凶手。他咬牙切齿地批判斯大林的一切，把斯大林的遗体逐出列宁墓，把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城市改名。赫鲁晓夫此举，影响了苏东的社会主义国家，影响了整个世界对共产党、对斯大林的看法。

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则坚持对斯大林的客观评价。毛泽东曾说：“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那篇文章。

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邓小平正是循着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来评价毛泽东的。他多次强调：“毛泽东思想丢不得。丢了这面旗帜，实际上就否定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是我们党的一贯看法。及至后来苏联剧变解体后，江泽民就说过原因之一是苏联先丢了斯大林这把刀子，又丢了列宁这把刀子。

在谈到抓“四人帮”的情况时，邓小平主动谈到，建立毛主席纪念馆是违反毛泽东自己的意愿的。

“那么毛主席纪念馆不久是否将要拆掉？”法拉奇来了个顺手推舟。

邓小平回答说，我不赞成把它拆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馆。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法拉奇突然把一个尖锐的问题提了出来：“在中国，有那么一个人，与你不同，从来没有被打倒过……”邓小平知道这是法拉奇在暗示周恩来，不等她说完，他就动情他说：“周恩来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

‘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亏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许多违心的话，做了许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邓小平又对法拉奇解释说：“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

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不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法拉奇极力尝试把话头扭转 to 邓小平自己身上，她问：“为什么你想辞去副总理职务？”邓小平从容不迫地答道：“不但我辞职，我们老一代的都不兼职

了，‘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在于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领导职务终身制。我们存在一个领导层需要逐渐年轻化的问题。我们需要带个头。”法拉奇最后问邓小平：“你對自己怎么评价？”显然，这是一道十分难答的考题。

但邓小平提供了满意的答卷，他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是毛主席一个人的。

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法拉奇两次采访共进行了 4 个小时。邓小平的敏锐、坦率、机智使她佩服。在对她的提问回答中，邓小平不推脱责任，没有个人恩怨，没有回避矛盾，而是以一个老革命家对历史客观的评价，最主要的是对毛泽东的评价，成为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指导精神。

8 月 28 日，意大利报纸上发表了法拉奇的采访报道，把与邓小平的谈话内容原原本本地写出来。一时间，各国报纸纷纷转载，发表评论。

有的外电评论：“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评毛泽东，但是将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今后的中国将与毛路线诀别，进行四个现代化。”在邓小平会见法拉奇后不久，中央警卫局把这次谈话向警卫局的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和战士都觉得这样好，能够接受。

中央警卫局的战士们都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的职责就是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警卫局的干部、战士能接受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意义很大。此后，中共中央许多人也纷纷发表讲话，表明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态度。

1980 年 11 月，开国十位大将之一的黄克诚在中纪委一次会上，坦诚评价毛泽东功过。

从 1959 年庐山会议，黄克诚与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起，先是被撤销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紧接着又被撤销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后来就受到“左”倾错误的长期迫害。但是，这位老共产党人，不计较个人恩怨，仍然高度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他语重心长地说：“过去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都有份。如果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所犯的 error 都算在毛泽东身上，让他承担责任，这样作不符合历史事实。有些人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1981 年 3 月，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指示和四千人的讨论意见，对将修改后的文稿提交政治局、书记处人员和部分德高望重的干部再次征求意见。

1981 年 3 月 3 日，陈云对决议修稿改发表了两条意见：第一，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 60 年。这样，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第二，建议中央提倡学习，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陈云的上述意见，在 3 月 5 日，很快由邓小平转达给起草小组。

同月，陈云再度就决议起草发表以下几条意见：第一，关于建国以来的 32 年中党的工作的错误，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第二，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 28 年历史的段落。第三，要

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第四，要写国际上对我们的帮助。

3月24日，陈云就此事又与邓小平交换了意见。邓小平听了陈云的意见，说：“这个意见很好，应该写进《决议》中。”1981年5月，经过修改的《决议》讨论稿提交到由75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人员用10个半天时间，进行了反复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把邓小平、陈云的意见当作《决议》的前言部分。

后来，在正式成文的《决议》中就当成了“回顾”部分。有了这部分，就可以全面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决议》写道：“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8. 不要再讲华主席党中央

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中央核心领导层的重大变动也在酝酿之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华国锋的职务变动问题。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华国锋的地位已开始动摇随着“两个凡是”的被批判，华国锋也不得不就“两个凡是”问题作出检讨和说明。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提出“不要宣传我个人”，以后不要再讲“党中央华主席”，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党、歌颂老一辈革命家与工农兵英雄事迹。

十一届三中全会则被普遍认为是短暂的“华国锋时代”的结束。

三中全会后，中央办公厅陆续收到党内外一些人的来信，建议在各种场合，凡是有华国锋同毛泽东的像片并列挂的，把华国锋的像取下来。胡耀邦把原信转给华国锋，华国锋在信上划圈。

三中全会提出少宣传个人后，中央党校的一位学员于1978年12月29日写信给华国锋，说红星养猪场把你用过的东西陈列出来，这不好，应当取下来。1979年1月16日，华国锋回信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领导对红星养猪场的同志们做了思想工作，把陈列物品撤去，以后如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其实三中全会当时提出“少宣传个人”，主要是针对历史的教训和华国锋个人的宣传太突出而提出的。

鉴于华国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多次研究，一致认为应把国务院总理这个职位进行调整，并正式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

五中全会决定同意华国锋辞去总理兼职，而由赵紫阳接任。1980年8月至9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改由赵紫阳接任。

华国锋辞去总理职务，仍担任着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两个要职。

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问题。与会者认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切中我们弊端的要害，必须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这个制度不改，我们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我们很多问题的毛病都是由此而来。与会者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谈到华国锋身兼数职的问题，甚至进一步提出，按照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工作情

况和现实表现来看，按照他的能力和水平来衡量，不但把党政军三项最高领导职务集中于他一身不好，而且仍由他继续担任党中央主席也不合适，当军委主席更不恰当。

10月，全党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历史决议初稿时，无论中央机关，国家机关或军队系统都有许多人提出，希望能对粉碎“四人帮”后四年的工作作出总结，一致要求在决议中要写上这一段。在对这段历史的讨论中，许多人对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来工作中的错误提出批评意见，并要求调整他担任的职务。

经过1980年8月和10月的两次讨论，中央政治局常委认真地考虑了大家的这一意见，对华国锋进行了批评和帮助，并认为改变他的现任职务是必要的。

1980年11月10日、11日、13日、14日、17日、18日、19日、29日和12月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9次会，除刘伯承、聂荣臻二人因病未参加（聂荣臻来信同意会议内容）和陈永贵、赛福鼎二人未通知到会外，实到政治局委员21人，候补委员1人。中央书记处7人列席。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中央政治局准备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变动方案。

1980年1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集体会议，华国锋走进会场时，他已从人们的目光中感到了压力。所以，他在发言中首先要求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其他职务，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作了一些检查。

但人们很清楚，他的检查中捎带着许多辩解。由此，便引来其他委员发言中对他过去四年工作中的错误及他在这次会议的发言提出了批评。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在政治局会上作重要发言。他在肯定华国锋成绩的同时，也对华国锋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胡耀邦说：华国锋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也应该说是老同志了。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40多年来，华国锋同志也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

这个，我看也应该是肯定的。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

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的确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作出的贡献。

在谈到华国锋同党、同人民的关系摆得很不正确的时候，胡耀邦列举了华国锋的五条表现：第一条，对个人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上，表现得很不正确。第二条，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一开始，或者叫一起步，国锋同志就离开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第三条，在干部方针上，脱离了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志。第四条，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确实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第五条，在突出个人问题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

胡耀邦在发言中还批评了华国锋对毛泽东晚年错误采取的态度。胡耀邦指出：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期，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1971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工

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

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会是真心话。

这里边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

除胡耀邦外，出席政治局会议的所有人员都在会上发了言。

与会者在发言中，对华国锋在过去四年工作中的错误以及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提出了批评意见。

这些批评意见集中在：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这一事件有功劳，应予肯定；但不应把功劳只归于个人。

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并长时间坚持这个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在三中全会后他的思想有改变，但在一些原则问题还没有根本的改变。

华国锋在十一大前后提出一系列政治口号，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他从未主动提出过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倡议。他对解放党内大批老干部、平反历史上大批冤假错案的态度，他对中央领导层一些人的态度，明显地违反了党内大多数人的愿望。

华国锋很热心于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迷信。被称为英明领袖，把自己的像和毛泽东的像并挂，接受种种出格的歌颂，觉得心安理得。这种情况，甚至在今年不久以前还在继续。把个人同党和人民的关系摆错位置，这是严重的思想问题和党性问题。

1977、1978 两年中，华国锋在经济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这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和困难。这主要是一个经验不足的问题，不能由华国锋一人负责，但是他确有重要的责任。

有一个人心平气和地同华国锋面对面地说：“你在过去四年工作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回头环顾大家：“他对军委工作不能胜任是大家知道的。”在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还进一步指出，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因此，国锋同志自己提出要辞去这两个职务，我觉得好。

这对党、对华国锋同志自己都有好处。

鉴于上述情况，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同志继续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不适当的。

在会议上，许多人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因为这是众望所归。邓小平认为，由他担任中央主席不适宜。从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一直致力于让比较年富力强而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同志担任领导工作。他认为在六十多岁的人中，胡耀邦担任中央主席比较适当。至于军委主席暂时没有其他适当的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比较年轻的人将来接替。当然，只有六中全会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决定。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

12 月 5 日，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天。华国锋发言，表示欢迎对他的批评。他再次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要求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确实

需要集中力量考虑自己的问题，因而同意他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意见，但在六中全会作出相关的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

中央政治局并且表示希望，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华国锋犯了“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但不要说成是路线错误。路线、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等提法没有明确的科学含义，使用这些提法过去在党内造成很不好的后果，以后要尽量少用。

中央政治局最后通过三项决议：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中央政治局着重指出，前两项都只是对六中全会的建议，全会如何作出决定，这是全会的权力。全会当然会审慎地考虑这些问题，并严格按照党内民主原则来进行讨论、表决和选举。

当时，考虑到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为了使党内军内高级干部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这次会议的内容通知省级常委以上的同志，并由他们向参加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4000 名高级干部传达。并要求：“为了保证全党全国全军的安定团结，中央要求所有上述同志严格保密，绝对不得外泄。”这样，十一届六中全会决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并改选华国锋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到 1982 年 9 月中共十二大时，华国锋就没有能够再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

但他仍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职位。在 1987 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1992 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和 1997 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他仍然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自九大以来，华国锋就一直是中央委员，这近 30 年在中共历史上少有。他亲笔题写的“毛主席纪念堂”几个字仍镶嵌在座落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的毛主席纪念堂上。

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决定对《决议》讨论稿根据会议讨论意见进行改写后，将仍在 3000 人范围内再讨论一次，在再次修改后提请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认为，现在通过这一决议时机已经成熟，不宜再行延迟。

因为决议要写粉碎“四人帮”后两年的问题，就有人提出是不是提华国锋的名字？邓小平说：“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的工作。”“同时，按现在政治动态来说，也有必要。大家都知道，现在‘四人帮’的残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谁的旗帜？过去是打‘四人帮’的旗帜，现在打谁的旗帜？就是打华国锋的旗帜，就是拥护华国锋。”他还说，当然这些事华国锋本人没有责任，他自己并没有搞什么活动，“所以，我们这个决议里面写上华国锋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可以说，华国锋的去职及新中央领导集体形成，对决议早日定稿和对 1976 年到 1978 年这段刚逝去的复杂历史的科学评价，提供了相当宽松的政治气氛。

、乔木同志，确实煞费苦心

历史已进入1981年。这一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60周年；是辛亥革命70周年；是又有许多新事物涌现的一年。人们关心的事情很多，当然也很关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能否拿得出来，拿出了会是什么样子。

邓小平设想就在党的60周年发表。他说，“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当然，需要一个好的稿子。”1980年10月，决议草稿在4000名高级干部中讨论了20天。

1981年3月31日，决议草稿又送达中共中央52位主要负责人手中征求意见。

198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又邀请70多人对决议稿讨论了12天，修订后于5月16日基本通过。

邓小平说，为了早点把稿子拿出去，再搞4000人的讨论无必要。现在的方法，就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70多个人，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定下后，提到六中全会。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政治局邀请70多名党员领导干部对决议稿进行讨论修改。

之后，又征求了130名各民主党派代表的看法和意见。至此，决议稿基本成熟和完善，可以提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举行预备会，对决议稿进行第四轮大的讨论。邓小平在会上讲话，对决议稿给予了高度评价：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

我们原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邓小平还谈了很多。这已是他第9次具体地对决议发表意见。

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他也确切地是这次历史决议的总设计师。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及他的同志们的杰作终于向世人展现，时值“七一”前夕。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95人，候补委员114人，列席的53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主持了会议。

6月27日，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文共38条，分为8个部分。主要内容是：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历史的伟大转折；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决议回顾了党的60年的战斗历程，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对建国以来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了总结，明确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深入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决议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正确路线。

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这场运动的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是完全错误的，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历史新时期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对“文化大革命”作出的完全否定的结论，显然，这一结论比以往的提法更准确、更符合历史真实。

决议认为，党的建国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的主观原因和社会历史原因，首先是毛泽东在领导上犯了“左”倾错误，除此还因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党缺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准备和经验；毛泽东在他的威望达到高峰后，逐渐骄傲，脱离实际和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破坏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而我们的领导制度和个人崇拜的传统习惯又使毛泽东的错误难于得到制止，结果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决议的核心部分，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决议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

决议分清了大是大非，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为维护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保证。正如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上所指出的，决议真正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

同样的，历史决议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1981年5月19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乔木曾披露过一些决议稿的内情，细心的读者也可以从决议原文中找出来。

胡乔木所透露的重点是“全稿未用或极少用错误路线、机会主义路线、路线斗争和路线等术语。”他解释说，路线一词，马恩列都少用，在他们的主要著作中未用，在其他著作中用时也未给予何种严重意义。中国共产党直至共产国际提出反立三路线以前亦很少用路线一词，如二大至六大的文件都未用过。自王明以后，才大用，并且用法愈来愈神圣化、神秘化。党的历史决议不能简单化为路线斗争史。路线错误、路线斗争两个词，不知害了多少人。中央在批评华国锋错误时开始决定不用路线错误，很得人心。原来考虑在这个决议中最后用一次，后来大家认为最好还是从这次决议就不用。用起

来要引起许多困难和纠纷。哪次算路线错误，哪次不算？在这些路线斗争中究竟谁们是正确的，谁们是错误的？每次路线如何起止？这次决议用了，以后如何停止使用？在停止使用时要不要承认这次决议用得不对，因此又得对决议加以修改？想来想去，只有就此不用，恢复马列传统和我党原有传统是上策。

早在 1980 年 3 月 19 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话时，就详细谈了他对“十次路线斗争”的看法。不妨原文照录：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

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

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 1953 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

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至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表明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刘少奇推倒，采取搞阴谋、搞交易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

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

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你们再斟酌一下。

1957 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

胡乔木还解释了何以“批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不再用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这在决议上也说得很清楚。

决议中一些细节他也说到了：如把个人迷信改为个人崇拜，后者是马克思的原话，八大也是这样用的，不宜用个人迷信代替，因含义不同。还有，比如说，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过去邓小平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样说很正确的，并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这样就不好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并列。所以在决议稿中换了一个说法，实质上并没有变化。

这次历史决议要郑重讨论毛泽东的错误，深刻总结历史教训，全面评价“文化大革命”时期。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样，在决议起草过程中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毛泽东“自己跟自己打架”，怎么解决？成文的决议是首先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论点全部列出来，用的都是毛泽东自己的文字，并经过了反复核对。这些论点列出来后，很容易给人一个印象，即到了“文革”时期，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从性质和程度上已同“文革”前大不一样。决议稿的论断：毛泽东发动这“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列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这不是毛泽东“自己跟自己打架”——他所反对的往往是他过去所坚持的东西。

在决议起草过程中，最初这部分写来写去，中央不满意，其他参加讨论的人也不满意，觉得稿子起点太低，许多问题说不清楚。

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再指迷津。他说：“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在答问法拉奇时，邓小平也说，毛泽东晚年的一些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根据邓小平的这些观点，胡乔木亲自执笔，深思苦虑，终于写下了绝妙一笔：“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背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十一届六中全会前，曾请党外人士对决议稿提意见时，有的党外人士就说，决议是个杰作，表现在它是用毛泽东思想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

后来邓小平所说，“乔木同志，确实煞费苦心”，当指此节。

从1979年11月21日到1981年6月，决议从起草到获得通过，整整22个月，距今也整整16年了。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而且“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这个重大决策的魄力和远见”。

这是江泽民的话，他还说：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大的历史贡献，这件事关系到如何看待党和国家几十年来奋斗的历史，也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和党、国家未来的发展前途。所以这是小平同志作出的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万代的大事。

10. 最后一任党中央主席

1981年6月29日结束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无疑是一次倍受关注的大会。

其一是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过去的人与事的是非功过作了一个公认的结论。

其二是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改选和增选：已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被选举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央政治局常委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选举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次中央领导层的变更，是对1980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果的

公开，是对一个事实的承认。但仍然引起了轰动。

邓小平出任军委主席是众望所归。国内外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公认他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1979年元月，以副总理身份出访美国的邓小平，享受着红地毯的待遇。

当他和美国总统卡特并排站在白宫草坪上，面对整个世界时，没有人怀疑他的领袖地位。

所以那次的政治局会议，就有许多人推选或者盼望邓小平同时出任党中央主席。邓小平拒绝了，他推荐了胡耀邦，政治局会议接受了。

也就是说，从1980年12月6日起，胡耀邦即开始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日常工作，只不过不用正式名义。

1981年6月29日，胡耀邦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时年66岁。

次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决定不设党中央主席、副主席，只设党的总书记。胡耀邦被选举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是最后一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1915年11月20日，胡耀邦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文家市是一个小镇，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队伍，曾停驻这里。就在文家市的一所叫里仁学校的教室里，决定上井冈山。

1929年冬胡耀邦在家乡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5月，中央红军解放浏阳县城，正在县城中学读书的胡耀邦受党的派遣，回乡担任乡团支部书记等工作；1932年5月被调到湘赣省委做儿童工作。1933年1月到瑞金，在少共中央局担任了各种工作。“红小鬼”即从那时喊出。193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当时他在江西、湖南和福建革命根据地从事青年工作，宣传党的主张，积极同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斗争。

1934年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攻打娄山关战斗中负伤，他的身上后来一直留着敌人的弹片。到达陕北后，他先后担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1937年5月，胡耀邦在延安抗大，先后担任抗大政治部主任、瓦窑堡一大队政委。

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和第三纵队政治委员、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先后参加了保卫张家口，解放石家庄、太原和宝鸡等战役，他为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9年，胡耀邦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新中国诞生后，胡耀邦担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和军区政委，领导川北人民进行土改、剿匪、反霸斗争，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生产。从1952年起，他长期主持团中央的工作，先后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青年工作十分活跃并且积累了重要经验的时期。特别是他非常注意在实践中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年，按照青年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提倡“实事求是，朝气蓬勃”的作风，使团组织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从而带领广大青年很好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光荣任务。

1962 年，胡耀邦带职下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1964 年底后，他在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努力工作，推进了所在地区的各项建设。

“文化大革命”期间胡耀邦遭到残酷迫害。但他不顾个人的荣辱安危，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1975 年重新出来，主持中国科学院的工作，领导科学院的整顿，并主持制定了《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9 月 26 日向邓小平汇报，就《汇报提纲》作了说明，并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后来这个著名的文件被“四人帮”作为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之一而遭到批判，胡耀邦当然也难逃厄运。

1977 年，胡耀邦先后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他领导发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当时人称“胡青天”。

在 1977 年 8 月党的十一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党委书记，同时被免去中央组织部长职务。

1980 年 2 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并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

它的设立，使中共中央形成了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三个层次的领导体制。如同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在会上所说的：中央书记处处于第一线，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处于第二线，这样做好处很多，除有利于解决接班人问题之外，从战略上考虑，如果哪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不会影响一群，比较能够经得起风险。

关于书记处的职权，邓小平说，它是管全局的，党、政、军、民、学、工、农、商、学、兵都得管。叶剑英说，书记处就是要准备接中央的班的，是接集体的班，而不是接哪一个人的班。书记处是在中央政治局和常委领导下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叶剑英的讲话清楚地表明，党中央把“管全局的”和“准备接中央的班”的工作交给了胡耀邦负责。

对于自己担任党的主席（总书记），胡耀邦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作了这样的说明，他说：我是在我们党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现在这个岗位的……现在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并没有变：一是老革命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

……至于我的水平并没有变，那更是同志们看得很清楚的。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那个胡耀邦。对待这样的问题，当然主要是靠我自己有自知之明，但是，也要请全党按照这次历史决议的精神，实行监督，首先要请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进行监督。

邓小平对胡耀邦这一讲话是予以肯定的。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说：我们这次把胡耀邦选作党的主席，刚才他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我想，这一段话也证明，我们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1981 年 7 月 1 日，党的 60 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首都各界人士万余名参加。胡耀邦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这是他第一次以党中央主席身份出现在公共场合。

到十一届六中全会时，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阵容已齐，核心是邓小平。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十一届六中全会接受了政治局常委的建议，确定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主席、副主席的排名次序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到十二大时，除华国锋没能再进入常委会外，其它六名常委的排名次序跟十一届六中全会相同。

到十二大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就正式形成了。

对于邓小平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一点，胡耀邦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即有清楚的说明。胡耀邦说：这几年谁的贡献大一些？粉碎“四人帮”之后，政治局和常委的同志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贡献。但是，贡献大一些、多一些的，还是老一辈革命家。拿常委来说，是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四位同志。小平同志因为经验特别丰富，精力很充沛，加上长期斗争建立起来的巨大威望，他起的作用就更突出些。我之所以首先要讲这一点，就是我认为，我们的党还有一些建党前期的老革命家健在，并且在党的领导核心中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实在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幸运。

他们的健在和长寿，使我们党和国家的大事，确实好办得多。即使我们突然遇上十二级台风，我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胡耀邦说，决定我当党的主席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老革命的作用没有变。老一辈革命家仍然是中央起主要作用的核心人物。这个情况可不可以告诉全党呢？我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该。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客观地评价了毛泽东和建国以来一些重大事件和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对中央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

第二编 解脱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

一、大交班

中央变动领导层；邓小平作政治交待，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门口问邓小平表示：我一定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江泽民是合格的总书记

1989年，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风波发生后，邓小平于5月31日同鹏、姚依林谈话，提出要改换中央领导层。

邓小平说，第二代是我们这一代，现在换第三代。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

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

这是最重要的一条。邓小平提出，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为核心，很好地团结。

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

邓小平请李鹏、姚依林把他的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人，说：“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提出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邓小平认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对于这一点，邓小平要求当时所有在座的中央负责人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邓小平说，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邓小平认为，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央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6人。列席会议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84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68人，有关方面负责人29人。

全会之前，中央政治局于6月19日至21日举行了扩大会议，为四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必要的准备。

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江泽民，1926年8月17日生于江苏省扬州市。1943年起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上海解放后，历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厂党支部书记、第一副厂长，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1955年赴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1956年回国后，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处副处长、副总动力师、动力分厂厂长。1962年后，历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副局长、局长。1980年后，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1982年后，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部长、党组书记。1985年后，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书记。

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87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9年6月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在其讲话中，首先谈了对自己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感受和打算。他说：这次中央全会推选我担任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我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又缺乏中央全面工作的经验，深感担子很重，力不从心。

现在全会已经作出决定，我感谢同志们的信任，决心同大家一道，刻苦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尽心尽力做好工作，不辜负老一辈革命家和同志们的期望。

我们党已经制定和形成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和一系列基本政策。

概括地说，就是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最近再次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有信心做好工作的根本的、坚实的基础这次中央领导核心作了一些人事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

1989年11月6日至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全会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并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江泽民在十三届五中全会结束时作了重要讲话，其中又谈了对自己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感受。他说：这次全会选举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我感谢同志们的信任。

我在四中全会说过，选举我当中央总书记，没有思想准备。这次选举我当中央军委主席，也没有思想准备。我没有做过军事工作，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深感责任重大，力不从心。党把这副重担交给我，我一定努力学习军事，尽快熟悉军队情况，认真地、积极地履行职责。十多年来，在小平同志领导下，我们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已经奠定了良好基础我们的军队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共和国的钢铁长城。党的建军原则和军队的光荣传统，要一代一代坚持和发扬下去。我相信，在党中央领导下，依靠军委的集体智慧，依靠全军同志的共同努力，依靠全党全国人民的支持，一定能够把军队建设和军事工作不断推向前进。

十三届五中全会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1989年11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称赞江泽民总书记“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

邓小平说：作为知识分子，他比我知识多，当然经验比我差一些，但经验是可以锻炼出来的。他今年只有63岁。有这个领导班子我很放心。

1990年3月至4月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接受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的决定，选举江泽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93年3月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江泽民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对于这一选举结果，江泽民表示：国家主席责任重大。我将忠诚地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恪尽职守，勤勉工作，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的重托。

至此，江泽民不但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军委主席，而且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2. 邓小平彻底退休

从党和国家的前途着眼，邓小平早就坚决主张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他本人多次表达了退休的愿望。

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提出，要建立有利于提拔年轻干部的制度，只靠顾问制度不能解决问题，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邓小平说，我自己就有这个想法，如果党允许我今

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不是假话。从整个事业看，我现在还不可能退休，我想大家也不会赞成。但是，就我个人的心情来说，确实感到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

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郑重提出要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他在这一年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1981年7月4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书记座谈会上说，解决干部年轻化这样一个大问题，我们老干部要开明，要带头。

不开明可不行呀！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当然，现在还不行。

1984年10月22日，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针对国际上“邓某人不在政策要变”的担心，邓小平说，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所以，我的工作方法是尽量少做工作。两年前我就说过，我希望带头退休。邓小平表示，我希望逐步过渡到完全不做工作但身体还是好的，那样我就完成任务了。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

华莱士问邓小平：您是中国的第一号领导人物，您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再留多长时间？邓小平回答说：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你也知道，我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谈话时说，我干到一九八五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但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在党内和人民当中很难说服。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

但这件事还要做更多的说服工作。最终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决定。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要服从人民的意愿。我还是希望能够说服人民。

华莱士进一步追问邓小平：您当时告诉法拉奇准备一九八五年退休，您准备对华莱士作什么表示呢？邓小平坦率地告诉他：我正在说服人们，我明年在党的十三大时就退下来。但到今天为止，遇到的是一片反对声。

在开始准备十三大人事安排工作时，1986年10月，邓小平与李先念、陈云共同约定在十三大时一齐退下来，不只是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而且要一退到底，退出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统统退。然而，在十三大召开前夕的十二届七中全会上，许多代表要求邓小平不要退。

针对“小平不能退”的呼声，邓小平多次答复和解释，表示他不退不行。邓小平说，老的不退，新的就上不来，椅子就这么几把。

新的上不来，我们党就会老化，都成了七老八十的人，在这种状况下是危险的。到那时候，我们一退下来，年轻人一下子上不来，经验不够，锻炼不够，对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有很大的不利。他还说，我们退下来，不仅有利于保持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的连续性、稳定性，而且还有利于我们真正地实行退休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人事安排小组经过议论和研究，提出了让邓小平“半退”的办法，即先退一点，过一段时间再全退。这样，到1987年11月召开党的十三大时，邓小平就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也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只留任党和国家的中央军委主席一职。邓小平后来谈到，十三大搞了个半退，但我一直认为那时全退最好。

在十三大上，李先念、陈云也实行了“半退”，两人都退出中央委员会，陈云由中纪委第一书记改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李先念在十三大之后不久由国家主席改任政协主席（国家主席由杨尚昆接替）。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四老”不约而同地提出“全退”，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彭真辞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由万里接替），邓颖超辞去政协主席职务，徐向前、聂荣臻辞去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

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后，邓小平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愿望。

邓小平认为自己已经做成的事不少，但“还没有能够实现的，就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发生后，邓小平考虑马上退还不行，但表示新的中央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他就“坚决退出”。

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国内政局逐渐平稳。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经过慎重考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他认为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

为此，邓小平于1989年9月4日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并表示他也将向全国人大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

信中说：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

在致信中央政治局的同一天，邓小平与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人谈话，商量他退休的时间和方式。

邓小平觉得要想等一个多么适当的时候再退，是等不到的，每次都总有一点因素说退不得，而即将召开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就是一个时机。因此，邓小平表示，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他说，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上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

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考虑到中国的安全，现在退比发生了事情退或者在职位上去世有利。

退的决心我已经下了好几年了。我曾多次提出，是真心的。

邓小平明确提出：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

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吧。

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时谈到了自己退休的问题。他说，我已经八十五岁了，多年来我提出退休，每次都遭到大家的反对。十三大的时候先搞半退，只当军委主席。我全退需要中央同意，我在做这方面的工作。邓小平以不久前香港传说他被刺、病危以至引起股票市场波动为例，向李政道说：这说明早退好些，希望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

根据邓小平的请求和中央政治局的安排，1989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把邓小平退休的问题作为会议的两个主要议题之一。全会认真讨论了邓小平的辞职信。开始，中央政治局常委考虑，目前中国的建设和改革正处在关键时刻，又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形势，很需要邓小平继续为我们掌舵，

恳切希望他迟一点退下来。但邓小平一再说明，现在退下来更有利。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认真研究，又经过十三届五中全会讨论，统一了认识，大家认为邓小平高瞻远瞩，应该尊重他的意愿，同意他的请求。

1989年11月9日，十三届五中全会对邓小平退休问题进行表决，这对一位参加革命六十余年的85岁的老人来说，是他人生重大转折的日子。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记述了邓小平这一天的情况。

像往常一样，邓小平按时起床，准时而规律地吃了早饭，坐下来看书、看报、看文件。上午九点多钟，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来到邓小平家，向邓小平汇报了正在召开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关于邓小平退休的议程、日程的安排和讨论情况。他告诉邓小平，经过阅读有关文件和讨论，与会人员逐渐理解了邓小平请求退休的决心和意义，许多人在发言中讲了很多相当动感情的肺腑之言，今天下午全会将进行表决，晚上由新闻公布。

邓小平听后十分高兴，说：“总之，这件事情可以完成了！”下午三时，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进行表决，正式通过了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请求。

这天下午，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出席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全体代表道别。

在人民大会堂休息厅里，刚刚从五中全会会场内出来的中央领导，看到邓小平进来，纷纷走过来和邓小平握手。江泽民一步趋前，紧紧握住邓小平的手。这时，江泽民建议，几位领导一起，和邓小平照一张相。当江泽民、杨尚昆、李鹏、姚依林、乔石、宋平、李瑞环、王震、薄一波、万里、宋任穷、胡乔木等十二人簇拥着邓小平一字排好后，记者们一拥而上，拍下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随后，邓小平一行人走进人民大会堂大厅，顿时整个大厅响起热烈的掌声。邓小平走过中纪委委员的行列，走过中顾委委员的行列，走过全体中央委员的行列。邓小平站在麦克风前对代表们说：“一句话，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地感谢全会，衷心地感谢同志们。”在邓小平离开人民大会堂的时候，江泽民一直把他送到门口，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革命历史和卓著功勋，指出：邓小平同志是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领导人，在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几十年来的革命实践表明，邓小平同志不愧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我们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领导人。邓小平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1990年3月至4月，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批准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退休后的邓小平，并没有放弃对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建设事业的深深关注。

二、邓小平谈治国之道

邓小平的政治交待：要以江泽民为核心，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邓小平向第三代领导人讲治国方略。

1. 谁改变谁垮台

1989 年政治风波发生后，全党都在思索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国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的目标？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全党都在思索，而想得最多、最深刻的是邓小平。邓小平认为，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正因为这样，邓小平总在想这两个问题。

经过一番深思，邓小平认为，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当说，我们所制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至少不能说是失败的。61 年后，一个 15 亿人口的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了不起的事情。

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应该是能够做到的。不能因为一次政治风波的发生，就说明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

对于第二个问题，邓小平回答说，我们没有错。他说，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邓小平提出建议并请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邓小平指出，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

以后我们怎么办？还在北京政治风波尚未平息时，邓小平即向李鹏、姚依林交待：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要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在此之前，邓小平曾为此征求李先念、陈云的意见，他们也都表示赞成。北京政治风波平息后，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指出，今后照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邓小平强调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能不能够继续坚持下去，是全世界都十分关注的问题。

对此，邓小平不但给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反复交待，而且向来访的外国客人一再强调说明，以消除他们的怀疑和担忧。

邓小平请来访的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相信，中国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

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邓小平对尼克松说，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谁也不能阻挡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不搞改革开放就不能继续发展，经济要滑坡。走回头路，人民生活要下降。改革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邓小平说：不管我在不在，不管我是否担任职务，十年来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绝对不会改变。我相信我的同事们会这样做。

邓小平说的“我的同事们”，主要就是指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这说明邓小平对第三代领导集体寄予期望，相信他们“绝对不会改变”由他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同时，邓小平也告诫说，改革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邓小平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但江泽民他们“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

2. 总设计师传道授业

话中，邓小平在工作方面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许多要求和建议：第一，眼界和胸襟要非常宽阔，要着眼于长远和全局。

邓小平说，我们组成的这个新的领导机构，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对我们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进入新的政治局、书记处特别是常委会的人，要从改革开放这个角度来眩现在我们起用人，要抛弃一切成见，寻找人民相信是坚持改革路线的人。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择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

邓小平诚恳地希望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选人的问题上，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要用政治家的风度来处理这个问题。邓小平强调，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

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

邓小平指出，我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关键是这个问题。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

关于工作方法，邓小平提出：属于政策、方针的重大问题，国务院也好，全国人大也好，其他方面也好，都要由党员负责干部提到党中央常委会讨论，讨论决定之后再去多方商量，贯彻执行。

第二，中央要有权威，稳定压倒一切。

邓小平认为，陈云批评“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的意见是对的，并提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邓小平对江泽民、李鹏等中央常委说，中央的话不听，国务院的话不听，这不行。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否则至少要耽误时间。邓小平向中央常委进言，对于不听中央、国务院的话的，处理要坚决，可以先打招呼，不行就调人换头头。

邓小平指出，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邓小平认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

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邓小平说，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只要有利于中国稳定的就是好事。

第三，清理和改正过去的失误，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以取信于民。

1989 年政治风波的发生，促使了邓小平的深思。他感到“我们确实有些事情要向人民作出交代”。鉴于当时局势尚不很平静，要统统抓、全面抓各方面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尤其不适宜开展一个什么理论问题的讨论。因此，邓小平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指出，当务之急，是需要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同时要赶快注意那些对我们前进不利的事情。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要更大胆地改革开放。邓小平对李鹏、姚依林交待：新的领导机构应该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给大家看。邓小平对他们说，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要再造几个“香港”，要比过去更开放，改革开放要更大胆一些。邓小平在 1989 年 6 月跟中央政治局常委等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又提出，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有点勇气。

要多做几件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情。他说，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

二是抓紧惩治腐败。在 1989 年政治风波中，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没有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号，口号比较集中的是反对腐败。这种情况说明，广大群众对腐败是极为不满的。

基于这种现实，邓小平深切感到，如果“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为此，他要求新的领导集体首先要抓惩治腐败这个问题，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他说，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一定要取信于民。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邓小平请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门议一下惩治腐败的问题。他还要求政治局常委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

邓小平认为，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确，更能获得人心。

第四，抓住机遇，解决发展问题。

经济建设是全党工作的重心，自然也是邓小平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着重交待的一个关键问题。邓小平提出“经济不能滑坡”。

他说，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看准了的，积极方面的，有利于发展事业的，抓着就可以干。要在今后的十一年半中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发展速度。如果再翻一番，没有水分的翻一番，那时候人民就会看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兴旺发达的。邓小平担心经济滑坡，要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提出要力争在治理整顿中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确实保证这十年再翻一番。邓小平认为，只靠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稳定的政治环境还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

如何才能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呢？邓小平提出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他指出，机会要

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交待了他的几点意见和看法：一是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资本主义也搞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二是改革开放不要怕冒一点风险；三是沿海如何帮助内地是一个大问题，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四是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邓小平向中央一些负责人强调指出，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翻两番能不能实现，是个大问题。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至少十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

第五，总结经验，使用人才。

1991年8月20日，邓小平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正式向中央提出两点建议：一个是总结经验，一个是使用人才。

1991年我国还正在进行治理整顿，经济形势已经有了较明显的好转。当时中央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面临一个重点是放在“稳”还是放在“改革开放”上的问题。邓小平向一些中央负责人明确表示，我看重点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他提醒中央负责人要特别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邓小平认为，重点放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上，并不是不要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说，老祖宗不能丢啊！

邓小平认为，除总结经验外，还有一个发现和使用人才的问题。他说，的确是人才难得啊！我们现在不是人才多了，而是真正的人才没有很好地发现，发现了没有果断地起用。总的看，我们对使用人才的问题重视不够。邓小平建议中央总结一下用人的问题，尊重人才，广开进贤之路。

3.对国际风云变幻，不信邪，不要乱，不当头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国内发生政治风波。这对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邓小平以他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智慧，把握国际局势的脉搏，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指明了方向 and 对策。主要有四点：第一，冷静观察国际形势，善于把握有利机遇。

在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怎样看待国际形势？世界格局变化的趋向如何？对此，国际上议论纷纷。国内也有各种意见，有的甚至对我们在此之前对国际问题的一些正确看法也产生了怀疑。

邓小平针对上述情况，指出：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小的战争不可避免，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对一些中央负责人说：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

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

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第二，捍卫独立自主原则，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1989 年政治风波后，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同时还使用政治手段向中国施加压力。面对西方强权政治，中国怎么办？邓小平于 1989 年 9 月 4 日在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商量他退休的时间和方式时，向他们指出：“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他对常委们说，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1989 年 6 月 16 日，邓小平同一些中央负责人谈话中也指出，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

在 1989 年、1990 年，邓小平多次会见来访的外国客人。在同他们的谈话中，邓小平谈得最多的就是国家的自主和安全问题。

邓小平强调，中国人吓不倒。国家的主权、安全问题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

第三，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

1989 年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相继发生政治动乱，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这对继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冲击。当时，一些西方国家兴高采烈，国内一些人士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甚为担忧。

在这种严峻局势面前，邓小平向中央负责同志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邓小平认为，“唯一的办法是我们自己不乱”。他强调说：“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他还指出，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要充满信心。

第四，在国际事务中，中国绝不当头，但要有作为。

在国际局势大变动和形势变化莫测的情况下，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出来当头。对此，邓小平跟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成员明确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邓小平说，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邓小平又指出，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在原则立场上把握祝

三、姓“社”姓“资”之争

“左”这个东西中国人太熟悉了，有人变戏法地使它回到我们生活中，“左”的一个代表性观点，是“问一问姓‘社’至‘资’”。

1. 有人发出姓“资”姓“社”的诘难

1989 年 6 月江泽民当选为总书记时，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都是严峻的。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反腐倡廉，加强党的建设，稳定了国内局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十三届八中全会再次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稳定了农村。到 1992 年，连续三年的治理整顿结束。治理整顿克服了通货膨胀，整顿了经济秩序，取得了成绩。

问题在于，有些人却在 1989 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1990 年东欧剧变、1991 年苏联解体的情况下，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左”的思想案臼，离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基本点。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认为 1989 年的政治风波，说明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十年来的主要失误不仅是“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对党的指导思想也要重新评价，包括对毛泽东晚年思想也要重新评价，过去是否定得多了，肯定得少了；“两个基本点”应该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纲”，改革开放是目；多年来反自由化成效不大，不仅是由于某些领导旗帜不鲜明，同情和支持一些搞自由化的人和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领域里面没有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认为经济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主要危险”，认为许多改革的是“私有制潜行”，对外开放是发展资本主义，至少是在使中国变成人家的“倾销商品的殖民地”，等等，不一而足，出现了一种“左”的思潮“珠胎暗结”的现象。在许多地方实际上是在总结 1989 年政治风波的教训的幌子，行算改革开放的账之实，深化改革步履维艰，一些改革开放的弄潮儿甚至在挨整。

“左”的一个代表性观点，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在这里，表面上是问句，实际上已经有了答案，这就是：改革开放姓“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公开反对这一方针是很困难的，于是绕了个弯，在怎样改上作文章。

在字面上，他不否定改革这两个字，但你一改，他就说你这是搞资本主义，结果还是改不了。

2. 1991 年，邓小平在上海发布春的消息

1991 年 2 月 15 日头版头条：吉祥的羊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等人今天与上海市党政军负责人、部分老同志和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迎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互致新春问候和良好祝愿。

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等陪同，与各方面人士见面。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身体健康，精神焕发。他们满面笑容地与大家亲切握手交谈，气氛热烈。邓小平高兴地说：“同志们新春好！借此机会向英雄的海上人民表示热烈的问候和节日的祝贺。”朱镕基说：“上海人民祝小平同志健康长寿。你们在上海过春节，是对上海人民的鼓舞。我们上海人民非常高兴。”杨尚昆说：“我向上海同志拜年。同时，我受江泽民总书记委托，代表他向上海人民拜年！”李先念也高兴地说：“谢谢各位来看望我们。应该是我们向你们拜年啦！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国家总的形势很好，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我送你们上海四句话：开发浦东，振兴浦西，实事求是，稳定前进。实事求是总是不错的。不能光稳步，还要前进。稳得多了，不动也不行。”在这里，“不能光稳步，还要前进。稳得多了，不动也不行”这几句话，是个很重要的信息，它代表了邓小平、

杨尚昆、李先念三位老一辈革命家在党的工作指导方面的一种意见，一种新的思考，一种适应变化了的情况而提出的战略指导上的调整，说明他们希望党的工作，应该在已经取得的“稳”的成绩的基础上，及时地转到更多地注重发展这方面来，加大“发展”的份量。这种“转换”的把握，是老一辈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经验的结晶，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所需要加强磨炼的地方。处在退休半退休状态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与站在第一线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这种“互补”机制的形成和运作，正是中国繁荣和发展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2月16日，《解放日报》继续报道杨尚昆在上海市委市政府春节联欢会上的讲话。这时正是羊年春节初一上午，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洋溢着祥和、欢乐的热烈气氛。展览中心上空飘荡着一只只巨型彩色气球，悬挂着的“春节愉快”、“吉祥如意”等条幅赫然入目。展览中心大厅内，舞台上一只羊年花篮在闪烁的彩灯映衬下显得特别醒目，沪东造船厂的锣鼓队，敲起了喜庆的锣鼓。舞台对面墙上巨大的上海市标上方，写着“振兴上海，开发浦东，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红色标语。杨尚昆在联欢会上又一次提出了加快发展步伐的问题。他说：“我希望今天上海的工作比去年做得还要好，加快浦东新区的开发和建设，使浦东的起步更快一些，更好一些，更大胆一些！”在“左”的暮气、寒冷与僵化之气开始有所抬头的时候，以上讲话是多么令人振奋的信息啊！更何况邓小平在与上海市党政领导人的谈话中还涉及了市场经济、姓“资”姓“社”和进一步解放思想这些更敏感、更尖锐的问题呢！邓小平在上海讲话中说：“不要认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在讲话中针对当时“左”的思潮抬头阻碍经济发展的情况，要求上海市：“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3.《解放日报》的羊年四论

上海党政领导有幸率先亲耳聆听到了从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那里发出来的春的信息，其激动、兴奋、跃跃欲试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他们急于把这春的信息、把真理的声音传达给上海人民，变成上海加快发展步伐的物质力量，传达给全国的人民，让改革开放的新潮早一点再度涌起。

《解放日报》，从1991年2月15日开始，以皇甫平的笔名，连续发表了四篇评论，宣传邓小平讲话的精神。这就是很有名气的《解放日报》的“羊年四论”——2月15日，《解放日报》羊年一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评论指出：从辛未羊年开始，今后的十年，是中国历史的关键十年，也是振兴上海的关键的十年。十年看头年，辛未羊年，对于上海来说，应当是一个“改革年”。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证明，“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改革开放是我们须臾不可分离的法宝，改革开放是上海摆脱困境，求得振兴的唯一出路。在这个历史性的“改革年”中，我们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以改革开放贯穿全年，总揽全局，建立与国际性经济中心城市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格局。

“莺啼燕语报新年”，愿辛未羊年以名副其实的“改革年”而载入史册！

3月2日，《解放日报》羊年二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评论集中

论述了深化改革要更大胆地解放思想，要有新思路的主题，并点明了邓小平关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思想观点。评论指出：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人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常我们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等同起来，一讲市场调节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不能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在利用外资问题上，谨小慎微，顾虑重重；不能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对有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改革，不敢坚持和完善，甚至动尧走回头路；不能把持续稳定发展经济、不急于求成同紧迫感对立起来，工作松懈，可以办的事情也不去办。总之，进一步解放思想，是保证我们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

3月22日，《解放日报》羊年三论，题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结合对外开放的问题进一步阐述了改革开放不能囿于姓“资”姓“社”的思想。评论指出：90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这对于我们的开放意识，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又如允许外国人在浦东设银行，并且在外滩建金融街，以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之雄风，对于这类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如果我们还是陷在“新上海还是旧上海”的迷惘之中，那也只能越超不前，难成大事。

肩负着“振兴上海，开发浦东，服务全国，面向世界”重任的我们这一代上海人，要以强烈的开放意识，写下上海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4月12日，《解放日报》羊年四论，题为《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实际上论述了次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关于“关键在于人”的思想观点。评论指出：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开创90年代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必须不失时机地培养、选择和任用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这将从组织上保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绿树常青。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培养、发现和任用成千上万90年代的中青年干部，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和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

看一个干部是否德才兼备，归根到底是看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实际贡献。

进一步培养和造就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干部队伍，对于上海来说，十分紧迫。

要选好用好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首先要大胆。其次是要广泛，要不拘一格用人才。

选准选好干部还要发扬民主。“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宏伟壮丽的事业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后辈人将踩在前辈为他们架设的“人梯”上，一步一步去建造社会主义的“通天塔”。

4. “羊年四论”挨批

《解放日报》的羊年四论得到广大思想理论界的欢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特别是其中论及“市场经济”问题的那一篇，更为人们所称道，所关注。在当时“左”的思想似乎有点微邪气候”的情况下，这篇论及“市场经济”的评论，一时成为人们公开、私下议论的中心。在这种思想观点的鼓舞下，要求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呼声又有所高涨，有的发表文章宣布“商品经济”的改革思路，有的发表讲话呼吁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牛鼻子”，不进一步解放思想，就不足以打破新的思想僵化，进一步深化改革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甚至还会出现倒退。这种要求发动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呼吁，就是对邓小平 1991 年春节的上海讲话及《解放日报》“羊年四论”的呼应。

与此同时，带有新的僵化思想的人也嗅到了《解放日报》羊年四论的异味，并公然兴起了笔伐之师，而且特别将口舌利剑挥向四论中讲“市场经济”的那一篇。

有全国性影响的报刊发表文章，竭力为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观点辩护，认为不这样就会“解除人们的武装，模糊和混淆两种改革的界限，为自由化的改革观泛滥打开方便之门，以至于把改革引向邪路。”平心而论，在抽象的意义上讲，问一问姓“资”姓“社”并没有完全错。问题在于：其一是这些人所主张的是离开发展生产力的标准去问姓“资”姓“社”的问题，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而不怕贫穷落后多了，显然，这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其二，这些人凡事都要问一问姓“资”姓“社”，实质是新“凡是派”。如果按照他们的主张，凡是改革开放的措施，不管它对发展生产力有多大作用，都首先要问清姓“资”还是姓“社”，那实际上就是不允许试验，不允许探索。例如，他们批“市场经济”，批股份制的态度，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根据他头脑中的那个社会主义的教条，把市场经济说成是资本主义专有的东西，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才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计划经济”。并且断言：计划经济是与市场经济对立的一种经济制度。有的人把计划经济仅仅理解为一种运行机制，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和肤浅的。

有的报纸发表文章提出：“只有在一定范围内运用这些手段，它们才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1991 年，北京某杂志第 2 期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

文章说：“在自由化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一个时髦口号，叫作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某刊物 1991 年第 7 期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一文。文章说：“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某刊物 1991 年第 3 期发表《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一文，说：“实行改革开放要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看来，‘姓社还是姓资’究竟该不该问，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现实问题。”“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中，把‘改革’当作‘改向’、‘改道’，借改革之名，行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实，不只是一种思潮或理论主张，而且是一种实际行动，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对于那种不许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这些言论，不但造成了理论的混乱，而且给广大干部和从事经济工作的人造成了压力和困惑，延误了改革开放的步伐。

再看市场经济。尽管从 1979 年到 1990 年，邓小平先后在 10 次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尽管人人皆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扩大市场取向的改革，而且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有些人还是极力阻挠，反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0 年 12 月 17 日，北京某报发表文章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1991 年 3 月 15 日，北京某报发表文章说：“有些人总是……对计划经济任意加以否定，……市场经济原则很难真正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我国 40 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说明了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与此同时，有的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我们现在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说当前中国的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

还有人说，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有的人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有合理成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论点是对的。

这些，正是新的思想僵化！

中国的改革开放又一次面临着“左”的阻碍，又一次期待着新的突破，期待着新的思想动力。

四、走一路，看一路，讲一路

邓小平退休的第二天，基辛格就预言：邓小平还会对中国的未来有重大作用；邓小平南方谈话，金庸称：“一言足以法百年”。

1. 基辛格博士的预言

邓小平退休了，但他仍关注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世界也仍然关注他，来中国访问的老朋友们都希望能见到他。邓小平也借会见外宾的机会，宣布告别政治生涯，并向世界继续阐发和宣传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退休后，邓小平接见的第一个外宾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

11 月 10 日，也就是邓小平退休的第二天，他对来访的基辛格说：“博士，你好！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基辛格说：“我昨天听到了消息，但你始终有很大的影响力。”邓小平说：“你不反对吧？”基辛格答道：“我赞成”。

邓小平接着说：“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放心。”基辛格说：“我相信，你在中国的未来也将起重大的作用，正像你过去起的作用一样。”邓小平说：“因为我还是中国公民，也还是共产党的党员。公民有权利和义务，党员也有权利和义务。我的作用就是一个普通公民、一个普通党员，在需要的时候起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两方

面的作用。”

2. 从北方吹来的春风

1992 年 1 月，又是一个东风送暖、满园春色的季节，邓小平风尘仆仆地来到深圳经济特区。这是继 1984 年之后他第二次到深圳。

19 日上午 8 时许，邓小平偕夫人卓琳和家人及工作人员一行乘坐的专列徐徐驶入深圳火车站。88 岁高龄的邓小平在省市领导人的迎接下稳步走下火车，精神矍铄不减当年。

进迎宾馆桂园小憩时，深圳市负责人考虑到他旅途劳顿，建议他先休息，邓小平却急切而又深情地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

八年前，邓小平也是在这里下榻的，八年过去，又是处处新颜，使他异常兴奋。散步间，当女儿邓楠提起八年前为深圳题词一事时，邓小平一下子就记起来了。于是，他一字一句地念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一个字也没有错，也不会错。因为它凝结着邓小平的心血，是对建立特区的深刻总结。

八年前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后，深圳人民在他的题词精神鼓舞下，在党中央进一步扩大开放战略思想的引导下，更加奋力拼搏、敢闯敢试，创造了令人刮目的“深圳速度”。深圳特区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递增 47.8% 的高速向前发展，各项事业和城市面貌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变化。经过 11 年的辛勤努力。昔日的边陲小镇，今天已举世闻名，展现出现代化大都市的繁荣景象。

八年间，邓小平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深圳特区的发展变化。

1985 年 8 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会说：我们特区的经济从内向转到外向，现在还是刚起步，所以能出口的好的产品还不多，只要深圳还没有做到这一步，它的关就还没有过，还不能证明它的发展是很健康的。不过听说这方面有了一点进步。这里，邓小平及时地为深圳的经济发展指明了一个由内向型转到外向型的前进方向。

1987 年 6 月 12 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又一次高兴地谈到：三年前，我去过一次深圳。那里确实是一派兴旺气象。

他们让我题词，我题了。如今，他们搞了 7、8 年了，取得了很大成绩。“深圳的同志告诉我，那里的工业产品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口，外汇收支可以平衡。现在我可以大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这是邓小平继 1984 年为深圳题词后，又一次对深圳特区发展经验所作的评价和肯定。

“深圳速度”正是在邓小平的直接关怀和鼓励下创造出来的。

然而，道路总是曲折的。当历史进程到了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深圳经济发展的脚步显得沉重起来。这时候，国内出了政治风波，国际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剧变。党内外一度出现凡事都要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的另一种“凡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人对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发生动摇，怀疑改革开放的言论有所抬头。这些“左”的和右的思想，从不同方面阻碍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影响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前程。深圳又一次遇到了无形的压力。人们默默地盼望着邓小平的再一次出现，为深圳特区、为改革开放撑腰、掌舵、领航。

今天，邓小平终于被盼来了。深圳人民喜气洋洋地迎来了又一个改革开放的春天。

3、特区姓“社”不姓“资”

当天，邓小平一行在深圳市迎宾馆稍事休息，便开始了他视察深圳序幕——参观市容。

邓小平与陪同的省市负责人谢非、李灏等乘坐的车子在市区缓缓前行。八年前，这里到处是工棚和工地，到处是机、车的轰隆声，到处是一片繁忙景象。如今，呈现在眼前的已是一座现代化城市，三四十米宽的街道纵横交错，100多幢20至50层的高楼鳞次栉比，街道两旁及中间绿化带上的鲜花和绿树，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好像在向远方来的贵宾点头致意。邓小平看到这一切，高兴地对陪同人员说：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

邓小平边观光市容，边同省市负责人亲切交谈。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交谈一开始，邓小平就一语破的，将多年来一直困扰、束缚人们思想，近年来又争论不休的问题点穿说透，令省市领导人振奋不已。

邓小平继续说：从深圳的情况来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

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接着，邓小平对开放问题作了十分精辟的阐述。他说：对外开放，不仅要大胆吸收外国资金，还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当谈到深圳的发展前景时，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广东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谈话间，皇岗口岸到了。邓小平走下车，站在深圳河大桥桥头，深情地眺望着对岸。然后回眸桥头这边的村庄，问站在身旁的边检站站长：“这是什么地方？”边检站长口答道：“是渔农村。”邓小平说：“渔民村我去过。”有人给邓小平解释道：“是渔农村，不是渔民村。”邓小平点了点头。

在大桥上，邓小平还听取了边检站长关于口岸规模、现状的简要汇报。现在这个口岸是亚洲最大的陆路口岸，占地1万平方公里，有180条通道，一天的最高流量可达5万车、人次。它正在为深圳特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进一步拓展对外贸易，扩大经济技术交流，促进经济全面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4、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1月20日上午9时35分，邓小平在盛市负责人陪同下，来到国贸大厦，

登上 53 层的旋转餐厅。八年前，大厦还在建设之中。

今天，当邓小平站在大厅俯瞰市容的时候，不禁为这被人们誉为“一夜城”（意指建设速度很快——笔者）的雄伟壮观和清新气息感到喜悦和欣慰。

邓小平坐下来后，一边看“深圳特区总体规划图”，一边听取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的汇报：八年来，深圳人民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经济建设发展很快，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汇报结束后，邓小平作了大约 30 分钟的讲话。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讲这些话时，邓小平的声音特别宏亮，语气特别凝重，表情特别严肃，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放射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光芒。在座的盛市负责人认真地听着、记着。邓小平继续说：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

这天，邓小平谈兴甚浓，常寓深奥的哲理于朴素的语言之中。

在他批评会议太多，文章太长，强调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时，他指着窗外的一片高楼大厦说：深圳发展得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谈话中，他还严肃地告诫人们：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埃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在邓小平讲的 30 分钟里，旋转大厅一片寂静。邓小平简洁明快而又内容丰富、意义深远的话语，使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深受教育和鼓舞。

邓小平谈话结束，乘电梯下到大厦一楼时，正等候、云集在一楼到三楼围观台上的群众热烈鼓掌致敬，并情不自禁地高声喊道：“小平您好！”“小平您好！”掌声阵阵，一片欢腾。邓小平满面笑容地向欢腾的群众频频招手致意。

离开国贸大厦，邓小平一行驱车来到位于八卦岭工业区的深飞激光公司视察，听了公司董事长叶华明的汇报，还下车间参观考察，了解工厂的设备、产品和职工队伍建设等情况。当邓小平从贵宾厅走向激光唱视盘生产车间经过 30 米长的露天过道时，受到等候在过道两侧的许多职工、干部的热烈欢迎，阵阵掌声、张张笑脸迎向邓小平。

深飞激光公司是由深圳市先科激光公司与荷兰飞利浦公司于 1988 年 7 月合资兴办的一家高科技企业，主要生产激光唱盘、视盘和放送机，1991 年 10 月 21 日正式投产，1992 年生产总值为 4000 万元。它的建成投产，使中国成为继荷兰、日本、美国之后第四个能生产激光唱视盘的国家。

5. 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1 月 21 日上午 9 时 50 分，当邓小平出现在“中国民俗文化村”大门场时，广场上欢声雷动，鼓乐喧天，身着少数民族服饰的少男少女们，载歌

载舞，像迎接亲人一样欢迎邓小平的到来。

邓小平在民俗文化村尽情地观赏了各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民族歌舞和民族建筑等。

接着，邓小平一行来到“锦绣中华”微缩景区。这是由一批著名建筑、园林艺术家，经过数年辛勤努力创造的反映伟大祖国锦绣河山和名胜古迹的微缩建筑群，是深圳也是当时国内唯一的融现代艺术与古典艺术于一体的微缩景区。

邓小平一行兴致勃勃地乘着电瓶车游览了各“名胜古迹”。在“天安门”前，邓小平特意走下电瓶车，细心地观赏“故宫”。在“布达拉宫”前，邓小平感慨地对女儿和陪同人员说：看来这辈子我是去不了西藏了，就在这座“布达拉宫”前照张相，合个影权作纪念吧。说完，即与家人、陪同人员合影留念。

人们不会忘记，1984年邓小平到南方视察深圳期间，他没有涉足任何旅游景区，也没有休息过一个白昼。80高龄了，仍然脚步匆匆，为中国人民苦苦求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今天，邓小平有看似有闲实未闲的时间走走、看看了。可是，中华还未腾飞，中国还不富强，眼前还有不少正待解决的问题需要他去回答、去释疑，老人的心又怎能闲得了呢？在回迎宾馆的路上，邓小平又和陪同的盛市负责人就人们关心的社会主义旗帜——共同富裕的问题谈开了。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构想出自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特点和目的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人民生活长期未得到应有改善的深切焦虑。邓小平早在70年代末就毅然决然地提出，把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在1982年9月与外宾交谈中，曾指出：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正是由于实行了这样的战略转移，才有十几年来我国城乡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才使我们真正走上了逐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接着，邓小平就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消除两极分化，如何发挥贫困地区的优势、帮助贫困地区富裕起来等问题作了具体的阐述。

车，在路上颠簸、奔驰，但却丝毫也没有影响这位年近九旬老人的思绪和谈话。最后，邓小平充满信心地说：“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6.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1月22日上午9时45分，邓小平在盛市负责人陪同下，和家人一起来到深圳市仙湖植物园。

先到这里的国家主席杨尚昆迎上来和邓小平热烈握手，互致问候，一起步入展览厅，观看仙湖植物园模型。邓小平听了关于植物园的情况介绍后说：“植物园大有作为。”杨尚昆是1月21日到深圳视察的。邓小平、杨尚昆都是四川人，又都是20年代初入党的。几十年来同风雨，共患难。如今，

两位老战友在鹏城相会，分外高兴，分外亲切。

“我们在一起几十年了！”邓小平深情地说。“我们是 1932 年认识的。”杨尚昆说着扳着指数起来：“42、52、62……60 年了。”接着，两位老人在室内观赏植物区，边走边看这里栽培的珍稀植物。邓小平一行从距今一亿五千万年的恐龙时代的树种——水杉；从“发财树”、“光棍树”、“湘妃竹”，谈到四川成都的红竹、黑竹、紫竹；从抚摸“大鹅绒竹芋”的叶子到赞美“跳舞兰”优美的舞姿，大家均津津乐道，笑语连连，真有点置身于大自然情怀之中了。

从观赏植物区出来，他们向三面环山、濒临仙湖、绿草如茵的大草坪走去。邓小平、杨尚昆都乐悠悠地在一片茂林修竹之前，同家人合影留念。

邓小平说：这里环境真优美！

杨尚昆说：真是天上人间，世外桃源！

10 时 10 分，两位老人及邓小平三代人，在紧靠湖水 18 米的地方，种下了一棵长青树——高山榕。接着，杨尚昆领着自己家人在距离邓小平种下的高山榕 50 米的地方，种下了另一棵高山榕。两棵长青树朝夕相处、互相映衬，表达了这两位老战友的情谊，也表达了两位老人对“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事业的企盼和执著的追求。

下午 3 时 10 分，邓小平、杨尚昆在市迎宾馆桂园接见深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的负责人，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和合影留念。

邓小平继续围绕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问题，谈了许多新的精辟的见解。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是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生产力最终决定和推动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我们要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判断社会制度，乃至社会行为是否优越和正确的最根本的标准。

在谈到进一步改革开放问题时，邓小平还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

这是邓小平对深圳经验的又一次充分肯定。

最后，邓小平回答人们对改革开放有疑虑的一些具体问题时，意味深长地指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容人，求实，大度！一代伟人的风范。

7、你们要搞快一点

1 月 23 日，邓小平就要结束在深圳的视察了。上午 8 时 30 分，邓小平跟部分布负责人在迎宾馆握手告别后，驱车前往蛇口工业区。在车上，邓小平听完李灏关于深圳近期改革开放举措的汇报后说：我都赞成，大胆地干。每年领导层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

不断总结经验，至少不会犯大错误。

李灏说：我们要争取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

邓小平说：我刚才说，第一条是不要怕犯错误，第二条是发现错误赶快改正。

谈话间，车子到南山区蛇口工业区。李灏说：南山的荔枝是全世界最好的荔枝之一。

邓榕插话道：那么，全世界的柚子哪儿最好呢？话音刚落，车子里发出一阵笑声。

原来，每年柚子成熟时，邓小平都夸四川家乡的柚子最好。但是，儿女们却认为广西的沙田柚才最好。

邓小平说：四川的柚子最好，但认识统一不起来。说完，大家又乐了起来。

车子在赤湾港码头缓缓而行。不一会，蛇口港码头到了。八年前，邓小平是在这里走上军舰，离开深圳的。今天，他又要从这里离开深圳了。深圳人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目送邓小平离去。

邓小平先同前来迎接的珠海市领导握手，然后同深圳市领导一一握手话别，向码头走去。可是，他刚迈出几步，突然又转回身来，对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李灏大声回答道：“我们一定搞快一点！”这时，邓小平放心地转回身，迈开步，朝船上走去。此刻，正是上午9时40分，金灿灿的阳光洒满波光粼粼的深圳湾海面，邓小平乘坐的902快艇离开蛇口港，向珠海经济特区驶去。

深圳市委副书记厉有为代表深圳人民随船送邓小平到珠海经济特区，表达深圳人民无比热爱、无限崇敬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深情厚意。

8. 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1992年1月23日上午，风和日丽，辽阔的珠江口微波荡漾。

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经济特区的倡导者邓小平结束了在深圳的考察，登上了海关快艇，启程前来珠海。

专程前往迎接的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和市委副书记黄静一见到小平同志，就激动地握着他老人家的手说：“我们盼您盼了很久啦！珠海人良盼了您很久啦！”邓小平微笑着说：“我也希望来看看。”快艇劈波斩浪，在浩瀚的伶仃洋划出一道浪花飞溅的银练。

在船舱中，邓小平坐下后，陪同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便打开了广东省地图。邓小平戴上老花镜，一边看地图，一边听谢非和梁广大汇报改革开放和试办特区政策给广东和珠海带来的可喜变化。

1984年1月，邓小平曾来广东和珠海视察。当时，全国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刚开始，经济特区才起步。如今，南粤大地已旧貌换新颜。深圳、珠江三角洲同样以现代中国经济最活跃、最富裕的地区之一而名扬中外，粤西、粤北地区和经济比较落后的山区，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奋起直追。一个从沿海向内陆山区递进的全方位开放架构已经形成，由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已成为南粤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趋势。

谢非汇报说，广东按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划分为三个“世界”。

“第一世界”指经济发展比较快的珠江三角洲，“第二世界”指发展中的粤东、粤西平原地区，“第三世界”指大片山区。广东正努力缩小贫富地区差距，力争在下世纪初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邓小平说：“要得。”在听完谢非、梁广大的汇报后，邓小平谈起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的改革和经济特区的创办，再次强调要争取时间，抓住机遇，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提醒我们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在快艇上的谈话中，邓小平思维敏捷，思路清晰，就如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快艇已经接近珠海市九洲港，邓小平站起来，望着窗外烟波浩淼的伶仃洋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就是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9. 你们这里是很好的社会主义

1月27日上午，邓小平和杨尚昆、叶选平一起，来到内联企业江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这天，激动得彻夜未眠的公司副总经理丁钦元，一大早便来到工厂。一路上他还在想着该如何向邓小平汇报“江海”7年的发展历程。清晨出门时，他没忘记把家里最上等的优质龙井茶带上，准备给邓小平品尝。

上午10时15分，邓小平来到了江海公司。邓小平下车后，首先与先行到达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以及广东省委副书记郭荣昌握手致意。

在公司的职工俱乐部里，邓小平、杨尚昆、叶选平等人听取了丁钦元的汇报。1984年7月，江海公司从旧仓库、旧石房开始了自己的建设事业。在不到8年的时间里，江海公司不仅全部收回当年的500万元投资，还向国家上缴了2900多万元的税利，并积累了2000多万元的家产。现在，他们的生产设备99%是国产的，而自己开发和生产的录音机机芯88%出口海外，仅去年就为国家创汇2600万美元。在艰苦的环境下，江海人以自己自觉、自立、自强的企业精神，培养和造就了一支过得硬的职工队伍。

邓小平听了十分高兴，并带头鼓掌，对丁钦元说：“你讲得很好，特别是不满足现在的状况。要日日新、月月新、年年新，不断地创造新的东西出来，才有竞争力。你们做的体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贡献，感谢你们和全体职工。”丁钦元说，我们就是按照您指引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干的。邓小平接着说道：“不是有人议论姓‘社’姓‘资’的问题吗？你们就是姓‘社’。”并回过头来对梁广大说：“你们这里就是姓‘社’嘛，你们这里是很好的社会主义！”随后，邓小平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机芯总装车间。路上他问丁钦元：“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丁钦元回答说：“60岁了。”邓小平风趣地说：“很年轻嘛。”一句话逗得在场的人都敞怀欢笑起来。

接着，邓小平告诉丁钦元：“1984 年我来过珠海。”丁钦元说：“那时还没江海公司呢，但您那时写下的‘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使我们很受鼓舞。我们是在您视察半年后来珠海创业的。”在厂区等候已久的“江海”部分员工终于迎来那难忘的幸福时刻。邓小平向他们走来，并对身旁的丁钦元说道：“这么多年轻人。”

我很高兴和年轻人在一起。”他又操着浓重而亲切的川音对大家说：“我们拉拉手吧，拉拉手。”他边和在场每一个职工握手，边说：“谢谢你们。”有些员工当场激动得热泪盈眶，尤其是那些被人们称为“打工仔”的职工，做梦都没有想到能和这位伟人握手。

在回住地的路上，邓小平对梁广大说：这个厂总体方向是正确的，方法也对。看得出来，他们是从艰苦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要发掘人才，你们做得对。要不断造就人才，一年 365 天，都要做这件事。只要有人才，就可以创造出技术，事业就兴旺。

10. 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

拱北，是珠海特区最早开发的地区，芳园大厦是这一带的最高建筑之一，距澳门咫尺之遥，登上大厦最高处的旋转餐厅，即可俯瞰新兴的经济特区和有 400 多年发展历史的澳门。1 月 25 日上午，邓小平视察了亚洲仿真公司后又驱车来到这里，并乘电梯上到 29 层的旋转餐厅。

邓小平一边观赏窗外的拱北新貌和澳门风光，一边兴致勃勃地听取谢非、梁广大的汇报，并亲切交谈。谢非说：“您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将变为现实。广东处在第一线，我们正在用自己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但这有个过程。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十多年的建设使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走下去。”邓小平沉思一阵后，说道：这十年真干了不少事。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谁反对改革开放谁就垮台。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不变。反对的人让他去睡觉好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很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政策变了。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在谈到改革开放珠海这个昔日边陲渔镇带来历史性的变迁时，梁广大汇报说，改革开放前，珠海不少人外流到香港、澳门。特区创办后，珠海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逐步过上了富裕日子，不少外流的珠海人也陆续回来了。邓小平说：“这好嘛。”30 分钟过去了，旋转餐厅转到了与澳门相对的地方。邓小平毫无倦意，他眺望着远处的海面，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正是从邓小平深邃的目光和深刻的阐述中，人们再一次深深领会到社会发展的不可抗拒的规律，坚信科学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坚信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

时间已是 11 点 35 分了，邓小平走进下行的电梯。邓榕对他说：“楼下有好多群众想见见您！”邓小平高兴地说：“好，我要去看看他们。”当他步出芳园大厦，出现在群众面前时，人们欢呼雀跃。

闻讯前来的群众多达几千人，他们大部分是珠海市民和来特区的“打工仔”、“打工妹”，也有来游览观光的游客，还有许多从澳门来拱北购物的港澳同胞。大家虽然素不相识，但一起自发地维持着秩序，又情不自禁地朝前拥着，挤着，想多看一眼这位伟人的风采。

邓小平面带微笑，稳步向人群走去。顿时，掌声雷动。不少人用普通话高呼：“小平同志，您好！”“邓爷爷，您好！”一位站在后面的 40 多岁男子，忘情地跳起来，用广东话喊道：“邓伯伯，您好！”邓小平向四面八方的群众依次挥手、点头。他看到了，看到了这些用双手在荒滩上盖起一砖一瓦的特区人的风貌、特区人的情感和特区人继续改革开放的信心。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珠海人民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邓小平所倡导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一系列决策是正确的，人民是衷心拥护的。今天，人民所得到的一切同改革开放紧密相连。人民对邓小平自然地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

11. 我的主要用处就是不动摇

邓小平在珠海的日子里，足迹几乎踏遍了特区的土地。他先后三次车专门考察珠海特区的城市建设，观看了拱北、吉大、香洲及唐家一带的市容。

他不停地考察，不停地倾听，不停地思考。考察特区的变化，倾听人民群众的心声，思考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

1 月 24 日上午，邓小平参观工厂后，乘车游览了吉大、香洲和唐家一带。一路上，邓小平仔细欣赏着这座海滨新城的绮丽风光，同时回忆起 1984 年 1 月来珠海市看到的情形。

当车经过宽阔的九洲大道中段时，邓小平指着一处地方说：“我记得以前这里有一座小桥，一条小路，现在没有了，变了。”车队在市区内前行，经过了一条又一条宽阔的大道，车窗外闪过了一幢又一幢风格清新的建筑。当汽车驶近珠海影剧院时，邓小平又指了窗外说：“我 1984 年来这里时，记得只有一座大房子，现在都盖上了新大楼了。变化真大呀！”参观过程中，梁广大汇报了珠海市严格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做法。当了解到珠海市政府为保护依山傍海的自然风光，严格限制建筑物高度时，邓小平赞同地点头说：“这样搞很漂亮，有自己的特点。”梁广大接着汇报说：“珠海的投资环境已吸引了很多外商前来投资，1991 年就签订了 500 多宗合同。”邓小平幽默地说：“要是我是外商的话，我也会来这里投资的。”随着老人家的话音，车内响起了一片笑声。

当梁广大汇报到去年珠海市工业总产值已突破百亿元时，邓小平满意地点了点头，说：“你们这个发展速度很快了。”梁广大说：“我们是按照您指引的改革开放道路走过来的。我们一定坚决把您的决策贯彻到底。”邓小平笑着说道：“我的决策还有一点用处，我的主要用处就是不动摇”1 月 25 日上午，邓小平离开芳园大厦后乘车前往珠海度假村。路上，当他看到一幢幢漂亮的居民和农渔民住宅时，不禁问道：“广东的农民收入多少？”谢非

回答说：“去年全省人均收入 1100 多元。”邓小平说：“我不止这个数。如果是这个收入，盖不了这么好的房子，买不起这么好、这么多的家当。这个算法不准确，有很多没有算进去。”

汽车经过景山路，一座座厂房从车窗外闪过，邓小平高兴地说：现在总的基础是不同了，我们 10 年前哪有这么多工厂？几个工厂都是中等的水平。现在大中型厂子里头的设备多好呀！过去我们搞“两弹”必需的设备 and 这些比，差得远呢，简单得很哪，不一样啦！由此，邓小平再次谈到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说：“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 1984 年至 1988 年。这 5 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那几年，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接着说道：“1989 年开始治理整顿。治理整顿，我是赞成的，而且确实需要。”

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但是怎样全面地来看那 5 年的加速发展？那 5 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怎样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那 5 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还是那 5 年加速发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算是一个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1992 年的 1 月，在珠海特区建设的发展史上，记下了最珍贵的难忘的 7 天。1 月 29 日上午，邓小平身着中山装，与国家主席杨尚昆一起，在广东省领导谢非、朱森林、郭荣昌等人的陪同下，接见了珠海市五套班子领导和专程前来看望邓小平的佛山、中山市委领导，与大家亲切握手，依依话别，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当日下午 2 时 40 分，邓小平乘车离开珠海，前往顺德县考察。

12. 等你们发展了再来

1992 年 1 月 30 日，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之后乘火车去上海，沿赣线从湖南进入江西境内。下午 3 时 40 分，火车徐徐进入鹰潭车站。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省长吴官正正在这里迎候。

邓小平走下车来，满面笑容地和毛致用、吴官正等一一握手。

88 岁高龄的邓小平，身体健康，精神饱满，步履稳健他一边沿着月台缓步，一边亲切地和毛致用、吴官正谈话。

毛致用在湖南工作期间，曾先后两次接待过赴湘视察的邓小平，并陪同至韶山等地参观，所以很熟悉。邓小平一见到毛致用就关心地问：“你来江西几年了？”毛致用说：“快四年了。”邓小平对吴官正也熟悉，他对吴官正说：“你是从武汉来的。”

来几年了？”吴官正答：“五年多了。”江西是农业大省，邓小平十分关注江西的农业发展。他问：“江西去年的年景怎么样？”毛致用说：“年景还好。1991 年农业全面丰收，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5.5%，工业总产值

增长 14%，财政收入增长 10.3%，实现收支平衡。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702 元。

改革的步子是这些年来迈得最大的一年。”邓小平听了很满意，连声赞许说：“那好。”他对农民增收感到欣慰，说：“农民收入 702 元，那不简单。”接着，邓小平又问：“去年遭灾了没有？”毛致用回答：“遭受到比较严重的旱灾，但农民积极性高，所以仍是一个丰收年。”吴官正说：“现在的问题是粮食压库严重，库存有 180 亿斤，其中在库外露天堆放的有 40 亿斤。”邓小平说，在粮食问题上，江西是作了贡献的。你们有困难可以向中央反映，你们有这个权利。对江西，中央要照顾一点。

邓小平的记忆力很强，念念不忘江西人民对国家作出的贡献。

在三年困难时期，江西人民节衣缩食，艰苦奋斗，调出大批粮食支援全国。1958—1959 年度外调了 9.5 亿斤大米，1959—1960 年度又调出 14 亿多斤大米，同时还补上库存 1.18 亿斤，是当时全国公认的两个增加库存的省份之一，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表扬。这次邓小平又旧事重提，说明党对作出了贡献的地区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江西广大农民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得到了实惠，看到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和巨大威力，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快速发展，连年丰收。但是，大发展也造成了新的困难：粮食库存增加，压库现象严重。邓小平对江西解决粮食压库问题的关心和支持，使在场的省委、省政府领导深受教育和鼓舞。

邓小平对江西的情况很了解，他指出，水旱灾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水土保持不好。

要坚持把植树造林搞好，否则没希望。他问：“你们植树造林怎么样？”吴官正说：“这几年我们每年造林 600 万亩左右，森林覆盖率达到 40.3%。”邓小平听了连连点头，说：“那好。”虽经长途乘车劳顿，邓小平却毫无倦意。他兴致勃勃地听取了毛致用关于江西在治理整顿期间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情况汇报，高兴地说，治理整顿这几年，改革开放做了不少事。他指出，没有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就不会有这么顺利。

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强调指出，稳定发展我赞成。但是，只要能快一点还是要争取快一点。胆子要更大一点，放得更开一点。不能胆子没有了，雄心壮志也没有了。有机遇能跳还是要跳。

这时邓楠插话说：“这个观点，老人家鼓吹了一路。”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快一点将经济建设搞上去，这是邓小平对江西和对全国的期望，也是时刻萦绕在他心头的一件大事。邓小平接过邓楠的话，问毛致用、吴官正，我说得对不对？毛致用说：“您讲的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搞快一点。”时间过得真快，邓小平在鹰潭火车站，一晃半个钟头就过去了。他没喝一口水，也没有坐下休息，在月台上时而信步，时而驻足，与毛致用、吴官正侃侃而谈。快分别时，毛致用、吴官正依依不舍，对邓小平说：“我们大家都希望您老人家在江西住段时间。”是的，他们表达了深受其惠的江西人民对倡导改革开放政策的邓小平的爱戴和崇敬，表达了老表们对邓小平的爱戴和崇敬，表达了老表们的热切心愿和对邓小平的想念之情。

邓小平非常高兴，挥手打着招呼，满面笑容地说，等你们更发展了，再来麻烦你们。

随后，他和毛致用、吴官正握手告别。列车一声长笛，驶出了鹰潭站，

向上海方向疾驰而去。

“等你们更发展了再来！”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江西人民的深情嘱托，他期望并相信江西这块红色的故土一定能够发展得快些、更快些！

送走邓小平后，毛致用、吴官正从鹰潭迅速赶回南昌，于2月2日召开省常委会，传达、学习邓小平路过鹰潭时所作的重要指示。常委们认真地领会邓小平谈话的精神，一致认为，邓小平的指示非常重要，非常及时，对我们继续全面准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加快兴赣富民的步伐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省委这次常委会，把邓小平重要谈话的精神和江西的实际相结合，归结为四句话：“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放得更开一点，发展更快一点”。这铿锵有力的“四个一点”，凝聚了邓小平对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人民的殷切期望，鼓舞着江西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去争取更大光荣。近几年江西迈出了大步伐，经济持续快速增长。1992年和1993年，全省国民生产总值分别比上年增长14.3%和17.4%，1994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18%。江西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奋力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

13. 资本主义东西到上海就姓社了

春节前的上海，洋溢着一派繁荣与欢乐的景象。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全国人民尊敬的邓小平在结束深圳、珠海等地的考察之后，来到了上海。

前往车站迎接的上海市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握着邓小平的手激动地说：上海人民欢迎您来过年，并指导上海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微笑着说，我来过年，要看看南浦大桥，看看上海的经济 development 情况。

这是邓小平自1985年以来第五次与上海人民一起欢度春节。

同前几次相比，今年春节在沪期间，邓小平情绪更高昂，活动更频繁，发表的讲话也较多。

2月3日，欢快、祥和的除夕之夜，邓小平与杨尚昆接见了上海市党政军负责人，并与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迎猴年新春佳节。

吴邦国、黄菊代表上海1300万人民向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拜年，祝他们新春快乐、健康长寿。邓小平、杨尚昆含笑说：向你们拜年！

向上海人民问好！

正月初四（2月7日），邓小平、杨尚昆来到了已经通车的南浦大桥。站在达50米高的桥面上，望着大桥雄姿，邓小平由衷地称赞说，南浦大桥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真伟大！

他指指大桥横梁上镶着的“南浦大桥”四个大字，说：看来我为大桥题的字，没有给大桥丢丑。一语惹起众人欢快的笑声。

随后，邓小平、杨尚昆又驱车来到正在建设的杨浦大桥工地，现场工人们热烈鼓掌，欢迎他来视察工作。邓小平听取了工程负责人的汇报，观看了大桥的模型，再三勉励大家要精心施工，把这座世界上同类型桥梁中最大的桥建设好。

2月8日晚上，邓小平、杨尚昆乘车观看了南京路夜景，并乘船游览了

黄浦江。近几年，南京东路商店的霓虹灯已贯穿全街，外滩建筑群装上了新型泛光灯。入夜，到处流光溢彩，美不胜收，呈现一派“不夜城”的气象。邓小平、杨尚昆兴奋地说，南京路和外滩大放光明，上海大有变化。

2月11日，中国和比利时合资的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迎来了邓小平、杨尚昆一行。看到从国外引进的先进设备已经在这里落户，并投入正常的运行，邓小平对陪同的上海市官员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这些设备原来姓“资”，现在到了这里就姓“社”，为社会主义服务。

2月12日上午，邓小平、杨尚昆先后视察了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上海县马桥乡旗忠村。在闵行开发区，总经理的汇报超过了预定的时间，随行人员怕邓小平过于劳累，听取汇报后就催他走。邓小平摇摇手，“我还有话要讲。”他对已经起身而坐下来的陪同人员说，到本世纪末，浦东和深圳等地都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

农村改革实践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开始有不同意见，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一，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现在工业、城市、科技等方面的改革如何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要用实践来回答。当闵行开发区的总经理告诉邓小平闵行开发区五年累计上缴的税金已经达到用于基础建设总投资的二点八倍时，邓小平说，你们的实践有点说服力，但还不够。现在，有人担心浦东开发出乱子。我想不出会出什么乱子，担心的人也讲不出什么乱子。

2月13日，邓小平、杨尚昆在住地听取了上海市的工作汇报。

邓小平在上海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作了许多重要讲话。他说，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上海民心比较顺，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上海一年就有很大的变化，三年会有更大的变化。

对于浦东建设，邓小平说，浦东开发晚了，这是我的失误。当时建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上、外资情况上考虑，没有考虑到人的因素。上海人聪明，你们失去了一次机遇。

吴邦国、黄菊向他汇报说，90年代是上海发展的一次机遇。

我们正根据您的意见，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抓紧工作。这时，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告诫说：这是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这个机遇你们不要放过。现在浦江的开发是只能进、不能退，而且你们也没有退路。浦东开发是晚了，这是件坏事，但是也是好事，你们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高一点，后来居上，我相信这一点。到1995年，浦东就会有大的变化，我还可以看得到。

2月18日（正月十五），中国人民传统的元宵节。晚上，邓小平神采奕奕，来到沉浸在节日气氛之中的上海第一百货商店。由于公务缠身，邓小平已有几十年没有上商店游览购物。今天，他兴致勃勃，健步行走在商店里，还为孙儿选购了两块橡皮和四支铅笔。

闻讯前来的群众尽管素不相识，但都自觉地维持秩序，并面对面排成两行。当邓小平微笑着稳步走来的时候，人们欢呼雀跃，热烈鼓掌，都为自己有幸目睹这位伟人的风采而高兴。不少人忘情地高呼：“小平同志，您好！”“邓爷爷，您好！”邓小平挥动右手向群众频频致意，还抱过一名小孩，亲热地吻了她的小脸蛋。事后，家人问邓小平在店里看到些什么，他幽默地说，

“我看到一片人噢！”面对创造着上海今天和明天的人民群众，老人家心中荡漾着无限的春意。

2月20日，邓小平带着上海人民对未来的信心，带着浦东开发的宏图离沪返京。

邓小平视察上海，使浦江两岸涌现一股澎湃的春潮。人们都在思考、探索和策划：如何抓住历史赋予的机遇奋起直追？失去这次机遇意味着衰弱，意味着沉沦。每一个有志气有抱负的上海人，都要用邓小平南巡讲话激发自己的历史责任感、时代紧迫感，谱写振兴上海、开发浦东的新篇章。上海人民盼望着邓小平明年再来作客。届时，他们将献上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新硕果。

14. 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

历时35天、行程6000多公里的南巡，邓小平正确分析了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又一次为改革开放航船拨正了航向。

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中，高瞻远瞩地指出社会主义要立于不败之地，首先要把国内经济建设搞好。及时提出我国经济加速发展的正确主张，争劝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

5月20日，视察首都钢铁公司时，邓小平更加关注“速度”问题。他在听取首钢搞活企业的汇报之后，对首钢和北京市委负责人说：“我们的发展速度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不能一样。因为起点不同，原来的水准不一样，综合力量不一样。”对于今年初制定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6%的指标，邓小平从中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出发，分析说：我们有些同志满足于6%，满足6%就等于第二个台阶要第一个台阶去补才补得上，迈第三步那就更艰难了。尖锐地指出：看样子，如果我们始终保持6%的速度，就是停顿，就是后退，不是前进，不是发展。

邓小平在首钢的这一重要谈话内容，引起了中南海决策层的高度重视。根据邓小平这一谈话精神，党的十四大报告对9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作出重要修改。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说：九十年代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原定为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现在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情况来看，可以更快一些。根据初步测算，增长8%到9%是可能的，我们应该向这个目标前进。

这不仅仅是个改革速度的问题，而且是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又一次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5. 不要争姓“资”姓“社”问题

巨人离去了，巨人的话语却萦绕于耳，巨人的形象仍历历在目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判断的标准，应该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常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这位永远站在时代最前列的历史巨人，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拧开了仿佛是“魔鬼之瓶”的瓶盖……邓小平南巡伊始，香港新闻界便先声夺人。1月22日，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就分别以《邓小平在深圳视察，对特区发表意见》和《邓小平游民俗村》为题，迅速报道邓小平南巡行踪和谈话，其后更不惜版面，以突出位置连续追踪报道。耐人寻味的是，《文汇报》和《大公报》一向被称为香港的左派报纸，与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关系非同一般。

西方记者的嗅觉也很灵敏，他们迅速准确地捕捉到了关于邓小平南巡这一重要消息。

美联社、法新社、安莎社……几乎世界上所有各大新闻社都播发了有关邓小平南巡的消息。

一位西方记者打趣道：看来明年美国《时代》周刊年度新闻人物的封面又被邓小平预订了。

国内的新闻媒介报道得较国外迟一些，但“火力则凶猛得多”。

人们传闻：有人问邓小平，改革胆子大一些，步子快一些，有人来查姓“社”姓“资”怎么办？邓小平说，你们怕这些，国家贫穷落后，你们怕不怕？邓小平南巡之始，可以说是一种半官方或非官方的行动，因为此时的邓小平，已不担任任何正式的职务。但真理最能征服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全国各族人民心目中是有份量的，邓小平的巨大影响还在。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提出的许多新思想、新观点尽管还没有正式的官方报道，但已经在人们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得风气之先的深圳人率先行动起来，根据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在神州的南方掀起了一股舆论冲击波。

《深圳特区报》从1992年2月20日到3月6日，连续发表八篇猴年新春评论，掀起了第一股冲击波。

《扭住中心不放松》是新春评论之一，它利用深圳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有力地论证了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题思想。

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路线不能变，也不会变，至少要管一百年。

一百年以后，再让世人看看深圳，看看中国吧！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和共同愿望，是由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是实现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所要求的，也是进一步打开外交局面和在国际上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所需要的。所有关心国家前途的人，都要十分关心经济建设。所有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从、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离开或干扰这个中心。

评论最后豪迈地提出：“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

猴年新春的评论之二，则全面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加快发展经济的新思想，其标题即是《要搞快一点》。

风云变幻，机遇与挑战并存。十多年改革开放，航道已经开通。形势的发展，要求深圳要搞快一点，要求中国发展更快一些。

就是说，改革开放的步伐要快一些，经济建设要上得快一些，经过若干年努力，带头将深圳建成社会主义的“香港”。

“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我们必须紧紧抓住难得的机遇，加快发展自己。

《要敢闯》是猴年新春评论之三。评论仍然以深圳的经验，论证了改革开放中要敢闯敢干的中心思想。

深圳的改革开放事业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果要问，这里有什么经验？一句话，那就是敢闯。

评论最后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号召：“闯，是人类进行曲的主旋律。前进的人们，闯吧！”1992年2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猴年新春评论之四——《多干实事》。

一个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言行之间，行重于言。深圳发展这么快，有了这么多高楼大厦，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而是靠实干干出来的。

评论的最后，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从第五篇评论开始，《深圳特区报》的文章开始更多地从全国的角度来看将进了一步改革开放的问题，从中华民族发展生存的高度来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有更深思想性和独到的见解。

《两只手都要硬》这篇评论，讨论了改革开放与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的辩证关系。一足步则不行，一手操则不坚。走路要两条腿，抓工作要两只手。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大业中，要一只手抓改革开放，一只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两只手都要硬。

《共产党能消灭腐败》则是针对那些对共产党搞好党风建设信心不足的人讲道理，坚定了人们对执政党的信心。

《稳定是大前提》，道尽稳定的大道理、小道理。

《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道出了深圳人民的心声，也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和共同意志。

《深圳特区报》的猴年新春八论刊出以后，激起了广泛的反响，受到各方面的关注。

人们纷纷猜测，打听八论的后面究竟有些什么样的背景。因为照常理，一个地方性的报纸，没有一定的支持，是不能也不敢发此宏论的。

正当人们议论纷纷，不得要领之际，另一颗重磅炸弹又在南国大地上轰鸣，将这股舆论的冲击推向高潮。《深圳特区报》的猴年新春八评的最后一篇于3月6日刊出。3月12日《深圳商报》开始刊登八论敢闯的第一篇《为进一步解放思想鸣炮》，这样的安排也许不是什么偶然的巧合。

八论敢闯围绕一个主题，从各个方面淋漓尽致地予以发挥，进一步将舆论引向改革开放、敢闯敢试的主题上去。

一论敢闯，从解放思想入手。认为，闯，必须以思想解放为先导。

二论敢闯，则对深圳的发展提出《快马再加鞭》的要求。

三论敢闯，火药味甚浓，涉及到“左”和右的敏感区域，标题道出了作者的鲜明态度倾向：《防右、更防“左”》。

四论敢闯，有了更多的理性成份，认为《实事求是贵在“敢”》。

五论敢闯，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即《敢用他山之石》，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

六论敢闯，提出了《险处敢登攀》的命题，认为，要改革，要探索，要力争经济建设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追赶发达国家，艰难险阻，都在意料之

中。前进中的人们面对前进中的艰险，只能发扬英雄的气魄——“越是艰险越向前”！我们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绝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而是一将功成万民乐。人民会支持我们。

七论敢闯，涉及的是如何去闯的问题。文章认为《胸怀大局才敢闯》。

八论敢闯，则提出深圳敢闯的目标是向香港学习，借鉴香港的经验，再造一个社会主义的香港。其标题就是《借鉴香港，互利共荣》，发表日期为4月3日。

经过深圳两家大报的舆论冲击，这股南国春潮终于北上，影响到全国的政治中枢——北京，再经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确认，迅速推广到全国各地，辐射到海外，形成了一股新的改革春潮。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会，完全同意邓小平南方谈话；江泽民为十四大政治报告确定指导思想；江泽民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市场经济终于为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了。

1.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20 世纪的帷幕即将徐徐落下，21 世纪的曙光已经照临地球的窗口。

这是机遇！

这是挑战！

难道我们还要丧失世纪末的最后一次民族自强的机遇吗？严峻的现实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1960 年，中国社会生产总值与日本大致相等；1985 年，中国社会生产总值只有日本的五分之一。

不需要太多的数字，这些数字已经足够了。相对世界的总体发展，对于我们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我们的速度太慢了。

怎么办？一位率先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的历史巨人，又一次吹响了加快改革开放的号角！

合众国际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中国使重振改革雄风的运动升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今天发出迄今措辞最有力、旨在重振经济改革雄风的公开号召，并严厉批评了抵制改革的做法。这是邓小平最近精心安排的一场运动的一次重大升级。

共同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中共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确认支持邓小平今年一月中旬视察南方时的一系列重要讲话。

路透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中共政治局决定坚持改革政策，一百年不变。……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说的“一个中心”指的是经济建设，反对把意识形态定为关键因素。

美联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官员支持邓小平发出的更大胆地进行经济改革的呼吁，同时警告要防止“左”的倾向。党的领导人发誓，改革政策一百年不动摇，这是党的中央政治局在 9 日和 10 日两天的全体会

议上作出的决定。这项决定似乎表明，邓小平在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取得了胜利。

外电的一系列报道都在表明，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是的，为了把邓小平的谈话精神变成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转变为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加快改革开放的实际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3月9日、10日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全体会议。

会议完全同意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会议认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们党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要勇于创新，勇于试验，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善于运用计划和市场手段，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各级领导要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腾出主要精力多办实事；进一步提高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坚持两手抓，以改革和建设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四大的胜利召开。

十四大就要召开了，十四大报告该怎么写？1992年2月，江泽民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为起草十四大报告确定了指导思想：报告通篇要体现邓小平今年年初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的精神，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思想。这就为十四大报告定下了基调。

2月20日下午，中南海勤政殿。一个研究十四大报告起草问题的座谈会正在这里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会上强调指出，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是他十多年来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贯思想的高度体现和新的发展，十四大报告要以这个谈话精神作为贯穿全篇的主线；在系统地总结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十四年来的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上，着重阐明为什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江泽民说，一个是基本路线不变，一个是社会政治稳定，有了这两条，我们就能够不断地胜利前进。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是100年不动摇江泽民提出了十四大报告的主要内容，必须回答以下的一些问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注意把握的要点是什么？党在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和建设的主要任务和战略步骤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今世界重大问题的看法是什么？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重点是什么？报告要展望并规划改革和建设在今后半个多世纪的进程目标，提出在建党一百周年时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建国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朝着这个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月3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报告第一稿进行了讨论。与会领导认为，第一稿从无到有，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但报告的理论性、思想性需要加强，对一些重大问题要进一步研究作出更明确更深刻的阐述，如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括，要提高层次；要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总结改革开放十四年的基本经验；要讲清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此后，报告有了第二稿，第三稿……6月9日，北京西郊颐和园，中共中央党校。江泽民召集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员和部分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授，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党校校长乔石主持。

出席会议的还有十四大报告起草小组负责人丁关根及报告其他起草人员。

在讲话中，江泽民就全面贯彻落实邓小平重要谈话的精神，阐述了九个方面的问题。

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等有关论述，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经验，江泽民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 2 月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讲话后，人们对市场和计划的问题，又提出一些新的说法，如：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三种提法，究竟哪一种最科学，哪一种更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哪一种更易为大家接受，一时间众说纷纭，见仁见智。

针对这三种提法，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说：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赞同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同志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

江泽民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我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江泽民认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为什么要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四个字呢？这不是给苹果贴商标，这不是说市场经济本身姓“社”，而是表明我们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大发明创造，专利属于中国共产党人，属于全中国人民。我们党把“市场经济”这个一向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专利的名词，写进自己的正式文件，这是我们思想上的又一次大解放，是经济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根据江泽民党校讲话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起草小组对报告稿进行了重要修改。

第四稿在提请政治局审议的同时，还报请邓小平审阅，邓小平对报告稿作了肯定的评价，认为报告稿有份量，同时对进一步修改好报告稿发表了十分重要的意见。他谈到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讲他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的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他的功劳就是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要写得合乎实际。

十四大报告的起草历时 7 个多月，其间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 4 次，政治局开会讨论了 2 次，江泽民与起草小组座谈 3 次。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一些领导人还个别同起草小组座谈 3 次。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一些领导人还个别同起草小组谈了重要意见。

7 月，起草小组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所提出的意见和邓小平的重要指示，对报告稿又作了两次重要修改，在报告中加进了邓小平关于要尊重群众在实践中的创造精神的论述。

报告第六稿出来后，中央决定印发到全国 119 个地方、部门和单位征求意见。党的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党的十四大代表，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人民团

体的党员负责干部，各盛自治区、直辖市和各个军区的党委负责同志等 3000 多人，参加了报告稿的讨论，每个单位都修改出一个稿子。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委托中央统战部征求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的意见。

在此期间，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和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发表了重要讲话。7 月 2 日，万里在人大常委会第 26 次会议闭会讲话中指出：摒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趋势。7 月 24 日，薄一波在“《半月谈》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奖”颁奖会上发表讲话，首先披露“小平同志在 1979 年就讲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他公开提出要搞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由之路。

9 月 2 日下午，中南海怀仁堂。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对党的十四大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十四大报告起草小组负责人丁关根，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温家宝，出席了座谈会。

乔石主持座谈会，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座谈中，贾亦斌、费孝通、雷洁琼、孙起孟、卢嘉锡等人畅所欲言，对十四大报告征求意见稿提出了各自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江泽民、乔石认真地记下了他们的意见，并对他们表示感谢。

同时，起草小组还征求了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和有关专家、学者对报告的意见。

根据各方面的意见，起草小组对报告征求意见稿作了 450 多处修改。其中对十三大以来五年的工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括、经济增长速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党的建设等部分，作了较大的调整、充实和加强。

经过多次反复征求意见，集思广益，仔细推敲，江泽民又一次次审阅修改，报告又写出了第七稿、第八稿。

9 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全体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修改后的报告稿，决定提请党的十三届九中全会审议。10 月 5 日，党的十三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拿到的报告已吸收了各方意见修改而成的第九稿。根据全会分组讨论中提出的意见，报告又大大小小修改了 170 多处。

最后，全会通过了这个报告，并提交十四大审议。

10 月 12 日，在党的十四大开幕式上，十易其稿的报告终于放在了近 200 位代表面前。

至此，2.6 万多字的报告，修改了 10 次，共修改了 620 多处。

2. 为市场经济大开绿灯

公元 1992 年 10 月 12 日，两亿美利坚合众国公民坐在电视机前准备赏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布什、佩罗的首次电视公开辩论。

当金发碧眼的人们厌倦了辩论赛在那种表面上唇枪舌剑其实无聊乏味

的吵闹时，他们是否发现，在大洋彼岸，在一个古老神秘的东方大国，十一亿人翘首以待的一次大会开幕了。

北京，人民大会堂。

身着黑色西服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面对近 2000 名中共十四大代表，面对全国人民，面对全世界，郑重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逐步摆脱这种观念，形成新的认识，对推动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今年年初重要谈话进一步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市场范围逐步扩大，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计划直接管理的领域显著缩小，市场对经济活动调节的作用大大增强，实践表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我国经济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加快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继续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

回顾了十多年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江泽民郑重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市场经济”千呼万唤，终于堂堂正正地载入了十四大报告，成为全党的共识。至此，一场旷日持久的大争论划上了句号。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为了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苦苦探寻。随着一个个教条的被抛弃，一个个禁区的被突破，全党正向真理步步逼近。

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必须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

1982 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问题。

1984 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经济性质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决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7 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更上一层楼，指出计划与市场应该是内在统

一的，计划工作要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

十三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经济运行模式。

这时，离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差一层窗户纸了，真理已经在鼻子尖下。

令人遗憾的是，1989年风波突起，一时间“经济市场化”同“政治民主化”、“思想多元化”一起被判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三根支柱。“市场经济”成了人人避犹不及的字眼，哪里还敢探索下去？风雨之中，有一位老人最清醒、最勇敢，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89年6月9日，他在接见戒严部队将领时，继续以坚毅的口吻强调：我们要继续支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不能改。邓小平当时是这样讲的，作为十三届四中全会文件也是这样印的。但是，在7月10日公开发表时，上面提到的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二字却被人改为“调节”。以后的标准提法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步建立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体制。

不要小看这两字之改，它一下子把十三大报告提出的计划与市场两种调节方式和手段改为一种是经济性质、一种是手段。真理就这样在鼻尖下溜掉了。

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国内批判“市场经济”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形成了万炮齐轰的局面。在讨伐大军中，研究《资本论》经年有加的学者有之，自称改革者的人有之，曾为市场经济呐喊、因政治气候变比又“转变”过来的理论家亦有之。而自称没读过《资本论》、不懂经济的邓小平，却不改初衷，顽强地捍卫着由他倡导的改革开放大业。

他似乎对他讲的市场经济的“经济”二字被改为“调节”二字不能忘怀，抓住一切机会和场合重申他的主张。

1989年9月，针对对市场经济越来越多的责难，邓小平不无讥讽地说，十三大报告中的那两句话“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我就没有看出有问题。邓小平一再警告说，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不能批十三大。他对来访的李政道夫妇意味深长地说，请你相信，我们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

1990年12月，邓小平与薄一波等人谈话时说：理论上要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是计划、市场这样的内容。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调节，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

资本主义不控制？有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就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那回事。他尖锐地说，不搞市场，就是自甘落后。

1992年初，邓小平不顾年事已高，前往南方视察。在南巡途中，他把“市场经济”的问题讲得更简明更透彻。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此语一出，举世皆惊。邓小平说出了许多有识之士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牢牢地抓住了真理。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也是邓小平对马

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贡献。

如今，邓小平的一家之言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写在了党的十四大报告之中。“市场经济”四个字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

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写入十四大报告，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传统观念，诊治了我们在市场和市场经济问题上常犯的“恐资脖”，启发人们从资源配置这一基本经济学观点的角度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进行全新的思考，这无疑是继八十年代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念后的又一次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在不同历史条件都有成功亦有失败。

但以总体效率的比较而言，现代市场经济已被证明更为有效。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但后来也出现了物资匮乏，效率上不去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实践证明，中国选择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道路是明智的。

对计划经济当然不应该一笔抹煞，它在一定的适用范围、一定的历史条件是有效的，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建设规模的扩大，经济结构、产业和产品结构的复杂化，以及发展目标的多元化和经济的国际化，计划经济就越来越不适应发展的需要。八十年代，中国经济跨上了一个台阶，九十年代，我们要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十四大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香港《成报》评论说：十四大的意义，是为市场经济大开绿灯，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确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百年不变，标志着中共建国 43 年来，在经济制度上一次最重要的转变。

3. 举世瞩目的一个代表

这是一个历史的瞬间：1992 年 10 月 19 日下午 3 时，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同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亲切见面，共祝这次历史性的盛会圆满成功。

亿万中国人都从当晚的电视新闻中看到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海外传媒也迅速对此作出反应：88 岁高龄的资深领导人邓小平今天颇为罕见地公开露面，向新领导人表示祝贺。他希望新领导人继续贯彻执行他的政策，直到下个世纪。

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四大举世瞩目。同样，邓小平是否出席这一盛况，也为人们普遍关注。在 10 月 11 日下午党的十四大的新闻发言人刘忠德举行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就有记者问邓小平是否出席大会以及他对这次大会有何影响的问题。

刘忠德明确告诉在场的中外记者：邓小平德高望重，他是这次大会的特邀代表。邓小平是我们党的杰出领导人，他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作出过突出贡献，他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开辟了唯一正确的道路。他今年年初南巡的重要谈话，为这次大会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邓小平对开好这次大会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回答“邓小平是否接受了作为大会特邀代表的邀请”的提问时，刘忠德作了肯定的答复。

于是，人们纷纷猜测：邓小平有可能出席这次大会。

然而，开幕式上，邓小平没有出席；会议期间，邓小平没有参加；闭幕会上，邓小平仍未露面。

自1987年11月举行的党的十三大上，邓小平主动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以后，就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显然，这位最先提出在中国“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并身体力行、作出表率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想让新一代领导人放手工作，独立地担负起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1989年11月，在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又主动辞去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最终实现了他自己多年希望完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夙愿。

当时，他高兴地对出席十三届五中全会的人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他表示：“我的生命是属于党的，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诚如邓小平自己所言，退出领导岗位后，他仍然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0月18日，历时六天的党的十四大在京结束。圆满之余，代表们唯一感到遗憾的是邓小平未能出席大会。会议闭幕第二天，代表们接到通知，下午3时到人民大会堂和中央领导一起合影。

许多代表预感到，邓小平可能会出席，于是，代表早早地就乘车从驻地来到人民大会堂，在宽敞的宴会厅里排成一个巨大的弧形，期待着邓小平的到来。

据了解，尽管邓小平没有出席十四大，但他始终关注着这次大会的有关情况。每天，他都要翻阅十几种报纸，详细了解大会的进程。大会闭幕当天上午，当他看到报纸上有关会议闭幕的报告后，欣慰地说：真是群情振奋！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将近3时，有消息说，邓小平就要到达人民大会堂。

早已等候在大厅的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李鹏、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刘华清、胡锦涛和杨尚昆、万里、姚依林、宋平、薄一波、宋任穷等人，一起来到电梯口前，迎候邓小平的到来。

电梯上方的显示数码亮了：1、2……身穿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微笑着走出电梯，同江泽民等人一一握手，并在北京厅门前合影留念。

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并肩站在一起，显示了党新老合作、后继有人，事业兴旺发达。在场的摄影记者纷纷按动快门，将这历史性的一幕摄入镜头。

随后，在江泽民的陪同下，邓小平走向灯火通明的宴会厅。

“小平同志来了，小平同志来了！”代表们惊喜地喊道，使劲地鼓掌。

掌声、欢呼声像海啸般由近及远向前推进，很快就波及全场，汇成了震撼屋宇的巨大共鸣。

邓小平红光满面，精神矍铄，迈着稳健的步履，沿着红色地毯向代表们走去。他一边走，一边向代表们频频招手致意，并不时停下脚步同代表亲切握手。

“小平同志您好！”“祝小平同志健康长寿！”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一声声衷心的祝福，喊出了全体代表发自肺腑的心声，表达了全党全国人民对邓小

平的深情祝愿。

人们深知，正如没有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中华民族还将在黑暗中摸索一样，如果没有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中国也不会出现像今天这样的生机勃勃的局面。

历史将永远铭记，邓小平领导亿万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从贫困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丰功伟绩。

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邓小平走到代表们中间坐下。大厅里顿时变得异常安静，只听见摄影转机在沙沙地转动，先是向左转动了180度，然后又向右转动了180度，一张历史性的合影在瞬间定格。

合影完毕，邓小平站起身，继续向代表们走去。

掌声再次响起。

邓小平缓步而行，一步，两步……每一步都是那样坚实有力。

一些代表生怕错过这一难得机遇，顾不上维持现场秩序的工作人员的劝阻，纷纷簇拥在邓小平的周围，举起自带的相机，喀嚓、喀嚓地连续掀动快门，闪光灯如同夏季的闪电亮个不停。

沿着宴会大厅绕场一周后，邓小平又走到了电梯前。他再次同江泽民等同志一一握手，并说：“这次大会开得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简短的话语，饱含着深切的叮嘱和殷切的期望。

江泽民握着邓小平的手激动地说：“您今天同大家见面，使代表们深受鼓舞，大家的情绪达到了高潮。”他代表新当选的中央领导集体表示：现在大政方针已定，我们要真抓实干，把大会的精神落到实处。

邓小平满意地点点头，挥手向大家道别。

20分钟的会见结束了。

但作为珍贵的历史瞬间，却在每一位代表的心中留下了长久的回味和难忘的记忆……

第三编 冲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

一、国有企业也要进入市场

国有企业曾是国家的金娃娃，但困难与机遇并存；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部分工厂停产了，工人下岗了，发不出工资了，怨声也有了；我们也想了许多招，现在开始搞股份制。

1. 国有企业，昔日令人艳羡的王子

无论哪个国家，其现代经济总是依托于现代企业。当今所有发达国家都得益于工业化的成功，在今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工业化仍会决定着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国力的强弱。一个国家的大工业的水平往往取决于大中型骨干企业的水平。在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骨干力量和命脉，是工业化发展的依托和支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体现者。

中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建国后发展起来的。1949 年—1978 年，国家为了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加快工业化的进程，通过行政手段，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将大中型企业的建设列为基本建设的重点，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从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财力集中度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仍集中建设了一批重点项目和工程。回顾其发展的过程，大中型企业比较集中的迅速发展时期有三次。

第一次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新中国根据当时理解的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预见和描绘，在学习原苏联集中统一的国有企业制度的基础上，确立了集中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指导思想。中央人民政府先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进行“三大改造”和对苏联援建的 156 项重点工程的集中建设，使我国国有企业迅速发展壮大。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总工业产值的比重由 1952 年的 41.5% 提高到 1957 年的 53.8%。到 50 年代末，初步形成了飞机制造，汽车制造，大型机床制造，有色金属、矿山、发电设备制造等一批新兴工业部门。这一时期中国共建成大中型工业企业 4600 多家，是发展最快的时期。

第二次是在 1965 年前后进行的大规模的重点建设，也就是常说的“三线建设”。当时政府先后投入大约 2000 亿元资金，在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以及河南、湖北、湖南集中建设了一大批大中型企业和科研单位。这一时期建成的大中型企业约 2000 个，形成了 45 个以重大产品专业生产为主的科研基地和 301 个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由此，中国基本形成了以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交通、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工业为基础，机械、电力、化工为先导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初步改善了工业布局，增强了经济实力与国防力量。

第三次是 80 年代初期。政府在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的同时，要求全国支援和保证已经列入“六五”计划的在建大中型项目以及将要兴建的、为“七五”和“八五”计划作准备的 279 个重点项目。这一时期国家重点建设集中于能源、交通、建材、轻纺等传统产业，以及电子、汽车、飞机制造、化工等现代产业，由此建设了一批新的大中型企业。

到 1992 年，全国共有大中型企业 13719 家，其中 80 年代建成的有 1070 多家。这一批企业的投产，大大加强了中国的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

通过这三次大的建设，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已成为门类齐全的一个体系，在国民经济中起着脊梁和骨干作用，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的昨天是辉煌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各项事业都取得巨大的成就。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由于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进行“两个根本性转变”是前人所没有经历过的伟大实践，无任何经验可借鉴。加上历史上积累下来的一系列矛盾，在前进过程中，难免这样的、那样的问题。主要问题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结构调整进展慢。一是中国基础产业的瓶颈制约虽然有所缓解，但尚未完全解决；二是一般水平的加工能力过剩，而高水平加工能力不足；三是“大而全”、“小而全”、地区之间产业结构雷同现象仍较普遍，难以形成规模效益。

企业改革以及配套改革推进迟缓，国有企业活力不足，生产经营困难。以国有工业企业为例，1996 年国有企业资金利税率由 1992 年 9.71% 下降到 6.67%。国有企业的亏损额也在逐年加大，1996 年达到 727 亿元，比 1991

年增加近 1 倍。

金融风险增大，财政与金融均面临挑战。一是不良债务规模过大，严重影响商业银行的正常运行；二是股票市场行为不够规范，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和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三是金融机构非法集资、高利吸资的现象仍较多。

就业问题逐渐突出，就业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所必须重视的重大问题。

2. 对国有企业出路我们想了许多招

1979 年开始，中国开始对国有企业体制进行改革。这场改革一直围着政府和企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创造一种崭新的企业组织制度展开。因此，从本质上说，城市企业体制改革出现的一系列波动与反复的过程，就是探讨政府和企业利益关系如何调整，企业组织形式如何合理化的过程。从整个过程来看，这一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3. 1978 年——1982 年：对企业扩权让利

传统体制的典型特征是集中的计划过多，对企业生产经营统得过死针对些弊端，政府确定了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突破口的方针。国务院于 1978 年制定并发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就企业可拥有部分计划、销售、资金运用、职工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使用等权利作了说明。这一政策的出台，意在改革政府和企业的各种关系，使企业从行政机构的附属物向具有一定自主权和利益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转变。扩权试验首先从四川省的部分大企业开始。当时采用的主要步骤是，试点企业在年度结束实现增产增收的目标后，允许提留少量利润，并可以以奖金形式发给职工。到 1981 年，全国已有 50% 的国营企业进行了这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赋予企业部分计划、利润留成、资金运用、超计划产品自销、部分劳动人事使用等权利。与此同时，让利实验也同步展开。1980 年将企业计划内利润留成和计划利润分成改为企业利润全额分成，并规定了全额分成比例的计算方法，一般以当年企业所得为基数分别核定，以及企业用利润留成建立生产发展、集体福利和职工奖励三项基金的要求。三项基金建立后，国家不再承担与企业有关的经营性费用和成本。这样，在努力促使国家和企业利益责任规模化，明确企业在保证自身利益的同时确保其对国家的贡献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扩权让利”的绩效在于：企业在转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方向上前进了一步，并且激发了企业发展生产的内在动力；企业具有了通过留成资金的运用，进行自行扩大再生产、重新投资的初步能力。由于“扩权让利”后，政府允许企业把 60% 的折旧基金、大修理基金和大部分企业自有资金用于购置新的生产设备、更新技术和产品创新，使企业具备了某些进行自我发展的经济实力；为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配套改革创造了某些微观基础。由于宏观体制的配套改革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微观构造的逐步合理化推进，会给这些改革提供若干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

然而，由于“扩权让利”的做法过分简单化，使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经

济关系仍然缺乏某种“透明度”，国家也难以调节实际上存在着的企业之间的级差收益。而且当企业利润减少，企业所得的下降幅度大大小于国家所得的下降幅度时，人们开始意识到政府与企业间的经济关系如再沿袭行政性分权的办法，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同时，企业在拥有权利和利益的同时也应相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否则将会给隐蔽性的旧体制复归创造条件。比如利润留成固然可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但这种做法是以企业盈利为前提的。

如果企业经营不善，出现亏损，企业无非是不留成或少留成，而不必承担任何经济责任，企业仍然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

从扩权的实践看，企业仍然没有摆脱政府部门“附属物”的地位，单一的行政性“分权”和“让利”，并不能确立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商品生产者地位。此外，由于当时的宏观改革政策未能配套进行，政府赋予企业的各种权利有的并未真正落实，有些实际上已重新被政府收回，或者被地方政府截留。这种现象使人意识到，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需要运用经济杠杆实现规范化，企业在获得某种权利的同时也应承担与其权利相对应的责任。

4. 1983 年——1986 年：利改税

由于政府与企业的各种经济关系尚未理顺，出现了国家集中的财力过少，企业资金运用过于分散的矛盾。1983 年利改税办法的正式出台对规范两者的关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年 4 月，国务院批准财政部提出的《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的推行办法》，将所有大中型国营企业过去向主管部门上缴利润的制度改变为实现利润的 55% 向国家交纳企业所得税，税后余利较大的企业与主管部门再实行利润分成或向政府交纳调节税。国营小型企业按超额累进税的办法向国家纳税。以上统称为税利并存的第一步利改税。

第一步利改税在明确政企关系，保证国家收入方面比之利润留成制度是一个更具有重要意义的进步。但是，所得税不区分产品的不同品种，均按盈利额大小征收，这就使政府难以运用税收杠杆来调节产品的生产。另一方面，由于历史上早已存在的产品比价不合理，而在改革之初市场化程度又很低，使企业之间的盈利差别很大，而这种差别又不能真正反映企业经营的好坏。因此，有必要对第一步利改税作进一步的修正。

1984 年 10 月，政府决定进一步改革税制，即第二步利改税。

第二步利改税主要是以工业征收产品税、商业征收营业税为主的税收体制，同时还开征增值税、城建税、房地产税、资源税等其他各种税目。其主要内容包括：把工商税按性质划分为商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盐税四种，同时把产品税的税目划细，适当调整税率；开征资源税，调节由于自然资源和开发条件的差异而形成的级差收入；恢复和开征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和城市建设税等四种地方税，合理使用土地、房屋、车船，适当解决城市维护建设的资金来源。

两步利改税试图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同时力图为企业创造一个大致公平的竞争环境。虽然这一设想是合理的，也是一种进步，但是在实施中并不顺利，主要问题在于：市场机制尚未真正形成，企业与政府间的行政关系尚未完全割断，因此税制的改革并没有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反而使企业的税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缺乏自我发展能

力，对利改税就没有什么兴趣了。

产品价格并不能由市场决定而仍由政府制定，并且由于在价格改革中政府不断调整产品比价，按原来的比价确定的不同产品税率又跟不上价格调整的税率，因此企业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公平的竞争。

在所得税后再征收的调节税仍然是不规范的，这种调节税往往由政府根据每一企业的不同情况分别制定，因此仍然存在着讨价还价、税率无法统一的弊病。上述问题在实践中的体现就是 1985 年和 1986 年预算内国营企业实现的利润连续下降。人们开始意识到，在市场化程度很低的情况下，税制改革的意义是不大的，改革税制虽然可以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但它并不能培育起新的市场机制，其对企业的激励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

而且，在发展与改革的双重目标面前，如果只有宏观体制的改革，而没有实现微观基础的重构，宏观体制改革也难以奏效。于是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完善企业组织机制的改革。

5. 1987 年——1991 年：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

1986 年底，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提出深化改革要围绕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进行，从而再一次掀起了企业改革的高潮。在一年多时间里，部分省市对企业组织机制进行了各种改革探索。这些探索主要包括股份制、租赁制、资产经营责任制以及承包经营责任制等形式。由于受到当时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及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前三种形式尚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而承包经营责任制却得以迅速推广。

承包经营责任制之所以得以迅速推广，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承包制并不改变企业的所有制形式，而是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因而它更易于为政府所接受。

承包制是在传统体制的基础上培育新的企业机制，因而能够与“扩权让利”和两步“利改税”相衔接。

承包制利用契约形式来明确政企的分配关系，并在明确企业的目标任务的同时，给予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应有的自主权，其操作较为简便易行。

承包制实行“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欠收自补”的分配原则，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前提下，给企业以较大的边际留成率，具有较强的激励作用，因而易为企业所接受。

承包制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并培育市场机制，提高市场化程度。这符合改革的方向，又能减轻在市场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社会震荡。

1987 年下半年，承包制在全国国营企业内得到逐步推广。一年后，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已占到 78%，已有 82% 的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61% 的国营大中型商业企业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

根据国务院 1988 年发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中国企业承包制的形式主要有以下五种：上缴利润递增包干。这种形式的内容是：企业上缴产品税（或增值税），在核定企业上缴利润基数的基础上，逐年按规定的增值向政府上缴利润，超包干数（包括递增数）的部分全部留给企业。

企业承包多得的留利可按 5 : 3 : 2 的比例用作生产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

该形式主要适用于生产稳定增长、利润受原材料价格影响较小。增长潜力较大的企业。

上缴利润基数包干，超收分成。这种形式明确了企业上缴利润的基数，要求企业按原定税利纳税，超基数增长部分企业和政府分档分成。分成形式一般为：超基数 5% 以下的部分上缴政府 30%，企业留 70%；超基数 5% 以上的部分上缴政府 20%，企业留 80%。

这种形式一般适用于生产比较正常、人均上缴利润水平较高的企业。这种形式最大的问题就是于对企业的压力和动力都比较校上缴利润定额包干。这种形式确定了企业上缴利润的包干基数，超基数增长部分全部留给企业。该形式运用于那些低利微利而产品又为社会所需、技术改造任务重和急待扶持的企业。在这种形式下，由于包死了上缴基数，透明度较高，有利于企业增强后劲，但政府不一定能多得，从而导致该形式的推行往往与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和国家税制结构及其改革直接联系在一起。

亏损企业减亏（或补贴）包干。这种形式主要针对亏损企业。

根据企业的亏损状况及原因，核定补贴基数和递减比例，超亏不补，减亏全留或分成。显然，这种形式使得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关系明朗化，能对企业产生扭亏增盈的激励。

国家批准的其他承包形式。除了上述四种形式外，国家批准的其他承包形式还有：全行业的投入产出包干、租赁承包和资产经营责任制等。但这些形式只占很小的比重。

从 1987 年开始全面推广承包经营责任制时有三个初衷：一是改变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起激励作用；二是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企业经营者能以独立的法人地位自由进入和退出市场；三是通过承包经营、确保国家财政收入。从承包责任制实施的情况来看，这三个改革初衷基本实现。然而，在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以下问题：承包指标的易变性。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企业运行的宏观环境具有典型的不确定性。通货膨胀所导致的企业成本上升，紧缩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企业经营资金的缺乏，政府财政赤字所导致的企业税负增加等等，都使企业的承包指标不易固定。承包指标一定几年不变的承诺都由于宏观环境的急剧变化而变为一页废纸。企业与政府在承包指标上的讨价还价日盛，导致政府与企业承包指标谈判的交易费用急剧上升。

企业行为短期化。由于企业的承包期一般都较短，因此在承包期中，企业为了获得最大利润，一般都采用把资产转化为利润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扩大现期收入。这种把资产转化为利润的方式包括：降低折旧率以提高利润率；减少利润留成中的投资基金比例以扩大现期消费基金比例等。这种企业行为的短期化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企业仍然负盈不负亏。就承包的实践来看，承包的企业一般都是经营状况比较好的企业。因此承包制的实行并没有使国家卸下亏损企业的包袱。此外，由于承包制并没有解决企业的产权问题，因此一旦承包企业由于经营状况不善而出现亏损，承包合同也就此夭折，国家仍然要把这些亏损企业包下来。

阻碍了要素流动与产业结构调整。由于承包制的实施固化了企业的利

益，进而给要素的流动带来了阻力。企业要素流动的主要形式是具有优势的企业兼并劣势企业。然而在承包制下，优势企业兼并劣势企业必然会影响优势企业自身的利益所得，并且在短期内会背上被兼并企业退休工人的包袱，造成企业留成利润的下降与外流，从而完不成承包的预期目标，因此优秀企业往往会抵制企业间的兼并行为。

上述现象表明，承包制本质上是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的一种契约，是约束国家与企业间分配方式的一种新的尝试，它并不能作为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的主攻方向，承包制与利改税相比，只不过是外部环境不规范的情况下，把统一税率变为一户一率，以解决由于过去几十年政府对国有企业投资不均等所造成的竞争条件不均等的矛盾。这两种改革方案在规范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方面无本质差别。

然而，中国的企业制度改革，除了解决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以及国家对企业的激励外，还有两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国有企业负盈不负亏的问题，二是企业的经营决策权问题。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途径只有借助于产权制度的改革。

6. 我们想到了股份制

针对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所出现的弊病，1992年随着经济的又一次涨，企业改革的重心开始转向股份制。

孕育准备阶段（1979年——1984年）

早在1979年，中国农村就有了以集资入股的社队企业，因此，中国股份经济起步实际上是始于农村的。国务院1979年7月3日在《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中，对社队企业解决资金来源的办法是：“可从大队、生产队公积金中提取适当数量的入股资金。”由此可见，国务院对集资入股予以肯定。

1983年，中共中央在《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不能“一讲合作就只限于按劳分配，不许有股金分红”。自此，中国乡镇企业的经营机制逐渐向股份经济机制过渡，许多乡镇企业的资金来源都是农民集资入股而成的。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了“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的号召，从而极大激发了农民参与企业经营的热情，也促进了中国合股经营企业的大发展，特别是农村供销社的大发展。

1984年4月，国家体改委在常州市召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提出城市集体企业和国营小企业要进一步放开、搞活的办法是“允许职工投资入股，年终分红”。

这期间，中国的农村企业和城市的小企业有了股份制的雏形，其特征是从浅层次的集资入股型到深层次的合股经营、股份合作型发展。例如，1982年6月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与广东深圳市地方企业实行横向经济联合，公司全权负责筹资开发深圳经济特区赤港2.2平方公里地域，建设并经营具有一定规模的新型深水海港。

试点阶段（1984年——1986年）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吹

响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股份制也开始进入了正式试点阶段。

1984 年，北京、广州、上海等地进行了股份制试点。广州、上海等地的少数企业进行了本厂职工发行内部股票的试点。1984 年 7 月，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同年 11 月，上海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成立了，并向社会公开发行了每股面值为 50 元人民币的股票 1 万股。1985 年 1 月，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发行了每股面值为 50 元的股票 10 万股。上海爱华电子设备公司发行了每股面值为 50 元的股票 6000 股。

这些股份制试点企业诞生，并发行股票，引起了众多投资者的兴趣，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6 年 9 月，第一家代理和转让股票的证券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宣告成立，从此恢复了中国中断 30 年多的证券交易业务，成为 1986 年国内十大经济新闻之一。

总体上看，这一阶段股份制试点尚处于萌芽状态，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有数千家企业在集资发行股票，其特点是小企业多，集体企业多，乡镇企业多，自发进行的多，不上市的有限责任公司多，多半是小量、分散、债权式的股票，处于不规范的起步摸索时期。

但是，相当一批的企业和单位利用股份集资获得成功，在全国银根抽紧形势下，企业得到发展。

1985 年，中国企业横向联合迅速发展，从而强有力地促进了股份制的发展，而股份制的发展，也更有利地使企业的横向联合趋于完善。这一年，股份制不仅仅在农村得到了发展，而且在商业、金融业、轻工业、水产业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发展阶段（1987 年——1988 年）

1987 年，中国的大部分企业实行了承包、租赁等经营形式，在此期间，股份制也受到了部分企业的青睐。国务院 1986 年 12 月《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指出：“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因此，股份制企业鼓起风帆继续在探索中前进。

这一阶段，在国务院批准下，上海、深圳两地开始加快企业股份制试点工作。

深圳。1986 年 10 月 15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明确指出：国营企业股份化，系指将国营企业的净资产折股作为国家股权，向其他企业和个人出让一部分国家股权或吸收国家、其他企业和个人加入新股，把原企业改造成由国家、其他企业和个人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目的是推进深圳经济特区的经济体制改革，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特区经济发展。

上海。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为了加强对股份制试点工作的领导，确定由市体改办负责拟订政策法规并组织实施。自此开始，上海的股份制试点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了新的进展。1986 年下半年起在市委、市政府直接领导下，由市体改办负责组织研究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的改革方案，初步确认八家国有企业为代表，并组织全市各有关部门领导参加方案论证会。正当各企业积极准备方案的时候，又吹来一股不赞同股份制的冷风。由于在全民企业中进行试点，没有经验，本着既要大胆、又要谨慎的原则，把原定八家企业减少为四家，其中全民大中型企业两家。上海真空电子器件

股份有限公司是上海第一家全民所有制试行股份制的大型企业，由六厂一所合并组成。在坚持国家股为主体的前提下，向国内城乡居民和职工发行 5000 万元人民币股票，打破了原先企业单一全民所有的模式，形成国家、集体、个人资产并存于一个企业中的多元化资产所有权结构。公司还以较强的综合经济实力中标承包了亏损企业上海 101 无线电厂，又通过控股参股等方式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在珠海、厦门、深圳等特区建立了六个控股公司和若干关联公司，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北方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于 1988 年 5 月正式成立，标志着一种股权式企业集团的崛起。公司拥有 58 个生产厂，有物资、销售、进出口、汽车配件等七个专业性公司，一个轻型汽车研究所和一所汽车工业学院。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0 亿元，是产销结合、各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大型股权式企业集团。

这一期间，股份制试点从工业企业发展到商业企业、房地产企业、金融企业。上海豫园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兴业房产股份有限公司和新世界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相继成立。

与此同时，经国务院批准，总部设在上海的交通银行，恢复重建为一家股份制的银行，海内外反响强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万国证券公司为第一家股份制的证券公司。上海浦东还组建了第一家以乡镇企业为发起人的公开发行 100 万股股票的申华电子联合公司。

至此，上海比较规范的股份制企业为 11 家，股本金总额为 8.8 亿元。深圳股份公司约达 80 多家。深圳市金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股份制改造在短短的四年中净资产增长到 6000 万元，是改造前的 24 倍，利润增长到 3500 万元，是改造前的八倍，成为一个拥有 10 家全资子公司、10 家合资企业，并在香港泰国、美国、波兰等地设立分公司的集团性公司。

据不完全统计，到 1988 年 10 月底，全国已涌现了股份制企业 16000 多家，股份集资额为 60 多亿元。北京市有 9 家；山西省二轻系统有 900 多家，股金额约 1782 万元，全省股金额约 3340 万元；山西雁北地区有 394 家；太原市有 61 家，股金额约 905 万元；沈阳市有 600 家；大连市有 23 家，股金额约 599 万元；上海市有 8 家，股金额约 65000 万元；江苏省有 150 家，股金额约 38000 万元；浙江省乡村集体股份制企业有 200 多家；温州市有 5 万多家；绍兴市有 49 家；蚌埠市有 51 家，股金额约 4095 万元；山东省二轻系统有 480 多家；山东省淄博市约有 486 家，股金额约 15000 万元（该市周村区已被国务院确定为农村发展股份制合作试验区）；河南省焦作市约有 4125 家，股金额约 10869 万元；武汉市有 9 家，股金额约 15000 万元；湖南省有 766 家；福州市有 70 多家；广东省有 312 家，股金额在 24000 万元以上；四川省约有 60 多家，股金额约 1 亿多元；重庆市有 7 家；西安市有 262 家；甘肃省有 21 家，股金额约 5830 万元；另外，农村以集资入股为主的股份制企业为数较多。

如山东省已有 1 万多家，河南临汝县已有 9100 家。

曲折发展阶段（1989 年——1990 年）

在治理整顿的过程中，理论界围绕所有制改革或产权制度改革展开激烈的争论。当时又一次出现“股份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股份制就是私有化”、“试行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倒退”等等论调。在这种情况下，原定扩大股份制试点范围的部署受到阻碍，已经试办的股份制企业也遇到了各种困难与

压力。由于对股份制的性质认识不一致，各项相关工作难以开展，股份制试点工作处于踏步状态，以上海为例，整整两年中没有增加一个新的试点企业，一直停留于前几年试办的 11 家。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争议复起，试点低潮；股票冷清，有行无市。

再发展阶段（1990 年——）

1990 年底 1991 年初，全国股份制试点工作开始复苏。随着治理整顿任务的基本完成，中国国民经济逐步转向健康协调发展的轨道。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迫切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活力不足，需要大胆探索企业改革的新路。理论界重提由承包制走向股份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体制的呼声又起。股份制试点进展出现了新的转机。

1990 年 11 月 26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告成立，12 月 19 日正式开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获得批准，正式开张营业。两地证交所的成立与联网，为股票的发行和交易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也为继续扩大股份制试点创造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

这一阶段股份制试点的特点是：进展快，有突破，效益好，规范化。上海以往 8 年试点工作中只有 11 家股份制企业，股本金总额 8.8 亿元。除了交通银行、真空电子器件公司两家大户外，多为中小企业。1991 年 9 月和 12 月，先后两次批准 9 家企业试点，股本金总额 11.35 亿元，多数为有名的大中型企业，如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嘉丰棉纺织厂、联合毛纺织公司等。这样，到 1991 年底股份制试点企业已增至 20 家，股本金总额 20.15 亿元。而在 1993 年，上海证券市场规模和覆盖面继续快速扩大，由小型市场发展成具有较大规模的全国大市场。主要表现在：上市公司成倍增长。

1993 年在上交所挂牌的上市公司共 106 家，是 1992 年的 3 倍多，上市总额 206.62 亿元，是 1992 年的 4.58 倍；上市证券品种日益增多。1991 年上市品种为 8 种。1993 年在上交所上市的证券品种达到 188 个，是 1992 年的 2.16 倍。股票市场的发展速度更为惊人，上市股票品种达到 123 个，是 1992 年的 3.2 倍；证券交易额扶摇直上。1993 年上海证券市场的交易额累计达 4958.16 亿元，比 1992 年猛增 6.66 倍。沪市投资者数量剧增，1993 年上海证券市场投资者高达 460 万人，是 1992 年的 4 倍，尤其是外地投资者的加盟更为突出，1993 年共有 280 万投资者来自异地，显示了上海证券市场在全国投资者的强大吸引力。

1991 年 11 月 30 日上海电子真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率先发行人民币特种股票，跨出了中国证券走向国际证券市场的第一步，突破了原来限于向国内法人和自然人发行的禁区，开始向国内外机构和自然人发行；进而创造了继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之后的以证券型股权方式吸引外资的经营方式，在扩大开放的新形势下，为更广泛地利用外国资金开拓了新的重要渠道。

据对股份制试点企业调查，股份公司的运行机制与现行国有企业相比，具有更强的活力和生机。深圳市曾对 84 家股份公司调查，其资金利润率平均为 16.77%，高于全市工业企业 13.73% 的资金利润率水平。深圳市最早的 5 家上市公司，在短短二、三年中，利润率年平均增长 97%，净资产年平均增长 1.3 倍。这与深圳市属国有企业三年中利润普遍下降形成鲜明的对比。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994 年底，全国共有股份制企业 3.3 万家，比 1993 年增长 1.25 倍。其中，股份有限公司达到了 6326 家，股本总额 2867.56 亿元。1994 年底，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公司达 291 家。比 1993 年新增 106 家。两地股票市价总值达 3687.83 亿元。全年上市总额达 644.55 亿元，比 1993 年增长 50% 以上。17 家国有企业完成股份制改组并到境外募集股份和上市，共募集境外资金 192.3 亿港元和 9.58 亿美元。

股份制企业发展的范围不断扩展。股份制试点工作已扩展到各个行业，从工业、交通、批发零售贸易、建筑、房地产、金融、到高科技、乡镇企业、外贸企业、体育文化部门及高等院校等，都积极开展了股份制试点工作。一些私营、集体企业也在向股份制企业转轨。截至 1994 年底，全国股份制企业中，工业、交通类企业占 56.7%，批发零售贸易类企业占 28.9%，建筑、房地产业类企业占 4.02%，金融证券类企业占 2.68%，其他行业类型占 7.7%。

有人说，即使假定中国继续实行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犯类似于“大跃进”、“文革”的重大失误与动乱，不发生特别大的全局性自然灾害，不爆发大规模的外国入侵战争，不卷入他国的军事对抗，等等，就是这样，到 2050 年，中国落后的阴影仍不能完全褪去。这是充满忧患和危险的意识。在寻求生存和发展的现实中，我们怎么办？邓小平说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要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已深深地领会了这一主旨。

党的十四大以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动了大手脚：税收政策符合市场要求，专业银行走向市场，资金供求市场日益活跃，外贸制度与世界接轨，价格改革步伐加快，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初露端倪。……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的症结却始终未解开，“内部人控制”、“代理人困境”、“逆向选择”、“免费搭车”等已不再成为经济学家的专利，普通平民百姓在“待岗”、“下岗”的煎熬中越来越关心经济学了。全民呼唤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人民呼唤更新的思想大解放。

二、争论姓“公”还是姓“私”

在一个不争论的年代，在中国发生了巨大的争论；许多人动了感情；争论的焦点是所有制问题，是姓“公”还是姓“私”。

1. 所有制：手段还是目的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国外的资金、资源技术、人才以及作为有益补充的私营经济，都应当而且能够为社会主义所利用。……这样做不会损害社会主义，只会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但真正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政治上寻根问底式的争论就在所难免了。

这场动了真感情的争论发轫于 1993 年那个炎热的夏日。

1993 年 7 月 13 日,《光明日报》的理论版刊登了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周叔莲教授题为《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两个问题》的文章。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既然所有制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那么所有制就有一个选择问题,改革问题,创新问题,就应该使之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制为主导,有其客观必然性,但在这个前提下,各种所有制的关系、国有制和其他公有制的内部结构及其实现形式,只有根据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来调整改革,包括明确国有企业的产权,才能真正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这里周教授有一个前提,即所有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就是这个前提,如同一块巨石,掀动了经济理论界的平静湖面。从 1994 年起,“手段论”和“目的论”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论争。

首先对周文提出质疑的是北京某杂志 1994 年第 2 期上署名的文章。文章认为周教授想拐弯抹角地提出私有化,更有甚者竟讽刺周文缺少常识。

此文一出,果真对周叔莲先生“不啻是击一猛掌”。周遂撰文反驳,指责这种“设置陷阱,而不是光明正大的学术争论。”白发苍苍的周教授一口咬定:所有制是手段。

面对理论的驳斥,周叔莲更愤怒于有些文章中“讽刺挖苦、指桑骂槐”式的“乱扣帽子的大批判”,它指出这与“文革”中对“猫论”的围攻是一个路子。

中国的争论只是争而已,与说服无缘,同样是这一杂志在 1995 年第 9 期上发表另一篇署名文章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和发展为基础的,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完善和巩固为目标的;离开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改革,或者削弱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改革,决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意义上的改革!

2. 私有化:捷径还是歧路

1989 年以后,在中国公开发表的正式文献中,公开鼓吹私有化的文基本上没有了,但“私有化”作为一个争论的焦点问题并没有停止争论,一些理论家大声喝斥某某等主张私有化,某某等不得不申辩,却越辩越乱。

北京某杂志在 1994 年 8 月发表署名文章,直指许多流行的观点为私有化思潮。称:现在有一种私有化的思潮,核心问题是全盘否定全民所有制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

同时,广东一位经济学家在《经济体制改革》1994 年第 4 期上对“所有制无关紧要论”进行了强有力的抨击。他说:最近,有一种论点说:所有制无关紧要,公有、私有化无关紧要。所有制无关紧要论,实际上已成为私有化主张的遮羞布,而私有化主张就是挖社会主义制度的墙角的主张。

有人在 1995 年 2 月 7 日《经济日报》上撰文强调:西方私有化不足为训。某教授在 1995 年 11 月《中国社会科学》上把产权理论归功于马克思,指责部分经济学家陷入私有化陷阱。

周叔莲认为:私有化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然而这些辩护对于扑面而来的指责是无力的。

3. 公有制：主体地位坚持往坚持不住

有人在《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2期上公布了隐藏的反对公有制体论的九种观点：个人所有制论；社会所有制论；手段论；共有论；产权拍卖不失产权论；产权模糊论；淡化公有制主体论；平起平坐论；完全取消论。

有人在某杂志上以另一种方式给以“曝光”，并大声责问：生产力为谁发展？称：现在有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质提出不同的观点，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提出非议。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切经济关系的核心，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基础；不能用一般的国有形式来代替或者概括生产资料公有制，不能用产权来代替所有权。生产资料公有制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生产全过程中。生产力是否发展，自然是判断问题的重要标志，但为谁发展，同样是判断问题的重要标志。

周叔莲在接受《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采访时猛烈地抨击了“国有制拜物教”。

厉以宁在答《生产力研究》驻京记者李风圣的采访时说：我们的短缺、产品积压、生产成本的高昂、产品质次价高，恰恰说明了仅仅以为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就能够为人民利益而服务的观点是睁眼不看现实的。生产资料公有化本身并不等于已经实现了生产的目的，也不意味着社会的生产会一定遵循培养、提高与发挥人的创造能力这一要求来进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普通的劳动者，舆论上提倡的是生活上的克制、再克制。禁欲主义成为一种美德。起码的生活标准变成了不可逾越的界限，变成了普通劳动者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而不了解人们在生活必需品的要求之外，还有其它种种要求，包括发展自己的要求。从生产与消费方面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销售多少，向哪些地方销售，都由上级规定。不管谁来领导生产，这种刻板的情况不会发生多大的变化。在对待人员方面，情况也是如此。企业不能选择和招收自己所需要的人员，劳动者不能选择自己的工作岗位。劳动制度把人员的流动规定得死死的。

一个人被分配到指定的工作岗位后，可能就注定了一辈子在那里工作。劳动者的迫切要求是什么，消费者当前需要什么，广大居民希望得到什么，企业可以不给予考虑。在这样的体制下，工人只可能单纯被当作劳动力看待。

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使用劳动力，因为没有劳动力就完成不了上级布置下来的产值计划。在这样的体制下，对企业来说，消费者远不是那么重要的。企业不是为消费者的更多的可供选择的机会而生产的，企业的产品不愁卖不出去，因为一方面，这是独家经济，另一方面，现在市场某些为消费者欢迎的商品数量不足，供不应求。而且，即使产品销售不出去，国家也不会让企业的领导人破产。于是仓库里堆满了销不动的产品，而企业照样生产，于是也就谈不上对消费者的关心和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正在于改变这种对人的漠不关心的状况。要知道，对人的漠不关心，并不是领导人（包括行政部门领导人与企业领导人）的认识问题，也不是管理的方法问题，而是体制问题。计划经济体制下，即使有些行政部门领导人或企业领导人认识到有必要把对人的关心与培养提到首位，并且也试图采取适当的管理方法，但体制本身限制了他们的作为，体制不改革，他们的愿望不能不落空。所以说，唯有转换经济体制，才使关心

人、培养人这一目的有实现的可能性。

这是致命一问：建立了公有制就能为人民服务吗？如果不能，坚持公有制就有悖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

当然更多的是稳健派人物的观点。

有人认为：没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没有公正的基础。有人认为：将国有制“糊弄”到私有制，会造成整个社会不公平和腐败。

有人认为：公有制是大局稳定的决定因素。

其实，公有制能否占主体地位，要看非公有制的发展状况，为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否给非公有制经济定个界限？某人在《中国工商时报》

(1995年6月1日)上讲：只给非国有经济一个配套、补充的地位。

有人不久著文驳斥了这种补充论。他指出，既然是“补充”(即使是“有益的”)，那就表明，应该有一个限度和一个比例，如果这个“补充”的比重大了，就会影响到公有制的发展。他强调，公有制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没有公有制经济就不能完全实现社会公平，也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但是，没有非公有制经济，也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就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将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程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国有经济占 25%，公有经济占 50%，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动摇不了。国家统计局一项研究报告如是说。

该研究报告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对国有工业比重下降无须忧虑；只要把握住几个重要行业，其他均可放开；现阶段中国国有工业比重以保持在 25%左右为宜。

报告概述了国有工业比重下降的基本情况。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年，即 1979 年，国有工业产值比重为 78.5%，到 1983 年缓慢下降到 73.4%；1984 年由于中国经济改革步伐较大，这一比重一年内下降了 4.3 个百分点，此后几年的下降幅度也均较大；1989、1990 两年，由于治理整顿，这一比重呈递降趋势，年均 1.1 个百分点。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是改革开放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次年又下降 4.1 个百分点。可见，国有工业比重的下降与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快慢密切相关。到 1992 年，中国国有工业比重已突破 50%的关口下降到 48.1%，1993 年进一步下降到 44%，累计比 1979 年下降 34 个百分点。

研究报告分析指出，第一，在总体经济的发展中，非国有经济从无到有且发展甚快，必然冲减国有经济所占份额，这种下降带有自然性；第二，在共同发展中，其它经济成份更多更快地进入一些易进入的行业，使国有工业在有些行业，如纺织、轻工等的比重较大幅度下降，而这些行业不可能也不需要形成国家垄断，孰多孰少，无关紧要；第三，国有工业比重下降并不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因为加上集体经济，公有制工业仍占 80%以上，即使未来这一份额下降到 50%以下，只要国家把基础的、关键的行业发展好、把握住，公有制的基础地位是不会成问题的；第四，国有工业产值比重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国有工业活力不足、效率不高造成的，例如目前国有工业每百元固定资产产出仅相当于非国有工业的 40—50%，对这些暂时性因素应引起高度重视，最终以深化改革来解决。

报告在参照分析了一些主要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有工业比重后提

出，现阶段中国国有工业的比重应保持在 25%左右，报告认为，现阶段，中国至少应对下述主要行业实行国有：包括大规模的煤炭开采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大规模的金属矿采选业、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电力蒸气热水生产及供应业、石油加工业、黑色及有色金属冶炼及压锻加工业、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工业、武器弹药制造业，及其它一些新兴的高科技行业。

报告中还披露了中国国有工业比重近年来下降的一些特点。

如经济增长较快时则这一比重下降幅度亦较大，说明非国有工业的增长势头远大于国有工业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生长点：国有工业资金比重的下降显著小于产值比重的下降（1985 年—1992 年累计下降 10.5 个百分点），说明国有工业集中了较多的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和高新技术等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居于支柱和主体地位；在产值比重大幅下降的同时，劳动者比重这些年来变化却不大（1979 年—1992 年累计只下降了 6.7 个百分点），说明国有工业企业劳动力数量刚性很强，人员易增不易减，造成效率低下，未来企业改革需要着重解决这一问题。

辩论是可以的，但有些人超出了辩论的范围。

有一篇文章说：私有经济迅速发展削弱了党的领导；新崛起的资产阶级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勾结在一起，威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1992 年之后，西化、儒化和庸俗化的文化挤除了马克思主义；党的队伍最堪忧虑：党员思想发生了倾向于资本主义的方向性转变，腐败不断上台阶，干部一心抓经济，不懂国际共运，无法应付复杂的政治局面。文章的结论是：“如果我们党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就有可能保不住国家政权。”这篇长文只字不提邓小平，只字不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发展中国方面取得的成就，反而特别点明：“1992 年之后，资产阶级自由化占了上风。”谁都知道，1992 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年头。

毋庸讳言，当前社会上确实存在种种问题。问题在于，这些问题是怎样发生的？应该循着什么途径来解决？这篇文章的意图是十分鲜明的，把经过夸大渲染的问题归罪在改革开放头上，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退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五六十年代。

同年底、又有一篇文章说，由于“私有企业迅猛发展，成倍增长”；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腐败、地方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存在与发展，“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对我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的“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提出了挑战，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了挑战。

4. 股份制：灵不灵

有人说：公有制的股份化不可能取得私有制股份化的效益。

有人说：如果要在国有企业中普遍推行股份制，则先得修改宪法。

有人说：对国有企业全面实行股份制是一种倒退。

号称中国最有希望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某经济学家认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是开错了药方。

5. 抓大放小—如何抓如何放

股份制倍受非难，“抓大放斜也不愉快。

“抓住关键少数，放开一般多数”的战略调整出台以后，经济界的人士普遍感到振奋，他们认为这有可能成为国企改革的转折点。

然而细一琢磨，他们的兴奋点似乎并不在一处，在对如何抓、如何放的理解上更是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兴奋点在哪里？国家经贸委一位负责人的观点是，不能把所有的企业都抱在怀里，这样做既不必要，也不可能。抓住这个关键少数，搞好 500 到 1000 家大公司、大集团，就会为众多的中小企业提供广阔的生存空间。一批优强企业形成了，就会带动大批危困企业的发展。

他的着眼点显然在“抓”上——通过“抓”牛鼻子，带动中小企业，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而经济学家的兴奋点似乎更在“放”上。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地位、规模、功能应进行重构，必须收缩国有企业战线。中央党校某教授认为，国有经济的比重应为 25%。中国人民大学某教授说，抓 1000 家的意义在第 1001 家，1000 家之外的企业放开后，也许能开创出一条新路来。

如何抓？如何放？如果说在“抓还是放”问题上兴奋点不一致的话，那么在“如何抓、如何放”上，争论双方的分歧就更大了。

比如如何抓，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女博士后认为，国有企业存在的必要性，在于其弥补竞争不足的特殊职能，而不在于效率，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不是因为管理，而是在于体制的一种安排。因此不应该用一般企业的标准——利润——来衡量国有企业。所以我们的目标不是搞活国有企业，而是养活国有企业。

《经济研究》编辑部的某人也持相同观点。他说，国企成线收缩以后，剩下的都是宝贝儿——我们要给予精心照顾，是养活养好，而不是搞活搞好。

而另外一些专家则认为，如果还是按过去计划经济的老路子，靠不平等的优惠政策把国有企业“保”起来，而不是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那对企业改革来说就毫无意义。

在“如何放”问题上也是这样。有人认为，不能信马由缰，一放了之。而中国人民大学某教授担心放开之后，国家是否还会划几道杠杠、定几条道道儿。他说，那就违背了放的本义。

问题还不止如何，有人开始耸人听闻地说“抓大放小会威胁我们的政权统治。

如果说，股份制和“抓大放斜更多是运作问题，股份合作制在有些人眼里则有性质问题，请看：股份合作制作为集体企业和国有小企业改革的一种形式正在时兴起来。其原因固多，但它被一些人论定为集体经济，可能不无关系。它的性质如何呢？先看江苏某市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调查报告，其中讲了这个乡“先出卖，后改制”，搞股份合作制的情况，其股权结构是：“社会自然人持股，经营者控大股”；占该乡 42 个乡村企业 93% 的 39 个转让企业共有职工 1889 人，其中持股者 236 人，占 12.5%；经营者本人持股额占股本金的 39%；经营者及其家庭人员持股额占股本金的 63.3%。1 万元以内股东有 49 人，1 万—5 万元股东 137 人，5—10 万元股东 21 人，

10—20 万元股东 13 人，20 万元以上股东 16 人，最高持股额达 52 万元。

现将股金在 5 万元以下，占职工总人数 9.85% 的持股人 186 人（49+137）大体上划为持小股的劳动者，与占职工总数 87.5% 的不持股的劳动者 16532（1889—236）合在一起，则共有劳动者 1839 人，占职工总数 97.15%。而持大股的股东（即持股在 5 万元以上、最高达 52 万元）则为 50 人，只占职工总数的 2.65%。可见在这 39 个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存在着明显的劳资关系。一方面是占职工总数 97.15% 的无股或只有少量股票的无产者。

这一点报告中也承认，但令人费解的它又讲这些企业保持了“集体经济”的基本特征。

真是这样吗？从所有制来看：集体经济必须以生产资料集体占有为基础，即使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合作社，虽以土地社员私有为基础，但这些社员入社共同使用的私有土地的数量差别不会过大，更不可能存在有人没有土地，有人却拥有大量土地的现象；但现在这些据说保持了“集体经济基本特征”的所谓股份使用制企业的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恰恰相反，不仅不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而且是极少数人控制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极大多数人一无所有。

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集体经济必须是劳动者的互助合作关系，而这里却是劳资关系；集体经济不允许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而这里却正是这种关系。

从分配关系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集体经济，实行按劳分配，即使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初级社，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同时实行土地分红，以承认农户对土地占有多少的差别；但现在股份合作制这里却不存在按劳分配，因为雇佣工人的工资不是按劳分配实现的形式，而只是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至于资本所有人之间的“按资分配”与初级合作社中的“土地分红”也是两回事，前者是资本家对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分割，而后者是联合劳动者之间对共同劳动成果的分配。

所以，无论从所有制，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关系任何一方面看，这种股份合作制根本没有任何集体经济的性质，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合作社也不是，而是完完全全的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

因此，它也根本不是股份合作制。

再看看另一份某市赴山东诸城市考察的报告。其中讲：诸城市对国有、集体企业“先出售，后改制”，搞“内部职工持股”的股份合作制。办法是对企业“进行资产评估，通过科学合理的股权设置，一次性向企业内部职工出售资产，由国家、集体所有变为企业内部职工所有”；“1000 元为一股，规定每个职工最低购基数为 500 元，超额部分自愿认购，数量不限”；“职工认购股份，发给无记名式股权证，一年以后可在企业内部转让”；“收入根本，坚持‘按劳根本’与‘按资分配’相结合的原则。”1996 年 3 月 22 日《文汇报》载“该市这种改制企业已达 210 家，占全市改制企业的 77.2%。”有人开始分析：这种企业内部持股的股份合作制既已由国有、集体所有变为企业内部的职工个人所有，那就说明它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这里要问的是以职工个人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不是完全由劳动者集资组织起来的，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制企业？因为报告没提供股金的结构情况，所以这里只能进行可能性的分析。由于这些企业在改制之初，

在规定职工必须人人持股，股额不得低于 5 股（即 5000 元）的同时，又规定了职工持有的是“无记名式股权证，一年以后可在企业内部转让”，这就有可能，在一年以后，会有一些经济上困难的职工，要由持股人变成无股人，企业开始由人人持股向非人人持股转化。另外，由于还规定了可以超过 5000 元的基数自由认购并且数量不限，所以在企业改制之初就不能平分秋色，出现持股大户甚至控股大户的可能性。这样，这个名为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就可能在开始建立之时，就不是以职工持股为基础的合作制，具有半社会主义的性质，而是那种名叫股份合作制，而实为资本主义股份企业，虽然这里的资本主义企业，在外表上涂有一层职工人人持股的油彩，但仍然不是劳动者集资办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而是资本家办的剥削雇佣劳动者的企业。要知道，雇佣劳动者不可能因手中有 5000 元的股票就成了资本家，而不再是资本家的剥削对象。可见，诸城这些以职工私有股金为基础的股份合作制，由于它的私有制的基础作用，加上股票一年后可以转让，特别是股票的持有的数量没有限制，这样的股份合作制，也会循着它内在的剩余价值与资本积累的规律，或早或迟，或快或慢地转化为完全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并突破它内部职工持股的规定。因此，从趋势看，不必经过太长的时间，这种股份合作制，实质上只能是通向资本主义企业的桥梁与过渡。

国有经济改革的热点一直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国有小企业一直不引人注意，租赁、出售等方式被接受，但一批资深经济学家却对此提出异议。

6. 有人要求反对“抓大放小论者提出善策。

“抓大放斜的思路提出之后，全国各地小企业的改革进展顺利，形势很好，山东诸城等地已创造了利用各种形式放开搞活小企业的经验。但是，正当人们充满喜悦的心情关注小企业改革的时候，却传来种种“放不得”的议论，与中央“放得更开一些”的精神大相径庭。某经济学家要求“抓大放斜的反对者拿出良策来。

7. 政企关系：分不分

过去经济学家异口同声：政企分开，当眼光切入经济体制的深层次时人们理解就超越了“希望”的水平。

8. 现代企业制度：谁管谁

企业改革中对一个重大问题——企业内部党政关系问题，我们一直取鸵鸟姿态，公司制以后，谁有个明白说法了吗！？不然，谁在企业负责，立场完全不同。

争论是善意的，但 1996 年，在北京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针对 1992 年以来股份制试验和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在国企改革中“抓大放斜的方针，提出要把包括所有小企业在内的“统一完整的公有制体系”，反对放掉小企业。文章说，如果放掉小企业，私有制就会大量出现，中国就会发展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模式”。文章反对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说：如果“将国有企业改造为职工股份制集体企业……社会主义也是无法维系的”。

文章批判了“公有和私有并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的观点，指出中国经济正面临着“非公有经济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公有经济”的危险，要求“采取适当措施”，压制私有经济发展，保护公有制。

应该说，随着改革向深层发展，姓“公”姓“私”的争论也有其必然性。这是姓“社”姓“资”问题的延续。到了 1997 年，随着股份制日益成为改革的主要取向，指责股份制的声音高涨起来。

有人批评股份制“是一个地道的私有化方案”，是要“培植和养肥一个新的资产阶级”。

还有人发表文章指责发展股份制等有关建议是“割裂、曲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完整论述”，是提出了“与六中全会决议相对立的理论纲领”。

这些文章中，有的大量摘引马克思语录，论证我们今天不能这样，不能那样。这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学风极为有害。首先，马克思著作中并没有给中国改革遇到的问题准备好现成的答案。其次，马克思主义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

解决中国改革中的问题，只能靠我们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创造。泥古不变，唯书唯上不变，只能损害我们的事业。

这些观点形成的影响和氛围，给国有企业改革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和障碍。用山东省某副省长的话说就是：“要说话不敢张嘴，要走路不敢动腿。”生怕被扣上“搞私有化”、“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

一时间，广大干部群众心头浮起了疑问：“到底今后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三、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

第三代领导集体发表政治宣言；领导中国人民走向二十一世纪的空前盛会、伟大纲领；人们还有必要谈论姓“公”姓“私”吗？

1. 高举旗帜

1997 年 5 月 29 日，位于北京西郊颐和园边上的中共中央党校，春意盎然，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刘华清、胡锦涛、丁关根、田纪云、李岚清、李铁映、杨白冰、吴邦国、邹家华、姜春云、钱其琛、黄菊、尉健行、谢非、温家宝、王汉斌、张震、张万年、迟浩田等，齐集于此，参加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

江泽民在 5·29 讲话中首先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江泽民说：在当代中国，只有这个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江泽民在 5·29 讲话中指出，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江泽民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出现失误的根

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 20 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又拒绝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

江泽民这一论断，批评了那些一切从本本出发的教条和空想。

正反两方面经验表明，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只讲方向，不讲阶段，常常使我们陷入盲目的境地。尽管我们的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但我们刚刚摆脱贫困，与发达国家差距还很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追求单一的公有制，只能以公有制为主体，促进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是从实际出发的政策。在我们国家，私有经济成份发展得好，同样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样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江泽民在 5·29 讲话中说，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继续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在这里，江泽民解除了困扰人们多时的姓“公”姓“私”的疑惑，为国有企业改革扫清了思想障碍。这是自 1978 年以来的第三次思想解放。

江泽民 5·29 讲话还要求我们加强党的建设，维护和增强党的团结，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江泽民的重要讲话，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带领全国人民奔向 21 世纪的纲领性文件，是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

讲话表明了我们党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的坚定信心，反映了我们党政治上、理论上的清醒和成熟，为党的十五大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江泽民在十五大召开之前的关键时刻，在走向新世纪的关键时刻，鲜明地把我们的旗帜举起来，实际上就是宣告：无论本世纪末，还是下个世纪，我们都将按照邓小平指明的道路前进。

江泽民的重要讲话，就其政治意义而言，这是邓小平逝世后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政治宣言，为党的十五大的召开确立了基调，是指导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的重要文献。就其现实意义来说，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在江泽民 5·29 讲话的推动下，国有企业改革迅速迈开新的步伐。

6 月 10 日，《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安徽省省长回良玉在全省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说，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应该成为安徽企业制度创新的主要形式。安徽应该像当年农村大包干那样，在全省范围内迅速大力推进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

8 月 12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四川省 3700 多家国有小企业的产权已不再属于国有。它们被民众资金购买后变成了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的企业。省长宋玉瑞说，尽管这种做法在中国没有先例，但四川总共近 5000 家国有小企业可能在今年内全部完成产权制度改革。

8 月 12 日，《工人日报》报道，在江泽民 5·29 讲话精神鼓舞下，从事建筑业的沈文涛于 8 月 8 日迈出了藏身 20 年的“掩蔽所”，公开在合肥注册

成立了广厦股份合作制公司。

原来他早有这个念头，但怕人怀疑“企业性质”，所以一直这里挂靠那里挂靠，不断换牌子。这一次，他说：“是江总书 5·29 讲话鼓舞了我，使我决心跨出这关键一步。”7 月 29 日，《中国经济时报》发表《求是》杂志总编辑邢贲思答记者问的长文《充分认识初级阶段，坚决防“左”》，同日并报道了浙江省丽水地区行署秘书长贾荣方的谈话，贾荣方提出，贫困地区更应该发展个体私营经济。8 月 1 日，该报发表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答记者问的长文《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是社会公正+市场经济》。

8 月 12 日，该报发表李君如答记者问的长文《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这些文章紧密联系实际，深入阐述了江泽民 5·29 讲话的主要意义，进一步促进了思想解放，振奋了人们的精神。

从 8 月 4 日开始，《大众日报》以《再来一次思想解放》为题，连续发表报道山东省各个领域取得的重大实践经验和成绩的文章，呼吁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

8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发表江世杰的文章《多样的形式》，指出：“在全国各地，改制（实行股份制）企业大多迅速扭亏为盈，许多微利企业成了利税大户，一些资不抵债的企业开始弥补多年亏损；地方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这本身也增加了公有财产的存量。”从 8 月底开始，《深圳商报》在《为迎接党的十五大而作》的专栏中，刊发《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敢闯敢试》、《坚持三个方面协调发展》等评论员文章，呼吁在改革开放中敢闯敢试，勇于探索。

从 9 月份开始，《粤港信息报》接连刊发《让思想冲破牢笼》、《要加深认识社会主义》等专栏文章，回顾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三次争论后，高度评价江泽民 5 月 29 日的讲话，再次提出了让思想冲破牢笼，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任务。

2. 跨世纪政治纲领的出台

对于中国共产党一次跨世纪的重要会议来说，一个好的大会报告是好这一盛会的基础和保证，而报告的主题，则是报告的灵魂。

在江泽民倡导与带领下，5 年来，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书记处的同志纷纷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考察工作，调查研究，详尽地了解国情，倾听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牢牢把握住大局，深刻地理解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所以，十五大报告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制高点上着手起草的。

1996 年 10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十五大报告起草小组。经过半个月的准备，10 月 31 日，起草小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自此，十五大报告的起草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从报告起草工作一开始，江泽民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就高屋建瓴地提出，十五大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

这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

1996 年 12 月 11 日，江泽民同起草小组作了第一次谈话，就报告的主题、框架、主要内容、基本思路作了明确指示。他指出，大会的报告要紧紧

扣住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这个主题，阐明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振奋精神，同心同德，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坚定不移地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到下个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这次谈话中，江泽民深刻阐述了党的十五大的重要意义，回顾了 100 年来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新中国成立近 50 年的发展史。

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回答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党已经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制定了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

只有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才能在大局的把握上高瞻远瞩。

江泽民说，回顾过去，是为了展望未来。十五大报告要回顾 100 年，回顾 50 年，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 20 年，特别是在总结十四大以来的 5 年。要展望下个世纪的前 50 年，进一步描绘建国 100 周年时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

在这次谈会中，江泽民还就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关于经济、政治和文化，关于外交工作和祖国统一，关于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他希望起草小组的同志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

此后不久，十五大报告产生了第一稿，其基本框架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得到肯定。

长达 10 个月的起草工作，一直是在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江泽民更是自始至终十分重视起草工作，并多次就存在的问题作出重要指示。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必须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这是近 20 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也是全国人民的心声。

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建立起来，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否成功，这是十五大报告一个重点回答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任务，1997 年 1 月 17 日，江泽民对起草小组作了第二次谈话，着重讲了经济体制改革有关的 10 个问题。他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项制度需要通过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动摇江泽民指出，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公有制经济要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实现形式。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同样可以用。目前广大城乡出现了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为主的股份合作制形式，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出现的新事物，应以积极态度予以支

持。

在这次谈话中，江泽民强调指出，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并使之进一步展开，十分重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真正走出了一条正确的路子，消除过去由于所有制关系不合理造成的对生产力的羁绊，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全党应深刻认识这个重大经验。

正当十五大报告的起草工作紧张进行时，1997年2月19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逝世。全党、全国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中。

一代伟人离去了。但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成为他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继续前进的力量。

在海内外都关注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要历史关头，江泽民再次明确指出：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邓小平逝世后，全党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风险，都不动摇。从1996年10月底到1997年6月的8个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了3次会议，中央政治局也专门召开会议，对报告稿进行讨论和审议。出席会议的同志对报告稿中确定的跨世纪行动纲领、主要任务、方针政策等许多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在一些重要的文字表述上进行了仔细斟酌。中央领导机构对十五大报告主要观点和内容在认识上取得了高度的一致。

根据江泽民的讲话精神和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的意见，起草小组又多次对报告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

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全党的智慧，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十五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也正是这一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

江泽民5月29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得到了各地区、各部门的一致赞成。1997年7月10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经过反复修改的十五大报告第五稿印发中央和地方135个单位征求意见。

参加讨论的有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员，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的党员负责干部，有各省区市和各大军区的党委负责人，有十五大代表和党内老同志，共约4000人。

同时，中共中央还委托中央统战部召集了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江泽民到会直接听取了党外人士的意见。座谈会上，多年与共产党合作共事的党外朋友，以对共产党工作的关心，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关心，对下世纪中国前途的关心，敞开思想、献计献策，对报告稿的修改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江泽民对大家表示感谢。他要求起草小组的同志逐条研究大家的意见，认真吸取在这期间，各地、各部门、各方面的同志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对报告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认真讨论。大家认为，征求意见稿主题鲜明，重点突出，实事求是，说理性强，在改革和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了新的突破，对继续推进现代化事业有重大和深远的指导意义，征求意见稿比较成熟。

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各单位对报告稿的主题、基本框架和基本观点，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依法治国等重大问题的论述，一致表示赞同。同时，也提出许多好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中央非常重视各方面的意见。起草小组对这些意见和建议逐条逐句进

行研究，又对报告进行了严肃认真的修改，共修改 800 多处，其中涉及内容修改的有近 300 处。这些修改，重点对十四大以来 5 年工作的总结、邓小平理论的概括、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农业和地区经济布局、科教兴国战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祖国统一等问题作了修改和补充，较大地充实和加强了党的建设的内容，加重了结束语的分量。

同时，对党内外普遍关注、涉及全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如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部分企业职工下岗、机构改革、地区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反腐倡廉、社会治安等问题，也都加强了论述。

报告还对有的段落作了结构调整。

根据各方面意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全体会议再次进行了讨论。随后，报告稿根据这两次会议的意见再次进行了修改。

一次次的修改，一步步的完善，集中了全党智慧的十五大报告稿日臻成熟。

9 月 6 日，党的十四届七中全会在京开幕。在 3 天的讨论中，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列席会议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对报告第八稿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和讨论，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报告又作了修改。9 月 9 日，十四届七中全会通过了这个修改过的报告稿，决定提请党的十五大审议。

经过反复修改，报告在充实内容的情况下，精练了文字，最后形成了 3 万多字的第九稿。报告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回顾百年，展望未来 50 年，全面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思想极其深刻，内容极为丰富。

9 月 12 日，在党的十五大开幕式上，摆在 2000 多名代表面前的是九易其稿的党的十五大报告。

这是 5800 多万党员共同的政治宣言，这是 12 亿中国人民赞同的行动纲领。它向人们展示的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的战略部署和坚定信念。

1997 年 9 月 21 日，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在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向出席十五大的 2000 多位代表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

这是中国共产党迈向新世纪的政治宣言，是中华民族再创辉煌的行动纲领。

从这里，人们再次听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拓奋进的坚实足音。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就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做了如下重大论述：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第二，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第三，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认真总结以往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制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逐步消除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生产力的羁绊，出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

共同发展的局面。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

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意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体经济可以体现共同致富原则，可以广泛吸收社会分散资金，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公共积累和国定税收。要支持、鼓励和帮助城乡多种形式集体经济的发展。这对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作用意义重大。

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这对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江泽民的十五大报告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改革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有所突破。在所有制问题上的创新尤为瞩目，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扩展了公有制经济的内涵。长期以来，人们对公有制的理解就是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

除此之外，都被视为非公有制经济。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混合所有制经济间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打破传统的封闭产权结构、建立开放型产权的结构的产物。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公有产权与各种非公有产权可以流动和组合。公有制经济内涵的扩展，有利于确保公有资产在流动和组合中不致流失，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拓宽我们搞活公有制经济的视野。

第二，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作出具体区分。近几年来，有些人对搞活国有企业失去信心，提出简单化的方法：出卖国有资产，将国有转为非国有。有的人不同意这种做法，但却在批评这种作法的同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提出国有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

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排除在主体地位之外，连集体经济也被排除在主体地位之外。十五大报告提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

这表明，不能把国有制完全等同于公有制，主导作用与主体地位也是有特定含义的，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表现之一，用主导作用取代主体地位显然是不恰当的。报告中作出的科学界定，有利于我们实事求是地把握主体与主导的区别和联系，更加全面准确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自觉防止和反对以偏概全的倾向。

第三，不能用“一刀切”的思维方式理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报告明确提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这充分体现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的地域和行业各自情况有所不同，差异性较大，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地方有些行业，或者由于国家投资较少，或者由于缺乏启动集体经济的条件和基础，为了加快发展经济，他们不得不更多地靠大力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引进外资，但是，常常由于公有制经济获得明显发展的地区，只要是公有制未居主体地位，也常常横遭非议。这样，往往影响了这些干部群众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报告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具体说明，无疑为这些干部群众吃了定心丸，可以更加放手地干。从全局来看，也有利于国有经济收缩战线，少铺摊子，调整结构，集中财力物力形成规模经济，更好地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优势。

第四，明确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过去，对于如何体现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常常出现两个偏差。一是往往纠缠在数量上、比例上；二是忽略了在混合经济中国有经济所具有的不可轻视的作用。应当看到，我国国有企业已有 30 万个，覆盖了全社会，但总体上看，经济效益并不理想，产销率下降，消耗水平持续上升，亏损增加，利润率下降，经济结构不合理，企业开工率严重不足，全国有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 60 % 以下；企业负债严重，普遍高于多数工业化国家的企业负债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盲目铺新摊子，无异于背上新包袱。很难想象，对于生存都成问题的企业，何以发挥主导作用。因此，国有经济真正起到主导作用，必须在提高控制力上下功夫，努力转变增长方式，实现资本经营，调整经济结构，扩大企业规模，壮大国有经济实力。

另外，在企业改革过程中，要重视国有经济的参股和控股。国有资产一定比例的掺入，可以有效地控制股份制企业聚集的社会资金，按照国有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是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的重要手段。

第五，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按照传统的说法，公有制只有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这两种形式。由于长期以来片面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形式，国有经济占有绝对比重。1978 年，国家公有制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 77.6%。城镇集体经济也披上“二国营”的色彩。报告中重申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突破了只有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才是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框框。据此，不仅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经济成分和集体经济成分可以被视为公有制实现形式，而且人民群众在改革实践中创造出的新的

公有制实现形式也有了被接受和采纳的理论依据。它必将为公有制经济带来新的活力。

第六，明确股份制性质，提出对股份合作制要予以支持和引导。对于股份制的性质，人们长期以来争论不休。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里，这就为十年来的争论作出结论。从股份制试点情况看，在我国组建股份制企业，有利于筹集重点项目资金，开辟新的融资渠道；还可以把一部分消费基金转为生产建设使用基金；有利于理顺产权关系，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发挥主导作用，有利于协调地方、部门和企业的利益关系。总之，股份制已经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织形式之一。因此，目前对股份制讨论的话题应当有所改变，理论工作者有必要静下心来，集中精力研究如何按市场经济规律规范股份制企业，使之尽快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股份合作制是改革中的新事物，在探索实践中已经取得明显实效。

由于它既有劳动联合，又有资本联合，在试验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复杂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提倡对股份合作制进行试验。

十五大报告中再一次强调要对股份合作制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实际上是对它的基本方向和基本作法予以肯定。只要我们按照报告中的要求去做，就一定会在实践中使之逐步完善。

第七，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所有制问题上不断探索，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十五大又进一步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明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江泽民的讲话发展了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把全国人民的力量由姓“公”姓“私”学理式的争论，转到了建设社会主义宏伟事业上来了，这是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现的标志。

主要参考书目

《邓小平文选（2、3卷）》，邓小平著，人民出版社。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江泽民，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9 月版。

《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2 月版。

《改革开放的历程》，王洪模等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6 月版。

《解冻年代》，厉平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7 年 10 月版。

《1976 年以来的中国》，汤应武著，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7 年 10 月版。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 8 月版。

《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 10 月版。

《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陈云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叶剑英选集》，叶剑英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下），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月报》1975年至1997年。
《改革开放十四年纪事》，盖军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出版。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毛毛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叶剑英在1976年》（修订本），范硕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王洪模、苏品端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郑晓国、南东风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5年版。
《邓小平与现代中国》，现代出版社1997年版。
《再造中华辉煌——邓小平纪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